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美] 史景迁 著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

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

吕玉新 译

The Question of Hu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丛书策划:陈达凯
责任编辑:张安平　贾建明
特约编辑:任余白
装帧设计:张晶灵
版式设计:李如琬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　18 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

著者:〔美〕史景迁
译者:吕玉新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http: 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66 千字
印张:7.125
插页:2
印数:1—8100

图字:09-2002-559 号
ISBN 7-80706-164-2/K·28　　定价:20.00 元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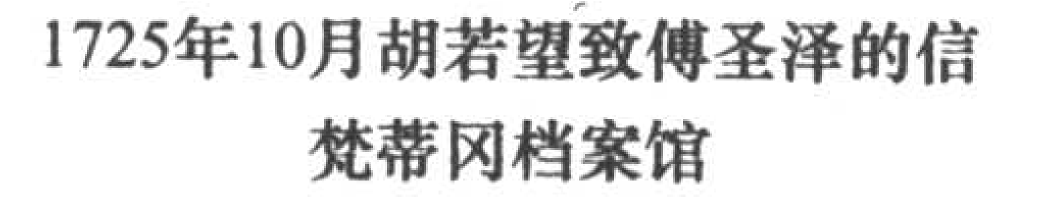
我们正处在一个极速变化的时代，层出不穷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事物令我们兴奋和浮躁，以至于常常淡忘了历史。而一个在自己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沉浸了数千年的民族，一旦梦醒，对外开放，也似乎总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历史之外的现实与未来。然而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无论怎样健忘和忽略，我们都将无法逃避地承接历史的因果。

在西方，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就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努力试图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他就是史景迁，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一位景仰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的汉学家。史景迁治中国历史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我们这次引进出版了史景迁的绝大部分作品，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史学界和广大读书界的重视。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全都赞同，只是希望借此开阔眼界，促进学术文化

交流。

由于史景迁作品中常常引用大量中外文史料，因而翻译难度较大，我们虽已做了精心的译校，但仍可能挂一漏万，错误难免。为此我们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向史景迁教授表示歉意。



1725年10月胡若望致傅圣泽的信
梵蒂冈档案馆

前言

要说胡若望先生这一辈子最使人惊奇的地方，也许不是别的，而只是我们知道他的所有一切。传统上，中国人在个人传记方面的材料绝对丰富多彩。它们不但保存了学者、政治家、哲学家、诗人、杰出的尽忠至孝世人以及有着著名怪癖的隐世者的事迹，对那些既富有而又仁慈的商人也会毫不吝啬地记上一笔。将士们也不例外，勇武戍边或平定国内反叛有功之辈都可青史留名。然而我们这位胡先生与传统传记中被大肆显彰的对象完全不同。他看上去怒容满面、容貌不端，口袋里也没几个铜板。除此之外，这位胡先生在世期间也无什么体面的亲戚。至于文才，胡先生惟有仅仅稍可敷衍的

一点儿学识，刚好能够供他找到份代人抄书写字的活计；论及武功，若将胡先生放到战场，他必定属于有勇无谋之辈，根本不值一提。在社会职务方面，自从皈依天主教之后，胡先生从来没有在教会中登上显要职位。胡先生的一生中惟一可大书特写的，是他在 1722 年曾远足欧罗巴洲，并在该地小住三年有余的故事。可是令人扼腕的是这位胡先生仅仅在两封短信中短暂地提到了他的旅行见闻，且其中的一封竟还会在邮寄途中不翼而飞。

可令读者感到惊奇的是，记载这位似是平庸的胡先生之详细文献资料却被保存在世界上三个大档案馆内。它们分别是梵蒂冈罗马教皇图书馆（the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n in Rome）、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 in London）以及巴黎档案文献馆（the Archives des Affaires Etrangéres in Paris）。这些文献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全得助于一名姓富凯、名让-弗朗索瓦[①]的耶稣会（Jesuit）教士。富凯先生去中国后，还入乡随俗，起了个中文名叫傅圣泽。有关胡先生的这些文件得以存世，也是傅圣泽在其负罪感的主观驱使下搜集记录而成的。另外，这位耶稣会教士也正是 1722 年将胡若望从广州带至欧洲之始作俑者。当胡先生于 1726 年从法国回到中国后，一些对傅圣泽相当不利的谣言在巴黎和罗马的神职人员和上层社会中暗传不断。那些谣言的详情不甚明了，只是说傅圣泽在许多方面不光彩地对待了中国信徒胡若望。傅圣泽在情急之下，为保护其不错的名声，写了一份长长的说明来解释他与胡先生之间的关系。这份说明后来在他的一个特定的朋友与资深神职人员圈

① 让-弗朗索瓦·富凯（Jean-François Foucquet），旧译为金·福然考依司·福奎特。——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后同。

中流传。傅圣泽将他此份说明称之为"Récit Fidéle"，意为"真实之叙述"。

此"真实之叙述"共有三份流传后世，其中的一份还曾落入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Simon)之手。圣西蒙公爵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的著名编年史家，当时也是傅圣泽的朋友之一。"真实之叙述"也因此藉以与圣西蒙公爵的其他文章被法国国家档案馆收藏。另一份"真实之叙述"则在18世纪晚些时候流进市场，到了19世纪由人捐赠，进了大不列颠图书馆。现存的最后一份"真实之叙述"手稿则与傅圣泽其他未出版的稿件、日记以及信件一起被送到天主教档案馆收藏起来，送馆时间可能在1741年，傅圣泽去世之后。

三份"真实之叙述"手稿中每一份均有作者添写在稿纸边角处的注释和评语，显出作者一俟得暇便尽心竭力地仔细推敲润色，以阐明其叙述之真实性与准确性。与收藏在罗马和伦敦的手稿相比，法国的那一份手稿所追加的注释稍稍少些，暗示该手稿为最早版本。那份手稿也许是作者以私人名义送给圣西门的，藉望以圣西门的名人效应为傅圣泽洗去不誉之名声。另一方面，收藏于大不列颠图书馆的稿本不但比其他两份多插入了一两份信件，而且还有更多的边注和脚注。由于该稿本中的部分残缺文章及参考文献是以后插入的，它们明显地并不属于原始手稿中的一部分，从而也暗示了该稿本是中期版本。

至于收藏于罗马教皇图书室中的那份稿本，其中不仅有不见于巴黎和伦敦稿本中的一些注释与笔记，突显出该稿本为三份稿本中的最后修订本，而且其中还含有一组极为珍贵的附加信件。该组信件以字母分类标记，从A到N。从该组附加信件中不但可以发现稿本的全部修改内容，其珍贵之处更是在于：在其他两份"真实之叙述"稿本里的相同之处，不是被改写就是被

删去了。除此之外，这一组扎在一起的信件与罗马的稿本是整个接连着的，一致提示了胡先生去世之年当在 1724 年与 1725 年之间。若欲知该方面的详细情节，读者可参考傅圣泽与另一耶稣会神父皮埃尔·戈维尔[①]的通信内容。

收藏于梵蒂冈罗马教皇图书馆中的有关胡若望的其他文件，被放在 17 与 18 世纪有关中国档案的杂项类中。其中有一封信，是由胡先生本人用中文写给傅圣泽神父的。这是目前为止仅存的一封胡先生的亲笔信。某些证据显示这封信写于 1725 年 10 月以前。关于胡先生在欧洲旅行的相关旁证，还可从当时广州地方资深官员呈报给清朝皇帝的几封机密要件中得到。机密要件中详细记载了胡先生去欧洲所乘坐的法国船队进出广州港的日期和时间。这些机密要件现被保存在北京西华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②]内，近年来还出版了影印本。机密要件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胡先生的名字，但写报告的广州地方资深官员却提供了有关樊守义（教名 Louis Fan）的重要信息。樊守义也是去过欧洲旅行的中国人，他在去欧洲前皈依了基督教。樊守义在欧洲住了十余年，并在胡先生出发去欧洲的前一年回到了中国。除此之外，其他有关胡先生故事的部分情节还可从早期的巴黎警察档案以及沙榔东[③]医院精神病专科主任们留下的医疗记录档案中得到补充。这些档案现被保存在位于巴黎市内的法国国家档案馆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个肆意断章取义胡先生故事的版本还曾经在 1764 年发表过。那是一份名为

---

① 皮埃尔·戈维尔（Pierre de Goville），中文名为戈维理。

② 若按英语原著直译，为"中国第一明清档案馆"，应为主要收藏明清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见 Endymion Wilkinson, 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69—879 页。

③ 沙榔东（Charenton），今译沙朗通。

lettres Juives 的时事通讯。大作家伏尔泰[1]还曾摘录过该文的片断，并在添枝加叶后将其收录于他的大作《哲学辞典》中。

纵观全部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要想知道胡先生的详细情况，无论如何非得依靠傅圣泽不可。有趣的是，不同于某些监护我们命运的现代人，傅圣泽并未采取以销毁记录来刻意证明自身清白的做法。反之，他将手中所有的备忘录和信件仔细地保存下来并立档，即使某些材料与他的观点相左也不例外。傅圣泽还复写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文件，并坚信全面的记录将会为他的正确观点提供支持。平心而论，虽然我难以苟同傅圣泽神父对待胡先生的为人之道，但其对原始材料的处理方法却使我能作出上述判断。在史料面前，即使我现在面对傅圣泽，断其功过，在成功地保留了他与胡先生关系诸文件这一点上，傅圣泽仍不愧是个大赢家。

---

①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为法国启蒙运动最有影响人物之一，曾根据有限的资料，写过一些评论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章　宿疑 …… 1
第二章　出发 …… 5
第三章　海上之旅 …… 33
第四章　接近欧洲大陆 …… 51
第五章　在法国各省 …… 67
第六章　巴黎 …… 85
第七章　独闯奥尔良 …… 107
第八章　通向沙榔东 …… 115

第九章　身陷精神病院 …… 127

第十章　重见天日 …… 143

第十一章　返乡 …… 159

注释 …… 164

参考书目 …… 204

宿　疑

第一章

1725年10月12日，星期五，沙榔东，巴黎近郊

我们的这位胡先生，具体地说，胡若望先生，此时双脚站在接待厅门道内，伸长着脖子把头探进室内，两眼转个不停，向里张望了一阵。室内，几十个穿着教士长袍的神职人员占满了所有的长椅。室外，给胡若望套上外衣并将他从牢房押送到此的管理人员紧紧地夹在他的两侧，以防他因受刺激而做出某种意外的激烈举动。胡若望本人并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被押送到这里来，因为不但没人告诉他，而且也没人能有办法告诉他。胡若望不懂法语，根本不可能开口用法语询问任何问题，而将他押送到此的人对中文也一窍不通。

两年半前，胡若望被当作精神病患者送进了位于沙榔东的医院，自此与世隔绝。由于从中国带来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此时的胡若望身上套着又脏又破的中国式短衫和衬裤，脚上一双早已不成型的中式袜子紧绷绷地塞在烂了个大破口子的烂布鞋里。他的肩上还耷拉着半截欧式短外套，一头鸡窝似的长头发则顺着后脑勺乱趴在后肩。“他看上去就像刚从棺材中挖出来的死尸，脸色惨白、憔悴。”当时在场的戈维理神父在遇到胡若望三天后写道：“由于既无好身材，又无动人的、表面胜于他实际处境的面孔，他看上去更像个深受饥饿折磨的流浪者或叫化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知文识字的中国人。”

戈维理神父当时也在室内，与别的神父挤在室内一隅的一条长凳上。胡若望头伸到室内时，戈维理神父用汉语向他打了声招呼。这突如其来的乡音，使胡若望的耳根子猛然一震，心跳顿时加速，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他迅即往声音发出的地方扭转头去。当胡若望看到戈维理时，他身后墙上挂着的镶在镀金画

框内的基督教油画也同时映入视线。见到画中有副十字架，胡若望忽地举手冲它一指，不顾大庭广众的惊异目光，扑通一声，合起双膝倒地就拜。一连磕了五个响头之后，他方才缓缓爬起。这是胡若望用他自己的方式对画中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表示的尊敬。随后，胡若望走进室内，以中国式的礼仪，双手抱拳、低头鞠躬，向每一个人打招呼。然后，在众人的力劝下，他才在一张凳子上弯腰落座。

胡若望和戈维理神父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戈维理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这是因为他在中国，主要在广州地区作为传教士生活了二十三年之久。当英国商人在该地找不到愿意给他们作翻译的中国人时，戈维理神父还帮忙兼做翻译。戈维理不仅询问了胡若望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几近衣不遮体、一贫如洗的困境，还问了胡若望为什么没有与傅圣泽神父签订工作合同的原因。那是因为是后者把他从中国带到法国来的。胡若望口齿清楚地详细回答了戈维理的每一个问题。最后，当戈维理神父问胡若望是否有问题要问他时，胡若望明明白白地表示他有一个千思不解的宿疑。那就是：“他们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第二章

出　发

1721年9月30日，星期二，中国广州

胡若望被任命担任门卫。他是多梅尼可·培罗尼(Domenico Perroni)神父亲自决定的人选。在中国的培罗尼神父入乡随俗，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潘如。潘如神父当时的职责是为罗马福音传信部(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管理中国广州当地的天主教圣公会[1]。这个天主教圣公会代表罗马教皇，或者可以说企图代表罗马教皇，在广州[2]地区进行各种传教活动。胡若望的工作则是检查所有进出这个天主教圣公会的人员。圣公会坐落在一个大院内。大院里不但有座颇具规模的教堂，还有潘如神父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人员以及其他住户。对于门卫而言，有时是否允许来访客人进入这个大院，其判断全凭微妙的直觉经验。广州人易躁，西方人在当地经常不受欢迎。

让胡若望当门卫似乎是个明智的决定。胡氏年庚四十，是个鳏夫。其妻数年前去世，留给他一个不日即将长大成人的男孩。胡氏以后未再续弦。胡若望也有不少兄弟，在家里，他除了育子养母外，还扶养着一个弟弟，四人共居一处。胡若望全家虽然住在广州，但他的祖籍却并非本地。他出生在广州城外西南地区的乡间，该地河溪曲绕，靠近商业城市佛山的延伸区域，属于珠江三角洲。尽管胡氏祖先数代前早已从北面的江西迁到广州，但胡若望仍自认为他是个江西老俵。另一方面，胡若望还是个相当有学究气派、并极虔诚地向往学术的人。在当时的中国，

---

① 天主教圣公会(The Sacred Congregation)，也译作罗马神圣会。

② 原文Canton，应指广州，明朝时亦以广州称之。作者将广东省写为province of Guangdong。

如果有人被说成有“学究气派”，并不表示他通晓哪门欧洲语言，但却意味着此公通过了保证其日后仕途的科举考试，知文识字，能写工整的毛笔字，还通达古词旧诗。由于职务的需要，该人还会将每一需要记录的事项笔录下来。知文识字的重要性，从潘如神父的一个侍者在8月份时曾搞错一封极其重要的信函一事上就可看出。那位侍者当时是华南地区圣公会的下级管理员。作为下级管理员，其职务包括处理圣公会与地方传教士以及罗马教廷之间相当机密的通信联系事务。在那次事件中，此人将本来应该寄给耶稣会的信，错寄给了其竞争对手之一的另一个教派。那个教派是方济各会(Franciscan)。在中文中，方济各会的别称和圣公会为同音异体字。可以想见，这封错投的信所产生的结果是非常令人尴尬的，甚至有损耶稣会的扩展。因为方济各会当时为扩大发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该封信中所罗列的重要信息。

胡若望献身于基督，其长年以来的信仰虔诚是有目共睹的。他是在1700年十九岁时入教的。当时耶稣会的神父盖司帕·卡司呢(Gaspar Castner)和若望·劳瑞提(John Laureati)在佛山一带大力布道，为建教堂和营造一个生气勃勃的基督信仰区日夜奔波。胡若望受浸时，取了教名若望(John)，以示对若望·劳瑞提神父的敬意。他的儿子出生时，也接受了洗礼，还以盖司帕(Gaspar)为其教名。显然，这同样是胡若望用以表示对盖司帕·卡司呢神父的敬仰之意。

由于对基督的了解以及他本人对基督教的坚定信仰，胡若望还被挑选为可直接接触圣公会的传道师之一。这个职位的任命可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当时在广州，华人传道师在基督信仰方面的勤勉和虔诚有着相当令人羡慕的名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中国人同本国人谈论宗教信仰问题远比同西方人

谈论要直率得多，欧洲传教士往往让华人传道师接触那些可能会入教的人，去发现那些人的内在疑虑，并帮助解决那些人的家庭困难。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通常妨碍他们宗教信仰的升华。

华人传道师还努力在公共事务上尽力。他们每天清晨清扫街道，照看被某些绝望的父母所遗弃的婴儿。那些孤儿通常因患病或营养失调而在生死边缘挣扎。这些孤儿被带到有华人传道师驻扎的各类传教机构，并立即受洗。受洗后的孤儿要是不幸早夭，那他会被认为至少已得到了上帝的恩泽；要是生存下来，那么中国基督徒的家庭就会收养这些小信徒。除此之外，传道师还有与医院工作人员共同治疗弃婴的协定。譬如，当医院工作人员告诉传道师有孩子去世时，传道师会立即奔赴医院为该孩子洗礼（欧洲来的神父是不敢贸然去医院里面的，因为那里一直有汗流浃背、玉肌隐现的当班女护士，万一出现丑闻，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广州，天主教在1719年曾为一百三十六个婴儿洗礼；1721年曾为二百四十一个婴儿洗礼，尽管老天爷知道到底有多少其他婴儿被抛弃在荒野或市井、不幸早早夭逝。

18世纪的广州府怎么说来也算得上是个大城市。如果必须将坐骑留在郊外而坐竹轿进城，没有一小时是到不了市中心的。住在广州当地的欧洲人猜测，当时城市人口大约有一百万。熟悉广州也了解巴黎的人则认为广州与巴黎一样大。不过由于广州的建筑大都以单层为主，真正的面积很难估算。广州府由四个相互毗连的城市组成。在珠江北岸离水不远、以围墙隔起的地区被称为“中国城”，地方总督衙门就设在该城内。总督的主要职责是皇帝的对外贸易顾问，欧洲人把总督的官名翻译为“Hoppo”。中国城内街道狭窄、商店毗连，到处挤满了人。在中国城的北面则是另一个用围墙隔起的区域，称“满洲城”或“鞑靼城”。这是满洲人占领中国后建造的。满洲城内驻扎着满洲人

的卫戍部队，广州府的官衙也在其中。城内的街道宽敞、气派，路面铺着排列有序的石块和石板。大街上还有数座两侧对称、成一条直线矗立的凯旋式拱门，将街道点缀得颇为壮观。此外，满洲城内还有一些风格独特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是正规的楼房，为当地官吏举行科举会考以及举办庄严的祭孔大典所用。在这两座被围起来的城市西面，则又是另一个城市，也就是广州商业和居住区的心脏。街道上平整地铺着青石板。沿江一带被商铺、住家以及一些殷实的商家所拥有的货栈挤得寸土不留。这个区域洋溢着富裕和成熟的舒适气氛。大街上处处支着大布篷，用来挡隔火焰般的盛夏烈日。第四个城市则沿珠江边缘而建，其部分还嵌在江中水路及运河中迷宫般的小块土地上。这里是赤贫如洗的百姓和船民的王国，大小木船林林队列，混杂的桅杆直插云天，一望无际。一个法国观察家将这种景象形容为："船排成船街，船街排成大道。"

欧洲来的居民分居在广州几个不同的区域之内。在城的西郊，有些欧洲风格的教堂，葡萄牙耶稣会信徒与传教士住在那一带；在中国城的北郊，则住着法国耶稣会信徒与传教士。在那两个地区之间，则混杂着其他教派和罗马福音传信部所属的圣公会。在江边的那块地区，即紧挨着中国城与西郊的南边，有属于法国人的货栈和守卫室。西方商人称之为"工厂"。这块地区属于最繁荣的地段之一，是法国人以精明的交涉手段从中国官吏那里取得的，他们同时也得到了永久居住权。而从其他西方国家来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如英国人、荷兰人，以及哈布斯堡朝皇帝的奥斯坦德[①]的臣民们，则像广州的雨季周期和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国际政治一样，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

① 奥斯坦德(Ostende)，为今比利时城市，市内有国际海港。

进出中国的葡萄牙船只可以利用该国所占领的离广州不远的殖民地澳门。而其他西方国家到广州的远洋船，则必须抛锚停在珠江下游10英里之外的黄埔岛(Whampoa Island)边。岛上，总督大人的下属对外国船只进行注册登记、测量船体大小以确定关税。也在这岛上，大批已被购买的货物等着被装运到欧洲。岛上还有用竹子搭建的简易房子并存放着不少席子。席子不但用于晒干船帆和储藏补给品，身体体弱或生病的水手还将其作为休息与运动的用品。此外，远洋船上的西方商人和水手要是想去广州的话，必须从该岛搭乘由中国人驾驶的小艇或舢板。

在广州，罗马天主教圣公会成了所有欧洲人生活的中心。圣公会的潘如神父是个大忙人，平日连坐下的时间也难得抽出。他每日不是为公职要到其他教会去，就是去澳门。而潘如神父近来更是忙得连走路都两袖生风，脚跟不着地。这是因为神父要为眼下正在中国的罗马教皇特使嘉乐(Carlo Mezzabarba)的回国安排各种具体事项。尽管如此，当潘如神父不在本地时，令人兴奋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举个例子说，樊守义〔教名路易·樊(Louis Fan)〕去年就曾到过本地。作为一个山西省北部出生的天主教皈依者，他在旅居欧洲十年后，令人吃惊地又返回故国。樊守义皈依天主教之后，担任耶稣会传教士福然塞司蔻·浦荛瓦纳(Francesco Provana)的助手，福然塞司蔻·浦荛瓦纳中文名为艾若瑟[①]。当

---

① 艾若瑟(Provana，1662—1720)，神父，原名 Antonio Francesco G Provana，生前为耶稣会传教士。1707年受康熙皇帝所嘱，携助手樊守义共赴罗马，向教皇阐明清朝政府对祭祖敬孔的立场、中国天主教徒对祭祖敬孔的信念以及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为推广布道，大多认可中国人祭祖敬孔的传统等问题，但诸解释均因与教会立场相左而遭罗马教皇与教廷坚拒。艾若瑟终在1720年与樊守义乘船回中国，考虑到今后在中国将面临的传教工作之困难，艾若瑟所受打击之大，精神负担之重均可想见。

康熙皇帝颁下圣旨，命令艾若瑟到罗马面见教皇，去完成一项特殊外交使命时，艾若瑟便带着樊守义一起上了路。他们先到了葡萄牙，然后再从那儿到了意大利。在欧洲，樊守义目睹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异邦城市及内海，并亲眼见证了自然与人间的奇迹。樊氏在意大利时，还两次被教皇召见。他学习意大利语，并且最终还被晋升为牧师。十年后，功成名就的樊守义与艾若瑟神父又一同搭船返回中国。但不幸的是艾若瑟神父意外地在船上因病撒手西归。当他们所搭乘的船最终在澳门码头靠岸时，樊守义紧护着安放神父遗体的棺木一起上了岸。澳门军方和政府将此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驿站飞马速报康熙皇帝，樊守义本人则在清朝帝国军队的保护下由内陆的水路被护送到了广州。在广州，樊守义寄宿在天主教神父宿舍。地方总督和康熙皇帝的一个特使不久便召见了他。不及几日，政府送来皇帝的命令，传唤他去北京当面向皇帝禀报。出发之前，这位亲身渡过西洋的中国人樊先生甚至还开始动笔写起自传来。

尽管樊守义的欧洲探险经历可能被大多数人逐渐淡忘并被当成一种逸闻，但在圣公会内部，外部世界的情况却通过来访者源源不断地输进我们这个门卫兼管理员胡若望的脑海里。譬如教皇特使那儿经常派人来访，这些人亦并非属于同一教派。除了耶稣会教士，还有奥古斯丁会教士（Augustinians）、方济各会教士（Franciscans）以及多明我会教士[①]，而这些人都是教皇特使团的成员。此外，出入于胡若望所在圣公会的，还有刚从码头下船的法、英商人，船上的管理人员，法国工厂的总管与厂里的职员，以及称之为法国东印度公司的（Compagnie des Indes）国有贸易公司人员。

---

① 多明我会教士（Dominicans），另译为道明会教士或多米尼克教士。

在这种环境下，胡若望的眼界变得开阔了，他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要到罗马，他要觐见教皇。

1721年10月6日，星期一，广州

傅圣泽神父终于熬过又一场重病，感觉稍稍好了些。8月份以来神父一直病倒在床，死神甚至几度向他招手。神父的重病早在年初就有征兆。当初他在严冬季节从北京一路南下，过长江时又被顶头风吹个正着，身体受寒，以致落下病根。

神父的病症现在减轻了，健康也正在逐渐恢复。可另一方面，他也实实在在地失去了两个多月宝贵的写作时间。经过一场大病，神父最近对人必有生死之宿命有了切实深刻的体会。他留下的信中也流露了时年四十七岁的他惟恐其毕生的研究在即将开花结果时因非命而被毁于一旦之心境："今年我正值生辰四十七岁。所谓一年光阴，虽仅仅为六个月之两倍，但于我而言，是极其珍贵的。"感到万幸的神父，还有其他可想见的原因更使他自我感觉良好。那就是他与众不同的一些特殊观点。尽管他的这些观点鹤立鸡群，且使他的上级对他颇不以为然，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些上级多半比他年轻，神父认为他们不过是有预谋地在干涉他的研究工作。

严格地说，1722年3月12日之前，傅圣泽神父还不到四十七岁。小小的夸张也大可原谅，因为神父本人已确实活得够充实、够长久的了。傅圣泽生于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地勃艮第的韦兹莱镇。他毕业于巴黎路易-拉-古兰特(Louis-le-Grand)耶稣会神学院，并在1681年他十六岁那年皈依了修道会。二十岁以

后，傅圣泽在神学院给那些新从法国各省来到学院寄宿学习的年轻学生讲授数学，并当他们的个人教授。傅圣泽在1693年被授予牧师资格，次年他自愿报名到远东传教。当时他并没有刻意指定哪个国家，因为对他来讲，无论挑选他去日本、暹罗或是中国任何一国去传教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被挑中去中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①]鼓励法国神父到中国去，以加强法国在中国的影响。傅圣泽于1699年到达厦门，之后在福建和江西两省传教了很长一段时间。1711年，傅圣泽作为翻译解读中国古典作品《易经》的专家被召进北京。

1720年11月，也是傅圣泽到达中国九年之后，他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要他离京由陆路南下广州。尽管这些年来他一直要求上级教会召他回欧洲，为的是找个安静的场所来完成他的学术著作，但他却从未想到他得如此匆忙地动身。傅圣泽在北京的上级仅仅给了他八天时间收拾行李、大批书籍和笔记。尽管傅圣泽雇了十六匹骡子并使每一匹骡子尽可能地多载，也仅仅刚能带走他那庞大藏书中的一部分。出于无奈，他不得不忍痛将一千二百卷书籍文件留下。那些无法带走的文件都是他匆匆记下的备忘录以及在书页空白处写有注释的书籍。这些文件中的一部分后来被装进三个箱子，由水路托运到了广州，但那已经是傅圣泽离开广州之后的事了。其他未能带走的笔记书信等足可堆成个小山包，但最后却无可奈何地遭到毁弃的命运。

---

① 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法国国王，人称“太阳王”。其执政时期(1643—1715)是法国封建社会最强盛时期。优雅的上层社会礼仪、语言及外交辞令得到高度发展，影响以后整个欧洲。政治体制上，路易十四加强专政的结果使得贵族势力变衰，中央彻底集权，权力则系国王一身，为以后法国大革命，全国陷入血腥残杀设下隐患。而其邻国英国封建制度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贵族势力的加强，实施的是另一种较温和的模式。

傅圣泽原先期望他能赶上来到广州的法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借冬天的季风扬帆返欧时将他带走。他的上司也曾以同样的理由告诉他为什么会让他如此匆忙上路。然而，当他带病结束了艰难的严冬之旅，于2月20日匆匆赶到广州时，却发现码头上没有一艘法国来船。傅圣泽不得不浪费整整一年时间，望眼欲穿地等待姗姗来迟的法国商船。那些本应抵达的法国船也算是运气不佳，竟然因各种原因错过了东南亚季风而无法在冬季到广州，不得不在海上白白地漂悠了整整一冬。

傅圣泽自己的中文藏书在广州被重新整理打包，装进了十一个大木板箱内。此外还有其他七个大木板箱，里面塞满了傅圣泽在南京书市购买的中文书籍。那些书籍是准备送给巴黎国王图书馆的。傅圣泽负担了该批书籍的部分书款，余下的由法国东印度公司负责。但总的说来，最使傅圣泽操心的还是他自己的那十一个大木板箱，里面注满了他毕生研究的心血。其中有他翻译并诠释、自认为最能阐明真正宗教奥深意义的中国古籍。他深信他的诠释可以拯救因在中国的错误传教方式而逐渐失去民众信仰的天主教传播工作。傅圣泽的这十一个大木板箱里共有近四千册左右的书籍和文件。他钟爱地把它们分类为十四个不同的项目。

在中国的经典中，“五经”具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其中的《易经》和其他四本古典构成了礼仪、诗歌和历史的正式典籍。这五部经典再加上孔子的《论语》以及其他著作，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所用的基本教材，它们和中国各朝代的历史共生共存。在中国原始宗教的道教中，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以及一般的古典注释、哲学思索、科学、政府、教育以及礼仪中全都深深地烙有“五经”的影子。佛教经典则被排在正式典籍中的末位。一般认为佛教代表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佛教经典往往与注释的虚构故事搅在一起。譬如，明代以流浪汉冒险事

迹为题材的佛僧去印度取经之《西游记》，以及那些成打的、由各种天主教传教士用中文编写的题材都可作为不错的例子来证明傅圣泽的这一论断。傅圣泽还亲手写了长达四十八页之多的分类条目，来为自己的这一论断作证。

傅圣泽神父总共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在中国，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证实三个他已经基本洞悉的研究上：1）中国原始宗教经典是神圣的，它们是真正的上帝亲手交给中国人的，如《易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中国圣书中提到的“道”代表了同一真正的上帝，也就是对耶稣的信奉；3）与天主教相同的神圣重要性在中文哲学词汇“太极”中也得到了体现。“太极”在众多的经典中屡被使用，而它与最根本的宇宙真理有关。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对怀疑其观点的人，甚至敌对的上级，傅圣泽将他们的论点都逐字逐句一一录下。他甚至还将这些论点逐条单列，并将它们收进自己特编的专题论集中。此外，他在自己的论点中多处引征《易经》，以旁证他最大的研究成果。举例来说，中国人相信有超自然的神圣力量。那种所谓的神圣力量超越欲望和世俗的混杂，存在于静静肃穆的冥冥宇宙之中。每到春天，它不奈寂寞而动，从而使万物成长并惠助人类。傅圣泽因而指出：如能正确阅读《易经》，应该很容易从《易经》中发现诸此万物的欲望已经降临到人世间。《易经》中伴有数千个诡秘的说明，恰如基督化身随带的暗示。又譬如，《易经》中的第十三个卦形[①]明白无误地讲出了生命的来源（the Coming of Emmanuel），以及失去了天真的世俗世界的悲哀。而第十四个卦形

① 中国古代以“—”代表阳，以“--”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排列组成八种不同形式，称为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不同事物。以八卦互相搭配又可得六十四卦，以象征自然和人事现象，当时多用来占卜。《易经》对八卦诸形及所示现象有详细论述。

则显示了恶敌将如何在三个长长的年头里与上帝作战并反抗上帝的律法。再譬如，第二十四个卦形讲的是万物诞生，第四十九个卦形则讲的是当上帝的羊群[①]各自走散后，上帝要将其中较大的一群带回家之意图。傅圣泽根据他这样的研究观察而下定论道："当天下大众重新团聚时，八卦明白无误地预言出，人类最早的国家会更新，那将是整个世界的首次洪福。届时，一道宏伟炫目的亮光将普照世界各民族。芸芸众生将因而所知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就是上帝，他们也将因此而臣服于上帝。"

以上就是傅圣泽的研究要点。傅圣泽的激情所在就是掀去蒙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某些词汇语义的光华纱巾，使其原意大白于天下。那是何等伟大而鼓舞人心的工作："如此大业令人越干心越甜，再苦再难我也感到津津有味，其乐无穷。"

正因为如此，这项工作既费时又艰巨无比。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傅圣泽已将多年的宝贵时光浸沉于研读早期的中国古籍，以期找出通往真谛的线索。工作之艰巨还体现在：仅仅誊写一小部分章节就需数天甚至数周，尚且还有那么多的其他事情要做。当傅圣泽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拥有过几个中国人秘书和助理。那些助手不但帮他誊写大篇的中文章节，还学会抄写他用意大利语、法语和拉丁语写的信件。有趣的是那些秘书助理对外语虽然一窍不通，但他们将薄薄的宣纸铺在原稿上，按原稿的外文字母依样画葫芦，誊写得惟妙惟肖。可惜的是好景不长，1718年，有人暗中指责傅圣泽使用中国助手的行为违反了传教士甘愿保持清贫生活的誓言，傅圣泽的上司们于是一致决定禁止他再雇用任何中国人。对这样的决定，傅圣泽情绪上相当抵触，他认为上司反对他雇用中国人的真正原因绝对是醉翁之意

① 即臣民、信徒。

不在酒，目的不过是阻碍他搞出成果来。

尽管上司有禁令，可是当傅圣泽到了广州以后，天高皇帝远，他自有变通之法。利用某个机会，傅圣泽单独会晤了两个去耶稣会教堂礼拜的中国信徒。这两人都是有一定造诣的学者，而且也热心地帮助傅圣泽所进行的研究。可惜的是他们的合作才开始，就因为傅圣泽病倒而被迫暂停。法国的船只不久就要离岸出洋了，傅圣泽将随船而去。有没有可能说服其中的一个中国人随他一起出国呢？他们可以先去巴黎，然后再到罗马。事实上早已有人开创这种先例，傅圣泽谨慎地将他所知先例和其具体想法向这两位学者和盘托出，期望能得到他们的认同和帮助。记录显示，在 1721 年 10 月之前，至少已有三个中国人去了法国，只是他们都没能回来向国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其中之一的沈福宗(教名 Michael Shen)是在 16 世纪 80 年代随柏应理神父(Father Philippe Couplet)去的欧洲。他不但见到了路易十四和詹姆斯二世(James Ⅱ)两个国王，还在牛津(Oxford)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惜他命运不济，死在了回国的船上。另一个叫黄嘉略(教名 Arcadio Huang)。他是在 1714 年被奥恩主教(Bishop De Lionne)带到巴黎的(有说黄氏第一次到巴黎是 1702 年——译注)。黄氏后来娶了个法国姑娘，生了个千金后定居在法国并为国王图书馆工作。令人扼腕的是病魔不久夺去了他的生命，留下了一对孤儿寡母。比起沈福宗和黄嘉略，樊守义(教名 Louis Fan)的事迹则相当令人振奋。对于忠心服务于西方教士的中国助手来说，樊守义的功绩也使他们赞叹不已。当樊守义与艾若瑟神父结束欧洲之行，一起乘船回国途中，艾若瑟神父不幸暴病而逝。

其后，樊氏极力保护其敬爱的神父遗体，不屈不挠地抵制着船员们欲将尸体抛入大海的企图，并最终将遗体安全运回中国。

上岸后，按照基督教的规矩，樊氏又将艾若瑟神父的遗体做了灵魂净化仪式，然后才将遗体入土下葬。樊守义本人则随后不久奉召进京，向大清皇帝禀报旅欧之经过及见闻。樊氏到达北京的当口，傅圣泽也在北京。一个绝妙无比的巧合就是大清帝国数日前才批准了傅圣泽早就提出的回欧请求，批准日期距樊守义向康熙皇帝描述欧洲大陆的一些地理和社会习俗的时间，仅仅相隔数日而已。要知道早期西方传教士想离开中国，非得获得清朝皇帝的敕许不可。

当时，正巧有两个罗马教皇的特使——嘉乐和安东尼·马哈来恩斯(Antoine Maghalaens)神父负康熙皇帝使命要到葡萄牙去，他们还决定要带个中国人助手随行。由于两位特使并没有将此事保密，傅圣泽得以将他们的计划细节探得一清二楚。中国方面，尽管康熙皇帝为国家安全着想禁止国人离境，但总有些无畏的生灵甘冒生命危险一试，并且毫不畏惧任何后果。

1721年12月13日，星期六，广州

天主教圣公会的潘如神父今天独自来到耶稣会教士住宅区，直穿大院内庭，径自走进傅圣泽神父的房间。他是来向傅圣泽传达主教口谕的：上级教会允许傅圣泽带走他的个人文库到法国，正式批文将随后送到。潘如上个星期也来过一次，那次是为传达教皇特使的指令。特使要傅圣泽抵巴黎后即去罗马，向教皇禀报基督教各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情况。

潘如神父身着长袍只身来访的举动是明智的，尤其是在最近一段时期。广州的街道近来已变得危险起来。事情发生的原委是一个从法国波倪塔(Bonitta)来的地痞混子，在广州的黄埔谋杀了一个中国人而使得中国社区出现了复仇的呼声。波倪塔

地区的贸易主管是斯卡特古德(Scattergood)先生。虽然全副武装的中国官府兵丁在街上巡逻,但却没有一个外国人感到安全。外国人的工厂和居住区内另有专人值勤,但是那个混子自从败事后找了个地方躲藏起来,拒不露面,没人可当面责问他。事件发生几天之后,有人发现,有个与谋杀案毫无关联的英国医生暴尸街头,身旁还躺着一具中国人尸体。那位医生是被暴民打死的。地方长官随即在卡都港[①]抓获了五个浑头浑脑的中国人并将他们投入牢狱,不为别的,就为他们事后恰巧走过该港口附近。英国商团路见不平,愤而拔刀相助,以中止贸易为要挟举行抗议,这位地方长官不久被迫将这五个无辜受冤的平民放了出来。

在中国的西方人谨慎地观察着中国官方对此类事件的反应。因为中国政府的反应可能会相当激烈。如三个圣公会传教士在1710年被投进了监狱,对他们的指控模糊不清,甚至十一年后也没正式起诉,至今他们仍身陷囹圄。这三个人中,一人曾是罗马教皇特使的翻译,一人是内科医生,另一人因为未获授权而私下企图送葡萄酒和药品给中国皇帝。仅仅为了诸如此类的原因,他们受到了清帝国的怀疑而引祸上身,在狱中白白浪费着宝贵的生命年华。

傅圣泽近日来在作宗教静修,向主祈祷,希望能给他力量,平安完成即将开始的长途旅行。由于静修期间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法国耶稣会住宅小区及教堂内,他错过了那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尽管如此,对他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去法国的船只在1月初启程的事已定。

傅圣泽是耶稣会的神父,并且栖身于法国耶稣会在中国城

① 卡都港,原文为"Cadogan,"此处为音译。

中的宿舍，但他的整个身心却深深地沉浸于罗马圣公会的世界中。这是因为圣公会直接从罗马教皇那里得到指令，而耶稣会却不是。通过与罗马教皇特使嘉乐的直接联系，通过直接接受罗马的指令，傅圣泽感觉到他在知性上与其耶稣会的同仁已逐渐疏远开来。因为他的同仁并不认同他的所谓中国古籍中具有重要宗教意象之观点，而固守中国礼仪乃是独立的、与西方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认识，从而拒绝相信中国人生来就有宗教理性的说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这种思维比较容易使中国文人皈依上帝。偏偏那些文人在认同一神教的基督教同时，又祭拜自己的祖宗，并且还肆无忌惮地违反罗马教皇不许祭祖的禁令。法国在广州的传教机构负责人皮埃尔·戈维尔，即中文名字叫戈维理的神父有时到傅圣泽的房间，和傅圣泽长时间地讨论诸如此类问题。戈维理神父是傅圣泽的上级，但比傅圣泽小三岁。比起戈维理神父来，傅圣泽与潘如显得更志同道合，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两人从 6 月起就结为挚友，在一起除了讨论教会政治、当地官方对传教的敌意、教皇特使在外交使命上遇到的麻烦等等之外，还论及对傅圣泽将要在欧洲展开的活动，以及对其结果的期待。

在收到教皇特使的敕令前，尚在北京的傅圣泽曾向戈维理神父寄出一封长信，恳请戈维理批准傅圣泽将自己的那些书运出北京。信中还提出，傅圣泽希望将其从欧洲订购的其他一些书随身再带回去。那些书是傅圣泽从最近才驶入广州港的法国船上取下来的。戈维理在所有权问题上是墨守成规的人，他认为傅圣泽想要带走的书籍中的一部分应该留在中国，因为那些书不仅是耶稣会付款订购，应属于教会的财产，而且广州的耶稣会也极需要一个像样的学术性图书馆。于是戈维理反其道而行之，在回信中一本正经地向傅圣泽述说耶稣会目前财政极端紧

缺，已陷入捉襟见肘之窘况，要傅圣泽把适量的书留下。但这一答复遭到傅圣泽的激烈反对："难道我真的想把这些货物带走以为自己私用不成？难道我从事贸易不成？对我而言，这些书难道像漂亮的衣服、商品，或是多余的奢侈品？"傅圣泽烦恼的事已经够多的了。长途海上旅行即将开始，如果他不在登船前浪费时间，他可以省去在旅途中不得不整理图书的麻烦。他告诉戈维理，如果戈维理愿意的话，一旦他登上法国的码头，他会直接将这些书或由水路邮回中国，或送给法国境内的某个耶稣会分部。

傅圣泽在戈维理神父那儿信用度不高。戈维理屡屡不信傅圣泽的诺言。对于傅圣泽的陈述与请求，他反驳道：要带走的中文书在广州也许可以找到代用的，但对那些已上岸的昂贵欧洲书籍又如何作解呢？这批书中包括伯卡乔写的《异教神的宗谱》(Boccaccio, The Genealogy of the Pagan Gods)、第谷·布拉赫的《天文学》(Tycho Brahe, Astronomy)、皮考·德拉·弥然都拉与马库罗比尤斯(Pico della Mirandola, Macrobius)合著的有关希腊人来源的书、要价28法郎的李普遂斯(Lipsius)十二卷大作。尤其是霍夫曼(Hoffman)编写的四本大辞典，它们对折装订，书价高至122法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傅圣泽毫不为所动，他不仅要把书都随身带走，还要从耶稣会得到赔偿。不过傅圣泽这两种想法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实现。因为戈维理是很坚持原则的人，而且他俩的想法又如此南辕北辙。戈维理神父不但要傅圣泽付出钱来，还要他把书留在中国。

这些日子，这些书的归属去留问题就像一块石头堵在傅圣泽的心窝，压得他白日心神不安，夜半辗转难眠。僵持之下，最后还是教皇特使下令，准许傅圣泽将其所有的书籍，或至少已托运到广州的书装船邮回法国。傅圣泽胜出此局，在向顶头上司

转交了教皇特使的手令后，其心头之痛也随之消去。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另外一件使他牵肠挂肚的事。随着行期的逼近，神父也愈发为此事茶饭不思。那就是，他傅圣泽是否能找到他所需要的、并愿与他同去欧洲的中国人助手？傅圣泽相信那两个出席广州教堂弥撒的中国文人会对此事有兴趣，并且他俩看上去也像是相当合适的人选。他们举止优雅，穿着整洁，且有必要的语言技能。如放手让他们去做，他们甚至可以为傅圣泽作文字翻译。两人中的任何一人如能与傅圣泽共渡大洋去法国，在漫长的旅途中傅圣泽还能巩固他已比较熟练的汉语口语。因为外语中的有些话是要日日操练才不会生疏的。但是奇怪得很，这两个人不知怎么竟然都失去了随傅圣泽去欧洲的兴趣。百般生疑的傅圣泽私下琢磨：戈维理神父肯定在背后搞了鬼。

1721年12月22日，星期一，广州

傅圣泽今日到圣公会大院拜访了潘如神父。再过两个星期远洋船就要启程了，可他到目前为止仍未找到中国助手。潘如关系多，一定能帮上他这个忙。

傅圣泽在这件事上颇受挫折，几度灰心丧气。尤其在他运用其绝顶的聪明才智，最终顺利地将装在十一个大木板箱里的书成功交付，并完成托运手续后的一些日子里。为他托运书籍的是停在黄埔（Whampoa）码头的三艘法国大帆船。它们分别是“嘎拉提”号（Galatée）、“马武喏”号（Maure）和“康蒂王子”号（Prince de Conti）。傅圣泽还仔细地研究过这三艘船的航线。这是因为他到欧洲的旅行取决于该三艘船的航线与日程。“马武喏”号和“康蒂王子”号在1721年到达广州前，曾因错过了1720年的最后一次季风而不得不在海南岛抛锚，白白地在岛上

等了六个月。“嘎拉提”号则更惨，它被迫在交趾支那[1]海岸外的秃鹰岛(Poulo Condor)——一个荒凉的岛上停留了整整一个冬天。那个小岛简直就是个毫无生气的岛，既无可食野果也无有趣之处。只有一个日日受苦煎熬的法国人开拓团以及一些士兵，在岛上竭力建造着一个海军基地。“嘎拉提”号总算在8月份到了广州，还顺便捎去了许多无精打采的开拓团队员。这些队员们离岛后，将他们未完成的计划与部分伙伴，留给了小岛的自然界和岛上的猴群。对于这些欧洲船只进出中国，清政府是密切留意着的。地方政府官员一字不漏地向北京的皇帝禀报所有法国船只的靠岸时间。三艘船中，“康蒂王子”号被认为是最快的，理应最先到法国。傅圣泽已同该船船长保古然德(Baugrand)先生打过招呼，说如果他能找到一个中国助手的话，希望船长也允许让该中国人搭乘。如此一来，傅圣泽就能乘这艘快船在5月或6月到达法国了。

对将来的计划，傅圣泽也是个思考缜密的人。他已打听到在广州财政方面最吃重的两个法国人。一个是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工厂的总管德·拉·布热特施(de la Bretesche)先生，另一个是总管的副手垂北特·德·屈维尔(Tribert de Treville)先生。中国政府自1689年开始就允许法国工厂的总管们居住广州。因为他们愿意表演那种正式的、伏地磕头的礼节，中国方面礼尚往来，也总是得体地对待他们。

德·拉·布热特施先生和垂北特·德·屈维尔先生都来自南特(Nantes)，那儿是个与中国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大港。根据协定，从中国运来的货物先在布列塔尼的路易港(Port Louis)停留，然后转到南特装卸货。布热特施先生离开法国前，还受命购

---

① 交趾支那，即南圻，系越南旧行政区之一。

买宗教、政治、科学、人文艺术和语言方面的中国经典。当时法国的摄政是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颇具先见之明,鼎力相助而促成其事,还提供钱款以具体落实。买书的钱是从北京和马尼拉的账户中支出来的,而这位布热特施先生就是通过那次购书认识神父傅圣泽的。当时两人在南京共同策划如何为法国国王图书馆购书,购哪几类书,傅圣泽为此还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购书清单。布热特施又委派了个中国买办,让他在南京按傅圣泽的清单按图索骥。由于缺少时间、钱款以及兴趣等各种原因,那个买办最后只购得清单上的一小部分书籍。虽然结果难尽如人意,那小小一部分书籍也还是塞满了整整十一个大木板箱。

此后,神父傅圣泽和布热特施先生的来往就多了起来。他们还经常在正式晚餐会上见面。布热特施先生是5月中旬才到中国的。为方便他能早日同中国买办打交道,傅圣泽手写了一份常用法—词汇对照表给他。作为回报,这位布热特施先生则将一些有关公司发展前景的机密情报透露给傅圣泽,其中有诸如公司要占领圣若望岛、南澳门作为海军基地之类的有关计划。此外,布热特施不但提供用于弥撒的上乘葡萄酒,而且当耶稣会准备以隆重的形式招待教皇的使节时,布热特施甚至还派遣家仆到教会帮忙,并把家中私人专用的白银餐具无偿出借给教会。

公司副主管垂北特·德·屈维尔先生对神父傅圣泽提供的援助也非同一般,远远超出傅圣泽所能期望的。有一次,屈维尔先生在虎门岛参加了一个有中国商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后,他特地从该岛赶到傅圣泽所居住的耶稣会大院,和傅圣泽交换广州地区所有有关中国礼仪方面的控告与反控告的信息,并准备了用拉丁文和法文书写的书信草稿,以送往欧洲。也正是这位讲义气的屈维尔先生后来为傅圣泽两肋插刀,将傅圣泽惟一能找到的中国助手送上了"康蒂王子"号船。不仅如此,屈维尔还

想方设法，安排了船上的每位管理人员都代为傅圣泽存放一个大木板箱在他们自己的小舱房里。此举为傅圣泽省下了一笔巨额运费。当时运费之昂贵，随意举个小小的例子就可证明。譬如，傅圣泽新近才收到从欧洲寄来的一些书，书价是 268 法郎，而运费就占了 30 法郎之多。由于运费还在进一步上涨，这十一个大木板箱的运费自然是项极沉重的负担。而对船上的管理人员来讲，比起空表欢迎姿态来，这种实质上的帮忙却要牺牲他们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因为如果他们将自己置办的货物放在个人舱房中，回国后铁保获得巨额利润。其利润之大，还远远超出他们每次的出航俸禄，甚至是俸禄的四倍或更多。傅圣泽为自己的朋友能如此鼎力相助真是喜出望外，乐不可支。现在，他的书籍都安安全全地放在了身边，随时触手可及。惟一剩下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中国助手的帮助，他仍将无法圆其实现伟业之梦。好在潘如神父保证将尽力帮助他解决这个最后的棘手难题。

172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三，广州

傅圣泽终于找到了一个可随他去欧洲的中国助手，他名叫胡若望[①]，是罗马福音传信部下属圣公会的大门门卫。

一个多星期来，胡若望几乎日日见到长胡子神父傅圣泽匆匆忙忙地进出圣公会，找潘如神父办事。傅圣泽双眼炯炯发光，一把庄严的大胡子从下颌直垂腰际。作为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的打扮是颇有特色的：他的长袍隐隐发光，内里白布衬底，外面束着一条蓝色丝绸腰带。长袍外披了一件长及膝盖

① 胡若望的本名无从所知。

的黑色宽袖半短袍，头上还有一顶圆锥窄边帽配套。傅圣泽出门必脚蹬布鞋，手持羽扇，边走边晃，颇具儒士之风。不过，傅圣泽面相虽然和蔼，但是说话冲人，口气生硬。人们在传说他不久将被教皇接见，而他自己说话时，也确实觉得好像有股子罗马高级味儿从肺腑直往外冲。

胡若望也间接听说了傅圣泽一直在找一个中国助手但至今一无所获的事。他有心一试，但又不便冒昧地直接向傅圣泽开口。于是胡若望向潘如神父披露了想接下这份差事的心愿。在确信可以找到其他合适人选来接替胡若望门卫职务的前提下，深知远洋船不久即将启航的潘如神父，立即差人将胡若望的意愿向傅圣泽作了通报。接到通报后的傅圣泽并没直接找胡若望谈话，而是先去见了潘如，向他询问了一些有关胡若望是否值得信赖、是否知文识字等问题。神父潘如如实回答，说胡若望在当门卫的三个月期间内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并拿出胡若望用毛笔复写的中文文章给傅圣泽看。大致看来，胡若望似乎足以胜任此职。

于是傅圣泽忙里抽空，找个机会简单地面试了一下胡若望。傅圣泽当时实在也只能抽出一小会儿空来。由于一直急于找人，傅圣泽在面试时为胡若望自我介绍时所表现出的自信而相当陶醉，以至于没有认真彻底地测试一下胡若望的文化功底。傅圣泽同时也注意到，胡若望皮肤黑黝，长相不雅，而且衣冠不整。不过，胡若望面试时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当时他以几近绝望的眼光看着傅圣泽，就好像他将从人间天堂被扔进荒瘠不毛之地。此时此地的胡若望对傅圣泽而言是可用的，而且胡本人也期待着这次冒险旅行。于是，各有所求的两人开始讨论服务期限等诸事项，并达成了协议。对当时的处境，傅圣泽事后写道："要么就是这个人，要么就是没有任何中国人助手。"

他们两人对达成的协议订了合同并签了字。合同规定，胡若望将作为一个抄写员替傅圣泽工作，为期五年。合同期满后，傅圣泽将允许胡若望回国并负责旅费。胡若望的基本年俸为二十两白银。年俸之外，傅圣泽还得提供胡若望食物、去欧洲的船票，以及其他旅途所需种种杂费。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傅圣泽则不必负责。合同还规定，俸银的付给必须在傅圣泽认定的条件下。这个条件为：俸银的交付将根据胡若望的抄写工作表现。抄写的对象是在"康蒂王子"号船上被托运的四千本书中所需抄写的某些书。合同之外，胡若望还要去了十两半白银作为他和家人目前暂时之需。胡若望出国后，抚养母亲的担子将落在他弟弟身上。此外，潘如神父还同意为胡若望的儿子在圣公会教堂里找一份差事。

傅圣泽还在城里为胡若望买了几套崭新的中式服装和一些旅行需用品。其中之一是一床质量上乘的棉被。被面是绣花丝面，被里衬着上等的棉絮。仅那床被子就用去了傅圣泽十五钱银子之多。对于签了字的合同，傅圣泽要给胡若望一份副本供他保留，但胡若望没要它。他不需要那玩意儿，因为他断定神父傅圣泽是个可信任之人。胡若望只是请傅圣泽神父代他藏好此合同。

事情发展至此，使得胡若望真的相信他有朝一日能觐见教皇。傅圣泽确实也曾向他稍稍提及此事，虽然未打保票但也未排除这种可能性。傅圣泽还告诉胡若望，说到了罗马后会马上给他找个体面的工作。傅圣泽能下这个保证是因为教皇特使嘉乐曾对他有过这方面的许诺。教皇特使本人现已先行启程踏上回罗马的归途了。他临走时，对傅圣泽可能要带去的中国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曾下了个泛泛的雇用保证，并甚至将他的保证写了下来。在胡若望方面，他本人还确信将来他

能将旅行见闻写成书，那样一来他返乡后便会名扬四方，地方上的父老乡亲届时将人人知道他胡若望绝非等闲之辈。对胡若望的这点儿小小的张狂，傅圣泽倒并无异议：胡若望当然会见到令人吃惊的异国风光，之后也当然会有令人刮目相看之举措。

此时他们两人尽可能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做到秘而不宣。这是因为戈维理神父一直公开反对傅圣泽带中国助手随行返欧。戈维理神父与傅圣泽不但争论过耶稣会教士应如何遵守甘愿清贫的誓言，在其他许多方面对傅圣泽的做法也持反对意见。戈维理之所以与傅圣泽意见相左，主要是看不惯傅圣泽太怪僻的宗教言行。不仅如此，戈维理神父还认为欧洲人在中国应有认真严肃的守法观念。因为近几年来广州发生了几起重大的、由欧洲人致中国人死亡的偶发事件。每一次事件发生后，中国官方就会对当地小小的欧洲人社区和教会还以颜色，直到他们收到巨款赔偿为止。最近发生的那个法国混子的纠纷就是很好的一例。在此种形势下，如果一个中国人随傅圣泽到欧洲并死在那里，那不啻将是个危险的结局。教会在中国的地位已相当脆弱，容不得再有任何其他的不祥事件。戈维理写道："我了解这些中国人。……我尤其了解广州人。"戈维理的论争并非随兴而发，他在中国已有二十个年头，到广州也有十三年了。在中国的居住年限方面，虽然傅圣泽的资历比戈维理更深，已经达到二十二年之久，但他那副倔骡子脾气却也一直伴随着他，丝毫未变。

1722年1月5日，星期一，广州，黄埔码头

傅圣泽和胡若望登上了"康蒂王子"号。这艘450吨重的商船上有七十名船员、三十条枪，船长大名为保古然德(Baugrand)。傅

圣泽登船后，船上旋即启锚升帆，离开了黄埔岛向茫茫大海驶去。

胡若望最终能登上船实在要感谢他的运气。因为前一晚上就有人透露了消息给戈维理神父，说傅圣泽已找到个中国助手。听到这个消息的戈维理迅即作出决断。他不但以傅圣泽上司的身份禁止胡若望登船，还立即拜访了工厂的正、副总管德·拉·布热特施先生和他的副手垂北特·德·屈维尔先生。戈维理要求他俩禁止任何人带中国人登上三艘远洋船中的任何一艘离岸。不过，屈维尔却将此消息以急件密报给傅圣泽。密报中写道：

> 秘密计划已被泄。顷阅德·拉·布热特施先生所示戈维理神父之来函，神父曰其新近获悉足下将携某中国人离埠，并望布热特施先生遵守其对神父与中国官方之诺言，下令禁止此事发生。此事将颇使神父和布热特施先生难堪。足下可惠择最佳方案行之。致礼，完全站在足下一边的屈维尔。

布热特施先生虽然接到了戈维理神父的要求。但是他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将戈维理的信件转送给任何一艘船的船长，所以其他的船长也不知晓有这样一份照会。在布热特施先生和屈维尔先生的暗中庇护下，傅圣泽安排了船上一位官员将胡若望先期悄悄地送上了"康蒂王子"号。傅圣泽本人则在法国工厂借宿一晚后，第二天白天带着他的随身行李，在众目睽睽之下堂堂正正地登上了远洋船。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他寸步不离的中西文书籍、辞典、毛笔，还有为他自己置办的中式衣服和传教士道袍、换洗衣物和苏格兰帽，以及教会颁给他的一些奖章等。

三艘正待启锚远航的船上，人人精神抖擞，整装待发。每艘

船上都塞满了货物。其中有茶叶、丝绸、上乘布料、木雕橱柜，还有中国人为出口而特制的各类瓷器等。全部货物的价值在南特的市价约为一千万法郎。如果航行顺利，并且如果他们还能使用账户里的现金，根据银行汇率的变动成功地投机期货，那么利润将非常之高，绝对是一本万利的极好生意。这是因为在法国国内，原来一贯由公司财政组织掌控的汇率调整近来开始由巴黎的财务官接手控作，汇率因而有望被提得更高，因而更有利于期货投机。

"康蒂王子"号的官员没一个人在乎他们相当有限的小小舱房空间被傅圣泽的大木板箱占去了一大块地方。他们欢迎身着长袍、大胡子随风摇曳、风度翩翩的傅圣泽神父上船与他们共度旅途时光，并由衷地感谢傅圣泽许诺将他们的名字记入他自编的《日志》里。从《日志》中可以看到，排名在船长保古然德以下的还有：大副贵乐巴特（Guillebart）、中尉毛特（Motte）、中尉巴尔贝德（Balbeder）、旗手都万迭（Duvandie）和毛泰·宝西农（Mottay Bossinon）等。这些人对傅圣泽的中国助手胡若望也表示了同等的欢迎。胡若望合身的新衣服和他的那根长长的猪尾巴辫子光彩夺目，在他的床上还有一条贵重的绣花丝面棉被，静静地躺在那儿，等着为主人度过海上漫长的冬夜而效劳。

海上之旅

第三章

1722年1月13日，星期二，广州，珠江湾

八天来还没有人能够离开船踏上岸一步。整整八天，江面风平浪静，三艘轮船随着江流在珠江下游仅仅漂流了几英里而已。两岸尽是些光秃秃的矮山，三角洲的江水呈灰褐色，在船底下静悠悠地慢慢淌着。

傅圣泽正在给戈维理和潘如写信。写完后他又抄了一份，然后将原信存进他的档案和日记，抄件则寄出。目前为止，他和胡若望还没有谈妥这几个月海上旅途间的全部工作计划，尽管胡若望按照傅圣泽的要求已做了几小时的中文书籍誊写工作。

"康蒂王子"号船上的生活相当单调但还算舒适。至少他们不需躺在盛夏烈日下备受煎熬之苦。傅圣泽与船上的官员们相处得不错。用餐时所有的法国人都在一起。胡若望没有被安排与法国高级官员们一起，而是与中等阶层的团体一起用餐。这个团体中有船长的主要服务员（domo）和船上高级官员的仆人。人员如此划分，是按经济地位进行的，这也无疑是正确的。胡若望的年薪是二十两银子，等于8法郎一个月，它甚至少于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普通水手。当时一个最年轻的水手最低月薪可拿到9法郎，老水手的月薪则在15到18法郎之间。如果胡若望作为一个学者登船，他也许就能与傅圣泽和其他官员、旗手等坐在一起了。这是因为在上层团体中，用餐的人数是按传统增长的，书记官和随船牧师也是后来才被纳入的。书记官的月俸为50法郎，随船牧师为30法郎。尽管如此，如果不按收入多少划分，就算书记官和随船牧师的俸禄远远高于胡若望，他们的工作应该远远不如胡若望的工作崇高。胡若望毕竟是个不可多得的中国古典作品手工誊写者。物以稀为贵。

胡若望从来没学过法文，他的就餐伙伴中也没人懂汉语。法国人轻声抱怨胡若望似乎并不怎么懂西方饭桌上的规矩。每当食物一上桌，胡若望不管是不是他的份，伸手就取他想吃的东西。他的同桌想跟他说明食物每人只有一份，但是那概念太难传达。胡若望还是吃得比别人多，他的就餐伙伴因此有时不得不强制他少吃一些。

1722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在交趾支那海岸线外（Cochin Coast）

远洋船的前方现出了秃鹰岛的踪影。久等不来的风也总算在 1 月 13 日那天刮起来了。两天后，三艘船都驶过了澳门，它们都没有在澳门装卸货。自此以后，东北季风一路相送，借其风力，远洋大帆船乘风破浪，昼夜不分，快速前进。

神父傅圣泽的心情也因此好了起来。他为船终于动起来而感到欣慰。在他的日记上有这么一段表示当时他兴奋心情之记录："这是在远航中能够遇到的最为幸福的事情。"

胡若望不再同高级官员的仆人一起用餐，也不同其他任何人一起用餐。他的誊写工作也停下来了。他变得绝望、粗暴，并一直为疾病所苦。

1722 年 1 月 24 日，星期六，秃鹰岛（Poulo Condor）

同行的远洋大帆船先后停靠在了一个岛上。事实证明这是个令人气馁的靠岸行为，尽管船上几个受疾病折磨的人对短暂的停留感到满意。胡若望也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个。岛上有两个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一个是从里昂来的让·巴蒂斯特·雅

克，另一个是从图卢兹来的安东尼·高比尔。他俩的目的地都是中国，但是在四个月前两人万万没料到他们将不得不与载送他们的船一起被困在这个岛上，并且一呆就是几个月。两人所搭乘的那艘船叫“达娜埃”(Danae)。虽然知道法国人准备将来在这个小殖民岛上搞基建做落脚点，雅克还是认为它是个“难以住人的地方”，高比尔想得更远，坚称秃鹰岛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怖的地方之一。

岛上地湿山多，不利健康。海港的景色美丽悦目，可是水下的木桩和小船底部却爬满了不受欢迎的虫子，肆意吞噬着其强占着的地方。进港的水路危险重重，水下礁石遍布，鲨鱼成群，天空又布满小飞虫。此外，岛上还蔓延着叫不出名的地方病。走到森林里，随处可见在树上乱蹦的猴子和掠空而过的蜥蜴，却偏偏没有可供人食用的飞禽与野果，因此，岛上的居民也只能靠打鱼捞虾为生。

岛上的原住民有数百人，但他们对欧洲人并不友善。本地人不务农，只在这个小岛和交趾本土之间定期来回。二十年前英国人曾在这个小岛上建了个贸易基地，由于许多后来的移居者被当地人与英国殖民地雇佣兵联手杀戮(英国当局都从其他殖民地征雇佣兵作易地驻防用)，剩下的人最后决定放弃此岛出走。法国人在此地也不易。当“达娜埃”号船上的人登岸后，有几个人被绑架并被索要赎金，而救难工作则极其困难。

对驻扎在该岛的法国和德国的外籍雇佣兵来讲，此地不啻为噩梦所在。那些后来到岛上与他们团聚的家眷也不得不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住在简陋的小棚里，频遭暴雨侵袭，还得忍受食物匮缺之煎熬。为了填饱肚子，他们经常游说当地人卖些食物或钓些鱼给他们。事实上，在傅圣泽他们到来之前，这些人已饿了好几个星期，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嘎拉提”号船给他们运来

的面粉、啤酒和肉类。

傅圣泽向雅克和高比尔讲了些有关天文学和中国的事，还提到了教皇特使嘉乐访华的事。后者则将从法国带给傅圣泽的信当面转交。礼尚往来，傅圣泽也向他们保证，到法国后会立即将两人交给他的信寄出。雅克的身体状况不甚理想，视觉也相当糟。两人谈话时都显得无精打彩。胡若望并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

保古然德船长、“嘎拉提”号船长、“马武喏”号船长和两位法国国王委任的驻岛官员坐到一起，讨论起有关该岛将来的问题。两位官员被任命到该岛就职是为了岛上的开发建设。一阵辩论后，众人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要把秃鹰岛当作基地进行开发，弊大于利。法国应该仿效英国，放弃该岛。

岛上许多人一度跑到已经很拥挤的船上来，其中有殖民地的官员和士兵，还有一些随行家属。这帮人叽叽喳喳，带来的纯粹是一种干扰。岛上，“达娜埃”号与它的全体船员，包括两名传教士雅克和高比尔，还必须继续留在此地，焦躁而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一直要到6月份，当季风风向转变时，他们才能动身启航驶向中国。而傅圣泽他们的船只却无此困扰，顺风扬帆继续向法国驶去。

三艘船离开秃鹰岛后，还不急着直接到法国。船将停靠荷兰在爪哇[1]的殖民地，设法在那先挣它一大笔钱。船上人人都相信那儿有极其吸引人的商机，谣言也在满天飞，说是巨大的利润在等着他们。这是因为1718年荷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荷兰商船与中国平底帆船在海上的贸易都被康熙皇帝下令禁止了，为的是报复荷兰商人企图强行压低中国市场内的

① 爪哇(Java)，在今印度尼西亚。

茶叶价钱。法属船只在此关头当然要义不容辞，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猛赚一笔。

1722年3月5日，星期二，在印度洋上

在海上航行的“康蒂王子”号丢失了伙伴，如今孑然一身。“嘎拉提”号和“马武喏”号都不见了踪影。走散的原因出在船员们满怀期望所到的爪哇。当三艘船于3月初一起兴高采烈地驶进爪哇的海湾后，船上的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没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同他们谈交易，当地甚至连可以补充他们库存的货物都没有。他们见到的只是几个邻村的逃犯和一些人去楼空的破棚烂房。众人怀疑他们自己一定是搞错了地方。

事到如今，三艘船不得不拉起铁锚，悻悻地离开那个倒霉的海湾。“嘎拉提”号和“马武喏”号居先，“康蒂王子”号随后。当前面两艘船在慢吞吞地转向时，海湾里突然平地起风，瞬时间将那两艘船一下刮出好远。断后的“康蒂王子”号没那么好运，它眼巴巴地看着那两艘船影越来越小，自己不但无法向前追赶，反而被侧面刮来的一阵怪风倒吹进了海湾深处。海湾水浅，危急关头，保古然德船长不得不命令将锚再度放下，以免触礁船沉。接下来的一整天和一晚上，水手们为躲避海湾水中的遗弃沉锚，左拐右转，千辛万苦地将船朝海湾出口方向慢慢挪动。所幸第二天清晨又刮起顺风，“康蒂王子”号上的船帆也总算鼓了起来，但此时另外两艘船的踪影早已全无。

胡若望还在天昏地转，全身乏力。傅圣泽从来没见过晕船会如此厉害、而且还会拖这么长时间的人。

1722年3月下旬,接近好望角

胡若望这几天一直在同一个法国水手争吵。那水手一定揍了胡若望,不过不清楚胡若望是否能够回手。那水手在激烈的争论后认为胡若望侮辱了他而动起手来。胡若望也许侮辱了他。因为从3月开始,胡若望的晕船症有些好转,但也从这时候他开始挑剔船上的士兵和水手,嫌他们嗓门太大、瞎吵瞎闹、行为粗野还没礼貌。

胡若望看上去被揍得不轻。其间,一个船员因某种轻罪在舰桥上被野蛮地当众鞭笞,以示处罚并警告众人。那船员挨鞭子的时候,胡若望也混在人群中看着。这起鞭笞事件使得胡若望安静许多。看上去,胡若望似乎担心同样的事情也会在他身上发生。

1722年3月30日,星期一,好望角附近

这些日子的大帆船好似插上了翅膀,顺风一天可走100到150里格[①],大风吹得水流也随风走,船无奈地被刮出航线,离南好望角越来越远,根本无法上岸补给必需的水和食物。

狂风掀起海水,滔天巨浪竟将船上的一根桅杆拦腰切断。如今船似乎在纬度36度一带,并继续往南行驶。如果船此时仍在好望角一带,并能设法进入朝北的海流,那么船就会离非洲海岸比较近。如此一来,船上的人要是打算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靠岸补充给养的话,就有可能办得到。

① 里格(league),长度单位,约为3英里或3海里。

1722年4月中旬，南大西洋

“康蒂王子”号竟然又失去一次重要机会，未能靠上圣赫勒拿岛。傅圣泽猜想船员可能在夜间错过了该地，或是船根本就没能靠上正确的纬度朝北行驶。

船上用水将罄，食物也所剩无几。许多士兵和船员得了坏血病，而且此病在船上蔓延的速度还实在令人担心。

在此危难关头，保古然德船长对如何把握与实施下一步计划也显得犹豫不决起来。几经思量，他召集了船上所有的行政人员，集思广益，共同商议对策。长久计议之后，船长决定将船驶向巴西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的众圣徒湾(the Bay of All Saints)。依照现今的水流和风势，那地方是距他们最近的、有希望抵达的海港。到了那儿，只要他们的船只可以靠岸，水荒和粮荒的问题便可得到解决。依照目前船上水和食物的储备情况而放任不管，船上的全体人员将难以活着回到欧洲。他们必须先找个靠岸处补给给养。

1722年5月9日，星期六，巴西，众圣徒湾

一排加农炮弹突然呼啸着从天而降，把“康蒂王子”号船上的索具炸得横飞竖窜。保古然德船长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也感到莫名其妙，为了自卫，他下令船员立即拿枪还击挑衅者。一时间，甲板上浓烟弥漫，人声嘈杂，但谁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遭到攻击。

即将驶入众圣徒湾海港通道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康蒂王子”号正在遭受一艘海盗船的袭击。那海盗船堵在通道口，船上的人显然要把“康蒂王子”号赶回大海，以便在海上将“康蒂王

子”号打趴后再上船掠夺。

其实当天下午早些时候这两艘船在海上就撞见了。一开始两艘船上的人曾一度企图进行不流血的和平接触。对方船上挂的是葡萄牙国旗，“康蒂王子”号挂的则是法国国旗。起先两艘船上的领头都还企图向对方致以敬意。尽管对方逐渐加大分贝，到最后扯着嗓子大声喊叫，可惜的是“康蒂王子”号上没一个能足以听懂对方话语的葡萄牙语人才，显而易见，对方船上也没一个人懂这边用法语的呼叫。

同对方相比，“康蒂王子”号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船上仅有二十来条火枪。如果敌人强行登船，保古然德船长能够动员的战斗人员还不足七十人。而那艘葡萄牙船则有五十四条火枪和数百个武装人员。尽管如此，保古然德船长和他的下属决定武装自卫还击，以免老老实实地投降后反而可能会失去全部家当。

海上大雨滂沱，天逐渐昏暗下来。敌船在雨雾中变得忽隐忽现。保古然德船长下令将所有可充当武器的家伙搜集出来，然后把它们从船舱内搬到甲板上一字儿摆开，尽可能让更多的机要人员和水手参与反击，以阻止企图强行登船的敌人。随着人群跑到甲板上的胡若望，看到众人都拿起武器，也顺手抓起一把短剑，以威吓的姿势将短剑在空中胡乱挥舞。个子矮小的他在暮色中尽可能做出凶猛的架式，一边舞剑，一边抖足精神在甲板上来回跳跃奔跑。

朦胧间，保古然德船长突然看到远处横卧着的众圣徒湾港口。船立即调转方向加速朝港内冲去。它一边躲避着敌船的追击，一边小心地绕过海港前方意塔帕立卡岛四周那些令人生畏的明石暗礁。一阵周折之后，船终于驶进船坞，离船坞不远处有所房子，里面驻扎着海港守卫队。松了一口气的船长下令把船

停了下来。令“康蒂王子”号船上所有的人大吃一惊的是：那艘海盗船竟也一路紧追不放，并胆敢在法国船的近处停泊了下来。

这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战火经船上官员上岸交涉求助，才解开了谜底。原来海盗船上并无海盗，那艘船是葡萄牙总督的海岸巡逻船，该船肩负着保卫海港的任务。对当地而言，外国商船一般仅在10月到第二年的4月间在去印度的途中，经巴西水域时才会顺道在该港短暂停靠，以补充些需用物资。但每年的5月份从来没船驶到众圣徒湾来。“康蒂王子”号不寻常的出现，使得那艘葡萄牙巡逻船的船长想当然怀疑其是一艘海盗船，事件的结果也确实不能都怪罪于他。

1722年5月20日，星期三，巴西，众圣徒湾

抛锚后的“康蒂王子”号静静地躺在众圣徒湾海港。放眼望去，远处是一条细长的沙滩；船码头一带，零散的房屋和仓库背靠数十丈高的弧形悬崖而建，形成长长的一字形。圣萨尔瓦多市内的塔楼和圆锥形建筑壮丽堂皇，排列得整齐有序。这座城市是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的首都以及总督的活动中心。由于城市远远高于海面，城市居民所需的生活用品由装置在低地码头上的三个巨大绞盘送到悬崖上后，再转运到城中。

此时巴西还是初冬天气，但圣萨尔瓦多市区外围的田野和小丘仍然绿色满目。此季节出产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未腌过的生肉以及纯净饮用水的供给应该也不成问题。对法国水手来讲，巴西姑娘之美丽早有耳闻。为满足官能上的欢愉，一般停靠此地的远洋船都会将出发期推迟几个星期，一直到船上的水手玩到筋疲力尽、不得不登船出发时才会离港。

此刻，“康蒂王子”号上的水手和胡若望却只能在船上干巴

巴地望城兴叹，做进城的白日美梦。那是因为“康蒂王子”号上人员斗胆向葡萄牙总督的海上巡逻船开火之举，激怒了住在圣萨尔瓦多市的巴西总督瓦斯考·福南带兹·塞萨儿·麦奈塞斯(Vasco Fernandez Cesar de Meneses)。再加上难以相信“康蒂王子”号不是海盗船，总督下令“康蒂王子”号必须接受他属下人员的仔细搜查，每一英寸都不能放过。检查未完之前，任何人都禁止下船。麦奈塞斯先生不但是个行动果敢的人，还有铁一般的坚强意志，甚至对病人也不例外。保古然德船长要求的紧急补给品没一样被送上船来，而船上的坏血病却在继续发展，有几个人还因此在此期间病死。

在圣萨尔瓦多耶稣会的强烈要求下，总督最终答应惟有一人可在他的禁令之外，那就是傅圣泽神父。傅圣泽被允许上岸并在耶稣会的神学院投宿。该学院里住着二十四个人，都是耶稣会的神父和教会兄弟。

上岸后，傅圣泽在该神学院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学院对他殷勤有余，耶稣会同事们不仅不收他一文钱，还提供给他房间和充分的时间以方便他读书、写作以及与人低声和蔼地交谈。

在这所神学院，傅圣泽又惊喜地发现夏尔·德·贝勒维尔兄弟(Charles de Belleville)竟那么巧也在这里。世界是多么地小呀！贝勒维尔是画家、雕塑家，也是建筑师，他曾于1698年去过中国。北京和广州的耶稣会大院就是在他的设计和监督下完成的。不仅如此，他的宗教画还装饰在中国的几个教堂里。傅圣泽比他晚一年去中国，住的就是他当年设计的房子。1707年贝勒维尔被召回欧洲，继续他的不朽创作。如今傅圣泽与他在此地不期而遇，自然话题无穷。

耶稣会住宅区的花园坐落在悬崖顶上，园内鲜花遍地，群树成林。耶稣会的教堂则与市民住宅区毗邻，它高高地耸立在城

市中心的广场内，教堂正面的墙上铺着远从欧洲运来的白色大理石。进了教堂，可以看到面向三扇厚实的矩形大门的壁龛内，置放着耶稣会最有权力的三个创始者的塑像。塑像分别是：伊格内修斯·劳姚拉（Ignatius of Loyola）、福然塞斯·泽维尔（Francis Xavier）及福然塞斯·保盖雅（Francis Bogia）。塑像正上方有五扇窗，掌控着从东面射进教堂内的光线，使其照在教堂内黝黑的木制雕刻和柔软光泽的银制装饰器物上。教堂内的西侧尽头是祭衣和圣器储藏室，室内混放着各种什物。抬头向上，天花板上的油画在地上亮丽的黄蓝颜色相间的花瓷砖的反光下依稀可见，无比优美。储藏室的窗子虽低但相当大，走到窗前，悬崖下面蔚蓝色的海水尽人眼中。往西极目远眺，可以见到海湾中的“康蒂王子”号船，死气沉沉地躺在那儿，沐浴着巴西的阳光。船上的全体人员都被囚禁在船上，包括垂死和虚弱不堪的病人，以及那个姓胡的孤独中国人。

1722年5月31日，星期日，巴西海湾外

“康蒂王子”号驶离了圣萨尔瓦多。在总督的手下人员确认船上没有任何非法物品之后，总督总算发了慈悲，同意“康蒂王子”号在该港补充必需物品，修桅杆，总督并且也同意取消禁令，允许全体法国官员和船员上岸。在此之前，这些人被迫无奈地在船上干等了十四天，其间有十八个人病死在船上。由于总督规定“康蒂王子”号离岸的日子相当紧迫，船员们最终未能充分地得到水和食物的补给。冬季的巴西显然并不是个能向远洋轮提供食物的好季节。到了这个季节，当地种的蔬菜大部分都被蚂蚁吞噬果腹，只有成筐的柳橙和香蕉。而这些东西一上船就会迅速烂掉。生肉的供应也不乐观。没有羊肉，鸡肉匮缺，虽有

牛肉，但肉质粗糙，品质低下。

傅圣泽在最后一分钟由朋友们送行回到船上。他在岸上的这段时间里精神上充分得到放松，并获得了良好的休息。他现在期望他的最后一段旅程一帆风顺，而眼下要考虑的是如何安排胡若望的将来。

1722 年 7 月下旬，大西洋上

这两个月来逆风不断，船速缓慢。6 月和 7 月并不是由西南往东北穿越大西洋的好季节。

胡若望举止安静，不过人变得相当瘦，行为方面也开始变得顺从起来。他主动给傅圣泽沏茶，需要时还为船上的牧师准备祭坛。当那牧师一个人做礼拜时，神父傅圣泽有时还让胡若望帮他一下。

胡若望向神父傅圣泽透露说他做了个梦，梦里天使们出现在他面前，要他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那任务是找到中国皇帝，将基督教的真理介绍给他。天使们还对胡若望说这个任务并不特别艰难。

傅圣泽则力图将欧洲人的生活和礼仪等方面的知识灌输给他，以转移胡若望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臆想。因为胡若望到法国后一定会遇到异国的风俗礼节，如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冲击就会相对小一些。傅圣泽一边讲，一边担心胡若望是不是心不在焉，把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

1722 年 8 月中旬，拉科鲁尼亚外海(La Coruña)

看上去不太可能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康蒂王子”号上的

粮食和存水又将告罄，情况危急。从巴西越过大西洋到法国一般需要四十五天，长的则需七十天。现在他们才到西班牙西北部的拉科鲁尼亚海港，但是当地政府却不允许他们上岸购买他们必需的生活用品。理由是由于法国马赛地区正在爆发鼠疫，当地政府限令所有的法国船只不准入港。海关负责人根本不考虑"康蒂王子"号是否曾经去过、或者是否曾经靠近过马赛或地中海地区。

船员们不得已，只能先将锚抛下，把船停在海港外，以防反向的风把船往南吹，同时也能提防岸上的西班牙人。

事情的发生正如船长事先所担心的一样。他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以商讨对策。这次神父傅圣泽也在被邀之内。想是胡若望也猜到了开会的内容，会议期间他不请自来，站在门外打断了大家的讨论。他先是用汉语大声叫神父过去，说是有话要对他说。当神父走到他近前，他提出了他的计划："给我一个独自能划到城里的救生船，我会说服市长倾听我们的诉说，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还要说服他同意我们上岸，去购买维持我们生命的必需品。"

傅圣泽企图快速把胡若望打发走，但胡并未放弃。他进而提高嗓门，反复强调他的计划。他举出种种理由详细说明他的计划的可实施性，还嚷着船上每个人都有权参与。他说他会强迫西班牙人明白船上的人必须受到礼遇。由于他的声音传到了会议厅内，里面的法国官员问傅圣泽胡若望讲的是什么。傅圣泽作了解释，力图软化他们的争论并使之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官员们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是一阵大笑。

没人同意胡若望去执行他的计划。众人讨论的结果，使保古然德船长决定购买西班牙人同意补给船上的有限生活所用必需品，然后扬帆直接回国。船长期望有个最好的结局。而此时

的傅圣泽倒开始有点儿担心起胡若望来。神父怀疑胡若望是否精神上出了差错。旅行开始后,胡若望在船上与人打架、在甲板舞刀、天使托梦,还有现在的单艇独人见市长之诉求等事件,都深深地印在神父的脑中,挥之不去。如果胡若望真的神智不正常了,那么神父将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决定。

傅圣泽对中国人的神经病发病症状并不很清楚,虽然他当年在江西布道时偶然碰到过一次。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一个夏天,病状出现在一个年轻姑娘以及另外八个男子身上。傅圣泽研究并记录了那些人的症状,并将记录寄给了一个在法国的记者。以那十七八岁的姑娘作为实例,傅圣泽写道:"光从外表上看,她没有任何问题,食欲良好,吃喝正常,平日看管家里的生意,举止谈吐方面也看不出任何异常举动。但是,她会在别人最想不到的时候发病。当她发病的时候,她就变得语无伦次,嘴里念叨着好像就在她眼前发生的、实际根本不存在的事情,间或还伴有暴力倾向。"其他八个男子的症状也有相同之处。发病的时候要把他们绑起来,以免他们伤着家里人和邻居。这些人的病最后都治好了,治疗的方法是在他们的家里安放十字架,并往他们身上撒圣水。总的来说,此类病患常常搅得周遭的正常人不自在。

无论如何,胡若望的情况与江西那一家子的病患有很大的出入。到法国的旅程还相当长,应该相信,胡若望上了岸就会安静如初。

1722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二,路易港

经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磨难,长途的海上跋涉终于画上了句点。船上所有的人昨晚都被告知船已临近法国岸边,但在黑

夜中不得不先将船停下，等待天亮。次日一大早，天刚放亮，船长保古然德就命令将船全速驶向格鲁瓦岛(Isle de Groix)。

格鲁瓦岛是个有趣的特殊地理存在。每当岛上传开有关远航轮船正从东印度群岛或西印度群岛回到法国的消息，马上就会有许多由布列塔尼人(Breton)划的小船出动，云集在远洋轮的四周。这些布列塔尼人水手对海岸线上的每个弯角都了如指掌，甚至连小小的凹塘也不放过。在皇家税务官上远洋轮船清点登记货物之前，他们会利用那么一会儿的时间差，事先将船上官员和其他人带入的各类私人物品先卸下存放在某些隐蔽的地方。随后不久，这些货物会在岸上被聚集起来，并为这些男人们带来巨大财富。不过戒备森严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海关官员们也绝非等闲之辈，远洋船一到，他们也会立即接踵而至。这次就有一艘东印度公司巡逻船飞速驶来，船上走出一个海关官员，其身后还跟着十来个警卫，敏捷地登上了“康蒂王子”号。所有在“康蒂王子”号四周的小船自此无法再靠近大船。这些警卫严密把守着船舱和库房的出口，船上官员的小舱房也无例外，被上上下下地仔细搜查一遍，然后，里面的器物统统被贴上封条。这些手续办完后，“康蒂王子”号被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护航舰队护送到了路易港内指定的停船地点。那些停泊点都在武装要塞内侧。船一到此，就处于严密的重火力监控下。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警卫们并不就此离开，他们的任务还未结束。他们还需留在船上，监守着船上的各个要点。

站在甲板上的胡若望，此刻抬头向岸上望去。越过眼前的法国海湾，他发现岸上矗立着一排排以石瓦片铺的屋顶、以石块砌成墙的坚实房子，岸边有繁荣的码头，其间还夹着稍稍倾斜的乱石海滩。放眼远眺，还能隐隐看见在森林的遮盖下绵延向北的海角。

胡若望的脚下，在甲板下一层的一个小船舱内，傅圣泽正在写信向他的法国耶稣会上司神父奥瑞（Orry）简要汇报他的旅途经过。夜幕渐渐降临，岸上的小城里，陆续不断地现出一盏一盏的灯光来。

接近欧洲大陆

第四章

1722年8月28日，星期五，路易港

今天天还蒙蒙亮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部长赖斯陶白克(Lestobec)先生就登上了“康蒂王子”号。这位部长向全体人员反复宣布，船上的任何物品都严禁搬运离船，船员除特别许可之外，谁也不能上岸。但他对船长保古然德和其他船上官员下船到路易港去用午餐一事，却网开一面，未加阻拦。

傅圣泽把早晨的时间花在写另一封信上。那封信是写给国王图书馆的比哥农牧师(Abbé Bignon)的。这是因为傅圣泽想到这位比哥农先生或许可以通过宫廷关系，尽快地将他的十一个大木板箱通过东印度公司所需漫长时日的检查。这批书籍一旦通过检查，傅圣泽马上就可以着手他的工作了。要想得到比哥农的支持，傅圣泽必须使比哥农相信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成就也将是巨大的。诚如他在信中所说：

“二十三年前，敝人怀着强烈的热情开始学习汉语的口语和书写，为的是找出一种方法，并通过这种方法，以发现写在中文文字内涵中的、该民族的历史风俗。中文书籍中的文体、用于书面文字的表意文字，还有文字的悠久历史以及文章主题所表现的内容等等，这些东西都显示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与它相同的例子，甚至包括西方人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有文化的民族在内。所有这些引起了敝人早已存在的好奇心。在此，敝人可以向阁下保证，敝人无意为使别人相信上述研究而省略任何事实。敝人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学习与研究，终于看见了通向这神秘深奥源头的一

丝曙光，这是敝人多年来朝思暮想、梦寐以求而一直未可接近的曙光。敝人越钻研，就越能发现令人惊奇的真实。至少现在敝人已开始深信，那些文章中的历史风俗犹如最值得尊敬的古代风俗神殿。但是，此等知识在现今之欧洲，至今尚还无人对此略有所知。”

傅圣泽觉得他用不着说得过火，因为比哥农不仅聪颖、对远东有兴趣，而且其必定也是上帝挑选出来推动如此伟大事业的人。他傅圣泽要是和比哥农一起携手合作的话，将会可以把隐藏于中国古代经典中模糊不清的内部核心真相一举剖开，大白于天下。而那内部的核心真相：“隐身于深奥和神秘的象形文字下，已被一些最神圣的宗教创始人密藏了八十个世纪以上。了解并搞懂那些象形文字，才是对真相的真正理解。而要做到这个真正的理解，惟有基于从中国人最初的观点，来思考中国人的书写文字。”

这封信最棘手的部分是如何说服比哥农运用其影响为傅圣泽谋求方便。左思右想之后，傅圣泽悟出条一箭双雕之妙计：比哥农现在正等着布热特施先生在中国买的另一批书，而这批书是为图书馆买的。在这批书运到之前，可以暂时让比哥农先借用傅圣泽随身携带的这十一大箱私人藏书。傅圣泽是如此恭谦落笔的：“敝人愿斗胆向阁下提供数千册精心愚藏之书籍。”如果比哥农中此计谋，他也许还希望借用一下胡若望呢。写完这一段，傅圣泽接下去极其自然地又提出了个建议：“有一个会写字并还会做些其他事情的中国人随我一起来到此地。这个中国人已被保证将会在意大利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不过如果在法国要是有什么人想留下他，他将会配合并能同意。这个中国人对解读这批中文书籍是有用的。最低限度地说，可以让他誊

写、摘录文章，或者查找某些特殊段落。”

傅圣泽写完了信，注上了日期，可是还没来得及寄出，就被“康蒂王子”号船上的一阵骚动打断了。一艘皇家快艇开到“康蒂王子”号船边，有人专门上船接他来了！这个如此意外的荣幸邀请，绝对是个惊动船上全体人员的新闻。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早晨船上的官员上岸后，同路易港行政当局的一位资深官员共进午餐，那位官员名叫埃帖恩-弗朗索瓦·雷诺(Etienne-François Renault)。雷诺这两年来一直担任海洋运输仓库的采购主任，具体工作内容是为法国东印度公司船队供货。席间，“康蒂王子”号的官员中有人偶然提到了神父傅圣泽也在他们的船上。真是无巧不成书，雷诺与傅圣泽本是多年前的老朋友。确切地说他俩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曾经一起乘坐“乐保恩”号船(Le Bon)从路易港出发去过印度。那一次雷诺是到阐得那高尔(Chandernagore)的法国工厂去工作，而傅圣泽则是到中国去传教。当听说傅圣泽现就在“康蒂王子”号船上，迫不及待的雷诺立即运用他的特权，命皇家快艇船长带着手下三个船员即刻到“康蒂王子”号上接人，并令他们将傅圣泽神父直接送到他自己家中。这么一来，没有选择的傅圣泽必须成为雷诺家的宾客，离开“康蒂王子”号在外投宿一晚。

傅圣泽虽然觉得相当意外，但是很高兴受到邀请。老实说，傅圣泽与雷诺在昔年的长途危难旅行中成了真正的好友。问题是傅圣泽该如何安排胡若望？胡若望不懂欧洲人的任何风俗礼仪习惯，他也许会成为雷诺的负担和麻烦。不过傅圣泽又转念一想，他上岸后还可从容地替胡若望在路易港的城区里找个舒适如家的寄宿处。快艇在等着，傅圣泽没时间再深一步推敲细节，他自己也已经被困在“康蒂王子”号上有八个多月了。路易港和劳瑞恩特城里都没有耶稣会的居住设施，胡若望的住处还

须另想办法。想到此，傅圣泽抓起写给牧师比哥农先生的信，匆匆跨出船舱，一脚迈进了皇家快艇，他现在已经不可能找出时间同胡若望来讨论这些问题了。

胡若望这个孤苦伶仃的异邦人被留在了“康蒂王子”号船上。伴随着他的是船上的船员和警觉的海关缉私警卫队员。周围没有一个人会说中文，不会说法语的他只得被冷落在一边。船到路易港后的第二个仲夏之夜又降临了，它送走了下午和傅圣泽，却将孑然一身的胡若望和傅圣泽的想法留在船上。海岸上传来咚咚的击鼓声，那是每天日落时卫戍部队的音乐家们所奏的降旗信号。

1722年8月29日，星期六，路易港

胡若望最终被安排住在雷诺先生的私人住宅里。傅圣泽的顾忌是多余的，雷诺生性豪爽，宽宏大量，当傅圣泽一提到他还有个从广州带来的中国助手在船上，雷诺二话没说，当即坚持请傅圣泽次日就把那助手带来同住。

次日一大早，傅圣泽特地赶回船上去接胡若望。上船后，傅圣泽想了些办法，用几包烟和一瓶酒，说服一个在船上的海关官员同意他翻动一下他个人的行李。其中最重要的是他那四千册书籍的目录。这些目录分别放在十一个大木板箱里。通常而言，要想移动如此多的书籍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事。它们被东印度公司的监察员们捆绑在一起，还不知将被如何检查、如何放置以及放置在哪里等。有烟酒在前面开道，目录最后总算被取了出来，傅圣泽随之又将他那封愿意出借书籍和提供中国人助手服务的信，送上了邮局的二轮轻便马车，辗转投递给牧师比哥农先生。同傅圣泽那十一大箱等待检查的书籍之命运相比，

装在“嘎拉提”号船上的另外七大箱书就幸运多了。那是因为王室的影响应该还真起了作用。那些书早在两个月前就由广州抵达路易港，并且在抵达港口后，毫不停留，直接就被寄到了国王图书馆。速度如此之快，是因为没人敢斗胆拖延。

随身揣着图书目录，傅圣泽带着胡若望回到了雷诺的宅邸。二楼已经有一间屋子被腾空，那是为胡若望预备的。从即日起，胡若望将同一个五十来岁的女管家一起用餐。屋主雷诺是个单身汉，多年来家里所有的大小琐事一律都由这位女管家照料管理。

胡若望觉得为他预备的那间屋子通风不畅，床架子也太高。他把厚床垫和下面的麦秆芯褥垫从床架上拖下来放到地上，并把室内的两扇窗打开，从来不去关它们。仆人们见到窗开着，就帮他把窗关上；进屋发现床垫子在地上，就抬回原处。胡若望也不吱声（正确地说，嗓子吱不出法语声），等仆人走后，闷着头原样画葫芦再重做一遍。几个回合下来，仆人们精疲力竭，胡若望却仍是乐此不疲。这场无声的战争就这样一直进行到雷诺的仆人们彻底投降为止。从此以后，胡若望一直睡在地上，让残夏柔和的轻风穿窗而入，轻轻地吹拂着他的全身。

胡若望对雷诺家中的规矩也疑问重重，显得无法适应。他拒绝同女管家同桌用餐，并不让她靠近身边。每当女管家出现在餐桌前，他不是做鬼脸示意她不要靠近，就是自己转身走开。由于每次用餐时胡若望都重复这些动作，最后仆人索性把饭端到胡若望自己的房间，让他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这位胡若望还将自己的房间视为雷池，决不允许女管家越过门槛半步。

1722年9月1日，星期二，路易港

雷诺先生在路易港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虽然他到此地才两年多，但是由于他有个监管海军物资采购与分配的官职，使他在短短的时间里便在当地的商界建起了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他知道那些为船上做饼干的糕饼师、做木桶的工匠、拥有巨大地下室并可将葡萄酒储存到船要启航那天的老板，以及那些经营沙丁鱼、蔬菜、食用油和肉类的批发商等等。所有这些货物必须由雷诺和他的手下人采购并把它们储存起来。其他的人则负责军需品和其他海军物资的筹备。

与雷诺工作上有关系的许多客户都住在劳瑞恩特镇(Lorient)。那个镇子有较大的造船工业；另外还有些人住在斯考府(Scorff)，那是一个商业镇。雷诺不属于那两个团体中的任何一个。他本人只属于路易港中另一个热爱高尚优雅生活的团体，那个团体人数可观，绝非是几个孤家寡人的简单数字拼凑。通过雷诺，傅圣泽见到了当地的商人、军官，以及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今天，傅圣泽与城里的一个领袖级人物一起共进晚餐，此公官阶为皇家中尉，是要塞的指挥官，名叫弗朗索瓦·布林·德·瑞快保格(François Burin de Ricquebourg)，时年四十八岁。瑞快保格先生是从皮卡第(Picardy)转任来此地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已加入了耶稣会。傅圣泽还见到了港口负责人保罗·毕高特(Paul Bigot)先生，并曾经和路易·马丁·杜帕克(Louis Martin du Parc)一起共进过晚餐。杜帕克先生原来是船长，现在是城里的海军司令。碰巧的是星期二的晚餐会中杜帕克也在座，并与瑞快保格争执不休。当晚他俩争论的主题是有关海外归来的商船在格鲁瓦岛停泊

时的司法权归属问题。此外，东印度公司的部门主管们与当地的牧师们也在座。更有趣的是一些想要引起傅圣泽注意的人，这些人声称他们有漂亮的花园，并且欢迎神父傅圣泽到他们的花园游玩小憩。

如果傅圣泽卷进这个富有的圈子，他必须给胡若望做一套欧式西装。路易港虽小，但却是个繁华的小都市。在城里至少可挑出一打以上的裁缝师，更不要说那些绸布商和卖衣服的人数之众了。傅圣泽觉得他很慷慨地找了一个出色的裁缝为胡若望做一套衣服。他为胡若望定做的是一套以上乘布料裁缝的结实套装。考虑到秋天即将来临，傅圣泽还请裁缝另外加做了一件过膝紧身短大衣(justaucorps)。这套衣服和短大衣的颜色较深，人们新近把这种颜色称为“咖啡色”，是因为当时摩卡咖啡①开始在法国流行起来。

胡若望对路易港这个城市充满了好奇，他开始走出房间，到城市中猎奇。他穿着新衣服，独自一人在城里转悠，仔细地注视每一样东西，犹如在为他的传记准备素材。傅圣泽曾听到过他要写传记的计划。在城中，胡若望尤其被庞大的公共马车所迷倒。那驿马车相当大，是法国人长途旅行必须依赖的公共交通工具。那些大马车虽然无法通过市中心那些又陡又窄的街道，无法穿越城内那些左拐右转、遍地坑坑洼洼的石板小路，但是它们的踪影却在广场附近绿色树阴下的小旅馆和进城的几个主要入口到处可见。胡若望借了些纸张，画了几幅这种大驿车的图，他也花了一个来小时来誊写傅圣泽的古典。相对而言，胡若望对城市探险的兴趣似乎远远高于其他事情。

---

① 咖啡根据产地或种类，以及烘焙方法的不同，有诸多名称。摩卡(Mocha)咖啡原产地为阿拉伯。其他还有诸如哥伦比亚咖啡、爪哇咖啡等。

1722年9月2日，星期三，路易港

胡若望今日偷偷牵了一匹马，闷头不语走出了大门。或许也可以说这匹马是借的，是没人看见时借的。当然，这得看以什么眼光评论此事。

事情发生在一瞬间。当时胡若望站在他的窗前，俯视下面的天井大院。雷诺的住宅在路易港市是属于较特殊的一种，住宅的前门特别宽大，马车可直接进出，不须开门。单骑要是从外直驱大院里面则更是不需吹灰之力。此时，一个从乡下来的差使骑马进入了大院。他把马拴紧后，就进屋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去了。趁这当儿，胡若望从楼上一溜烟窜下，解开缰绳，飞身上马直奔院外而去。

胡若望以前从来没有骑过马，但他不一会就掌握了驭马技巧。路易港市的街道对大马车而言显得太陡峭和太狭窄，但对疾驰的马匹却毫无阻碍。人骑在马上，可绕城墙奔驰，将海岸美景尽收眼底。海岸边峻险的岩石上有一条羊肠小道，仅单人可以通行，属于那种“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要地。岩石上火绳枪的后座力之大，足可将摧毁之物抛到深崖下。一旦海岸或小城内有什么异常响动，街上的房子里就会现出一双双眼睛，密切注视街上和海岸边发生的事情。人骑在马上，间或还可以听到城堡下训练场上发出的弹体呼啸声，并可看到流星般的物体耀眼地飞到海水中爆炸。那些炸弹激起的海浪甚至能冲击通向城内碉堡的小桥桥基。此外，人骑在马上，还可直穿城墙的拱门，越过城门，或是沿着沙滩小径飞驰，或是沿着卢德拉点大道一路往下跑，那一带是同东方做生意而富起来的有钱人的住宅区。

有那匹勤劳的高头大马代步，胡若望兴致勃勃，流连忘返。但此时只是急坏了那位马主人。这位乡下来的差使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满头大汗，在城里徒步乱跑，寻找他那丢失的马。胡若望在被找到后挨了一顿臭骂，但他毫无悔意，还向傅圣泽嚷嚷，为什么马空闲着的时候别人不能借用一下？

路易港城的人从此都把胡若望称做“堂吉诃德”(Don Quixote)，傅圣泽甚至动了个念头，打算不再等比哥农的回信而直接把胡若望送回其广东老家去。他试着打听了一下，发现东印度公司在这个季节不发船到中国去。看来要把胡若望打发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请神容易送神难喽！

1722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路易港

胡若望不再骑马了，但是他的誊写也只完成了一丁点儿。那点儿活本来是傅圣泽希望他能在上岸后六小时之内完成的工作之一部分。既然如此，胡若望也得不到他的俸禄。

几天前有一封从国王图书馆寄来的信投递到了傅圣泽手中。那是比哥农对傅圣泽 8 月 28 日信的复函，写于 9 月 4 日。回信中，比哥农首先向傅圣泽在南京帮助布热特施为国王图书馆选购七大箱书的事表示了感谢(在三艘船从广州出发前两天，布热特施曾抽出时间在一封信里谈了傅圣泽在购书中的角色)。信中，比哥农还对傅圣泽提出的有关胡若望为他工作的事表示了感谢。他写道：“神父此次携来真正中国人之举，极是高明。从神父信中可见，该人定是个知文识字的书生。如敝人等能使其栖身此地，该中国人将直接附属于敝人。毫无疑问，该中国人在此地定能比在意大利作出更大的成就。”比哥农有个更辉煌的总体规划，他期望在法国普及中国学，使其成为切实可行的普

通学问，就像阿拉伯学在当时的法国一样。

比哥农主管着正在蓬勃发展的中文图书馆。1697 年之前，法国王室仅有四册中文书，而那四册书还是马萨林红衣主教(Cardinal Mazarin)在路易十四早期执政时赠给王室的礼物。1697 年下半年，康熙皇帝通过神父白晋(Bouvet)向法国国王赠送了四十九册有关语言文字与自然历史的中文书籍。1700 年，神父洪若翰(Fontaney)又献给法国国王十二册一套的满汉辞典。1708 年是法国王室获得中国原文书籍的大丰收年。这一年海关的检查官向法国国王献上了十四箱中文和满文书籍。那些箱子用蓝色缎子和黄色斜纹布捆着，箱内共有一百十三套书籍。那十四个箱子是十五年前被法国皇家海关稽查员扣下的，之后一直未见有物主申报。这位比哥农主管在信中没有把那十四箱书籍的事告诉傅圣泽，否则肯定会大扫其兴。同年，路易十四还得到了三卷有关中国学的书籍。它们是在王宫的壁橱里被发现的。其中两卷是西方传教士写的有关中国天文学方面的书籍，另一卷则是描写中国基督教徒的生活。1718 年，当比哥农牧师被任命为国王图书馆馆员的时候，他献出了自己藏书中的几册中文书。次年，比哥农将国王图书馆所有的中文书籍，以及神学院为方便国外传教而收藏的八百余册中文书籍合在一起，将它们整理归类，单独收藏。傅圣泽帮布热特施购买的那七大箱子书里，总共有书籍一千七百六十四卷。那七大箱子书是比哥农的同事、东方学专业学者伊申恩·福满特出力从码头搬运回来的。根据以上的信息分析，比哥农当然愿意傅圣泽那十一个大箱子里的四千多册中文书，与他新近分类编码的书籍长眠在一起。

接信后的傅圣泽立即提笔复信。要是他的那十一箱书籍必须为比哥农的冒险事业做贡献的话，那他傅圣泽只能以同情作

罢，虽然他傅圣泽自己的计划还没最后定夺。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一定要解决的，那就是胡若望的何去何从问题。傅圣泽这么写道："偕敝人远渡重洋来到本邦之中国人并非一流文人，该人甚至从未从正规学校毕业过。虽然如此，其能书写并一生致读。该中国人年龄四十。敝人非常荣幸地代其向阁下奏请，如阁下幸思该人能为阁下尽微薄之力，敝人将建议其留在法国，并会对此中国人指明其今后光明前途所在。"

傅圣泽的这项计策对胡若望来说也许是条出路。因为傅圣泽清楚地知道十二年前曾有个叫黄嘉略(教名 Arcadio Huang)的中国学者被天主教牧师带到法国，后来在巴黎定居并在国王图书馆就职。黄氏工作勤勉，日后还娶了个法国姑娘并喜得千金。可惜的是这一家人在 1716 年前全都病死了。比哥农也熟知黄嘉略的事。如果黄嘉略还活着的话，所有书库中的中文书早就应该整理归类完了。比哥农如果能带领胡若望一起工作，他们也许能将法国的中文图书馆推到一个崭新的高水平，使之在整个欧洲灿烂夺目。

1722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路易港

傅圣泽最近一直为他自身要实施的宏伟目标和仍被扣押着的书籍煞费苦心。就是因为这些，他才写了那么多有关胡若望的评论与介绍。傅圣泽不仅将一份有关自己那些大箱子里的中文书籍之详细目录寄给了比哥农，还在信函中放入了一份精心制作的解说，说明为什么在那些箱子里，除了中文书以外，还有些他个人的物品与其他语种的书籍。傅圣泽之所以交代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担心东印度公司的稽查员会认为他走私。在法国，神职人员不受豁免权保护。十三年前"康非洋斯"号(Confiance)

船上的专职牧师儒安(Jouin)就是因为走私银子而被判刑，在路易港市的监狱里坐了四个月的牢房。那牧师把银子装在酒桶和大木板箱子里后，将它们托运到他的朋友家中。可恶的是，那牧师是个太贪财的伪君子，他不仅想独吞油水，甚至还骗取了船上书记员的红利。

放心不下他的贵重书籍，傅圣泽还向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求情，希望官员们同意他将那些仍在船上的箱子打开吹吹风，因为那些箱子在搬运时候受损，箱内的书籍已受潮。不幸得很，傅圣泽的求情如同对牛弹琴，毫不见效。官员们强调：法国东印度公司有令，船上所有的箱子全部必须封印，然后直接送到位于南特的仓库去。傅圣泽本人也必须亲临南特申报关税。胳膊当然扭不过大腿，不得已，傅圣泽为自己和胡若望订了两个座位，准备坐星期四的公共马车到南特去。

胡若望这几天也没闲着。他对路易港市已做了一番彻底调查。他这几天所观察到的东西应该远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多得多。具体地说，他不仅见到了繁华和富有，还见到了那些生活在另一个极端世界的、在悲惨与穷困中挣扎的可怜百姓。实际上用不着特意举例，这类人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其中有到处闲逛的退伍军人、拿了薪水就上岸酗酒的水手、从未见父亲归家的孩童、向人乞讨的男人、病怏怏的娼妓、要塞附近医院里那些缺胳膊断腿的病患，以及背着沉甸甸大粪桶、走路摇摇晃晃的掏粪工。与这些人相比，裹在咖啡色短大衣里的胡若望俨然像是高贵群族中的一分子。

傅圣泽没有想到，当他告诉胡若望他们已经登记了座位，将于周四乘坐私人马车离开路易港时，胡若望竟出乎意料地表示他不愿去那儿，而且态度坚决。他告诉傅圣泽说他要做个乞丐，并以乞讨为生，周游法国各地。他不想坐什么马车，也不再想骑

马，他的脚力足可胜任此行。傅圣泽吃了一惊，一时无话。等他回过神来，转念又想，胡若望要周游法国的打算可能与其准备写旅行传记有关。不过傅圣泽当时既没时间为那种事迁就胡若望，而且路上也太危险。况且当时法院在前不久才颁布了逮捕和转送身体健康流浪汉的新法律，万一胡若望被警察捉拿起来，他可能会被押送到法国的殖民地，不是北美的路易斯安那[1]就是其他更危险的地方。想到这些，傅圣泽就没再理会胡若望的抱怨，付了车费，将行程确定下来。

---

① 北美的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指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在法国各省

第五章

1722年9月17日，星期四，路易港-瓦讷

傅圣泽雇的是辆轻便四轮马车。马车外形漂亮，在里面坐着的感觉也不错。车上有个可折叠的顶篷，里面则是排双人座。临别时，雷诺和他的仆人们将他俩送到大门口。胡若望起初执意不愿去，但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和傅圣泽一起坐上了车。两人之外，还有个到瓦讷(Vannes)去办事的雷诺家仆骑马随着他们一起旅行。雷诺嘱咐过那家仆，要他与马车一起行动，并时刻留意胡若望的举动。

路易港和瑞安泰克(Riantec)之间尽是地势起伏的小海湾和海滨泥地，走出那一段后，一片平缓的小丘静静地躺在前面。从这里开始，马车朝向位于内地的墨叻文紫(Merlevenez)一路奔驰而去。坐在车里，透过道路右侧高拔挺直的冷杉树林，依稀可见远处海面上忽闪着磷光。走了一阵后，地势逐渐延缓向上，大道两侧古树遮天，树林中爬满了常青藤，其中也寄生着枝条下垂、学名为槲的灌木。紧挨着道边，树杈乱藤缠作一堆，常常像篱笆一样将深沟盖死，而且那篱笆有时比马车还高，挡住人的视线。挤在篱笆中的灌木丛也不示弱，身上挂满了晚夏的小莓果。

好好坐着的胡若望突然从正在行驶的马车上跳下，沿着道边的灌木丛奔跑起来。当他看见不知名的果子时，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不一会，他又穿过灌木丛跑到后面的田里去了。紧跟在车后的雷诺家仆见状，旋即策马越过深沟把他带了回来。上车后还没等屁股坐稳的胡若望，忽地发现了什么，又冷不丁蹦下车，但再一次被那家仆揪了回来。看来没一样东西能阻止胡若望奔跑，也没一样东西能让胡若望留在他自己的座位上。

要这样下去，他们永远也到不了瓦讷。车速慢下来了，最后

简直像在爬行。傅圣泽大声叫着，要胡若望回到车上，胡则以大笑作答。当那家仆见状，又一次策马向前，企图强行把胡若望拖回来，而胡若望这次干脆往地上一躺，四肢朝天不再动弹。家仆抡起鞭子照着胡若望就抽了下去。

这次胡若望爬上了马车，一路上不再言笑。车向前走了四个来小时后通过了墨叻文紫。此时，一座小山横在通往瑙斯单(Nostang)的大道前方。一条绿树成阴的乡村大道穿过小山心腹，向东北方向蜿蜒盘去。出山后，远处有条泛着白光的细细水带，逐渐映入眼帘，那是布拉维特河(River Blavet)欢快的流水在向一行人招手。马车不久又越过几座桥，这些桥都架在小河的尽头，桥下水流湍急，浪花飞溅。再往前不远，就是兰德万(Landevan)。马车在此向右拐，登上了从布列斯特(Brest)到瓦讷的主干道。

在主干道上，傅圣泽一行在一个小旅馆前停了下来，准备用午餐。这时一个等候在旅馆外面的乞丐向他们走来，伸手求善。此人凭着他经验丰富的直觉，径直走到胡若望身旁，向他伸出手来。在周围的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身无分文的胡若望已把他身上那件崭新的咖啡色短大衣脱下并递到了那乞丐手上！

傅圣泽喊叫着要雷诺的家仆快将那大衣从乞丐手上夺回来。家仆领命，借助鞭子硬是把那件新大衣从乞丐手上扯了回来。但是这边的胡若望可不依不饶，喊叫着即使拿回来他也决不会再穿那件大衣。一阵折腾后，还是没人能转变他的主意，最后那乞丐被允许保留他的中彩大奖。

午饭后一行继续上路，大道笔直，一路又是下坡，车速自然加快。马车先经过奥瑞(Auray)，然后再向瓦讷行进。快速行进中，家仆不敢掉以轻心，时刻注意着胡若望，不过此时的胡若望

却无心再下车了。身上只剩下长袖衬衫和背心的胡若望，此时龟缩在车中，一路无言。从下午到傍晚，一路上惟有马蹄声和随风摆动的麦秆摇晃声阵阵入耳。当他们最终看见瓦讷城中小山上那鳞次栉比的房舍和高高矗立的大主教堂背影时，晚霞早已褪尽，天上的群星正在向他们眨眼。

1722年9月19日，星期六，瓦讷

瓦讷的耶稣会神学院是个理想的寄宿处。院长安德烈·高解特（André Goujet）和他的同事们都热情地欢迎傅圣泽。事实上，该院有两个相连的建筑，都属于耶稣会机构。另一个坐落在市场北边，紧挨着城墙外侧。神学院是由耶稣会于1629年建造的，它也是布列塔尼（Brittany）东南地区第一个高等教育机构。耶稣会曾得到本地贵族和国王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的大笔捐款，并在1678年建成了属于它自己的、秀丽而端庄的教堂。神学院楼共有四层，当初在设计时有一层是作为训练该院学生用的，现在则被用作宗教静思场，任何人都可进入。

这两座建筑物主要用于瓦讷市民的宗教生活，它们的作用甚至胜过牧师集会和大主教堂。神学院还吸引了几千个学生，虽然他们都不是本地人。这些学生寄宿在市场周围以及圣亚维斯教堂（the rue St. Yves）一带。学院每月举行两次静思活动，每次为期八天，最多时可吸引二百个男性参加（为妇女举办的静思活动设在位于乌尔苏林斯的女修道院，或在更远的地方）。静思活动所有的人都可参加，无论是牧师还是非耶稣会教的人，不同处只在于对参加者的待遇是按照财富和地位来区分的。主楼中的一楼和二楼各有十七个房间，每个房间都远离走廊，以方便不同阶层的人舒适地择群而聚。三楼的一侧有几排小房间，每

个房间里放着两张床。这些房间是为那些确实贫穷、只能尽其力付几文小钱的人准备的。另一侧，也就是走廊的对面，统铺占满了所有的空间。统铺的床是用简陋的木板做的，床与床连在一起，之间全无遮拦。

参加静思的人都在楼里的食堂用餐，每天的膳食几乎千篇一律，都是由中央厨房供应的。有经济能力的静思者付 6 法郎另加八个 5 角铜币，以作为八天的伙食费用，经济条件不济的则可减至 2 法郎另加十个 5 角铜币。付费高的人所享用的餐具首先就与他人不一样。那些餐具都是高级陶器，再者，他们的菜单中有面包、新鲜奶油、葡萄酒、汤类、水煮牛肉、羊肉或是小牛肉，此外还有甜点、生拌凉菜等等。每逢斋戒日，菜单上虽然不会出现肉类食品，但是有鱼和鸡蛋以替代。付费低的人的伙食自是不一样。他们的食物简单得多，每餐都是盛在土制钵盆里的汤和放在盘子里的白水煮牛肉。至于那些穷得连饭钱都付不起的静思者，他们必须自带食物，这些人而且被安排在专为他们准备的狭小房间里。这类静思者多是艺术家、学生，或是乡间来的农民。在这些小房间内他们的原籍也常常被留意到：全都来自不同的乡间和省份。他们放弃挣钱的机会到此地来，是为了聆听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神父自白，题目是“不太懂法语的好老百姓”。

胡若望在此地似乎是其乐融融，随遇而安。他显得不急不躁，每次教堂弥撒时他还替傅圣泽神父打下手。在此地，傅圣泽又给胡若望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不过可没原先那套衣服贵重。这次他请耶稣会神学院里一个给大伙儿做衣服的兄弟，为胡若望裁了一套粗质布料的衣服，但胡若望得自己将它缝上。

在这一段时间里，傅圣泽仍旧为他今后的新计划日思夜想。种种迹象表明，他将来的出路会越来越复杂化。这些可以从经

由路易港市雷诺先生那儿转来的几封信所证实。其中有一封信是法国耶稣会上级下给他的最新命令，命令他到卢瓦尔(Loire)的拉·福来士(La Fleche)耶稣会神学院去汇报他在中国的传教情况，而不是傅圣泽所期望的去巴黎汇报。而傅圣泽方面，他现在手中还握有教皇特使嘉乐在中国时给他下的直接向罗马汇报的密令。不过傅圣泽至今还未对耶稣会的任何人提起过有关教皇特使给他密令的事情。根据目前他所处的境况和其他条件分析，他傅圣泽此刻去卢瓦尔绝非上策：他十一个大箱子里装的书现在还不在身边，它们都被托运到南特去了；在巴黎的比哥农确定要同他会见；此外，他身边还有个胡若望。

傅圣泽日渐焦急，最后把自己的担忧都倾诉在三封信中。这三封信中，一封是给国王图书馆比哥农的；另一封是给法国国王私人忏悔神父李涅热斯(Liniéres)的；还有一封则是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大人(Monsignor Massei)的。从中国天主教圣公会发出的所有信函最后都到马塞易大使手中。傅圣泽在给比哥农的信中说：对他而言，到巴黎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因为巴黎的耶稣会总部经济上并不富裕，不能负担傅圣泽在巴黎延期居住的费用，尤其傅圣泽还有个与他在一起的中国助手需要照料。巴黎物价昂贵，靠傅圣泽自己是无力支付在巴黎延长滞留期间所需用的资金的。如果傅圣泽不得已而去拉·福来士耶稣会神学院，那么他将很乐意把胡若望留给这位国王图书馆馆员。

1722年10月5日，星期一，南特

傅圣泽和胡若望在南特已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了，但事情办得并不顺。要想让该地区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在检查傅圣泽那

十一箱书籍的工作上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进展，都比登天还难。在此期间，虽然傅圣泽向那些主管们提起该公司另一个主管的名字，但没一个南特的主管买他的账。傅圣泽所认识的那个主管曾与他一起工作过，有一次两人还一起旅行，去过离南特中心仅几英里远的塞森斯(Sesines)公司仓库。

从傅圣泽在南特的遭遇也可看出，耶稣会在该地区的社会基础一直就很薄弱。在创始阶段，耶稣会在当地建立神学院的所有努力，曾因镇上居民和大主教堂牧师联盟的共同抵制而一度夭折。那些人独钟其他宗教派别却偏不喜好耶稣会。1663 年，由于镇上的人最终屈服于国王路易十四的旨意，耶稣会才获许在该镇上盖楼办校。尽管那是一个大突破，但神学院校址却被禁止设在镇中心，而只能设在郊区。此外，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里从来就没有过纯文学、哲学和神学，学校因此也就像个旅客过路歇脚的旅店。这次胡若望和傅圣泽所投宿的大建筑物在镇中心，不过这栋建筑物可是个巧妙的例外。当初该建筑物的地皮是通过巴黎的代理商以其他中介人的名义，花费了 4 万多法郎巨款买下来的。由于耶稣会神学院校方深知航海、水道学、数学等科目在对外贸易和海外开拓事业方面是不可少的，他们聪明地绕过了不准设立教授这类科目的禁令，以其他名义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课程是设置了，但是学院发的二年制结业证书却不被法国海军官员们承认。那些官员们强调，他们必须由他们自己重新考核该校毕业生的实际专业水平。事态的发展使得布列塔尼的富豪们从 1715 年开始不再向航海专业的教授们提供年度津贴。没有了经费，目前这些科目只能偶尔开设一下。而这种事情的发生，真是可惜了那些正在孜孜不倦、认真求学的学生。实际上，学生们并非等闲之辈，他们或是新毕业的年轻佼佼者、或是从有

经验的水手们中认真筛选出的拔尖人物。特别是后者，他们大多不满足于现状，因向往今后在世界范围内作出更大作为而来此学习的。可叹的是，受限于这种客观条件，目前在耶稣会神学院住读的学生一般都在十人以下。

胡若望这边又出情况了。他开始拒绝在弥撒仪式中自始至终地做傅圣泽的助手。他向傅圣泽抱怨说教会里有太多的妇女，她们令他难堪。在广州，当地的耶稣会按照中国的习俗，不允许妇女出席教会活动，就连当地的中国人甚至也不让妇女在街上自由闲逛。傅圣泽对胡若望的抱怨不以为然，他认为此时的胡若望不应该有这种反应。胡若望来法国已有一个半月，也应该习惯法国的习俗了。为防止他万一再瞎闹腾，胡若望现在被软禁在耶稣会住宅区内的房子和花园内，不得外出。耶稣会住宅区内的房子和花园很大，足能止住胡若望。

在这一阶段，傅圣泽同比哥农仍继续保持着通信往来。这位图书馆员的文体优雅、语句温和。比哥农在 9 月 24 日的信中提到，如果钱是主要问题的话，他将设法为傅圣泽筹措在巴黎的停留费用。此外，他还加补了这么一段话："至于神父之中国人，若将其送至敝人处，敝人将不胜荣幸。此处将寻求资助以留其人。如其能为敝人等做些事情，敝人将探寻有何种办法能将其留在此地。若能得此人，以开展诸如惠函所述之事是如此美妙。同时，敝人亦愿此举能与神父惠愿相符。"

回信中，傅圣泽在写到有关胡若望的事情时，对比哥农稍稍作了些夸大。正如他在 9 月 29 日的信上说："敝人试探了一下那中国人有关去巴黎的意向，发现其不太愿意与敝人分道扬镳。尽管如此，那中国人或许在某日会转变主意。如敝人无法亲自带其去巴黎，敝人将尽一切努力，寻得一友将其送至贵府。"

从以下这封信，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傅圣泽对比哥农也开始

讲些心里话了。以这位图书馆员提到的有关资金短缺问题为切入口，傅圣泽详细说明了他对某些匿名的敌人欲暗中破坏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任务之担心：

> 敝人目前颇难正确回答阁下所问，实因敝人难以相信耶稣会梅森宣教院（the Maison Professe of the Jesuits）因财政捉襟见肘而影响到、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不召敝人去巴黎之决定。敝人观察到此决定之幕后诸他动机。敝人目前尚无法向阁下澄清此事，虽敝人极欲澄清此事矣。
>
> 敝人深知、并愿敬告阁下：中国古代经典有其巨大恶敌，且此类恶敌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此地。但是，古代经典支持派与其拥护者却偏偏认同此类东西。倘若敝人推断无误，一股真正无误的动力已对敝人下命令，并将免去、或在部分时间里免去敝人圣职。鉴此，敝人愿谨怀荣誉与欣喜之情与阁下探讨此等中国古代不朽之作。如敝人得以面晤阁下，当有更多详情细告，以信笺之笔谈实在难以详细论清此事矣。

在10月3日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的信中，傅圣泽却是直笔奋书，毫不隐藏心头烦恼："仆此次携来一实在不应携至此地中国人，其现在与仆同居一处。"明知去拉·福来士耶稣会神学院将有损他与胡若望的关系，傅圣泽还是忍不住写道："仆所能想得到与其分别之各种合理方案，其均拒绝。且仆越说，其逆心越烈。"那是否还有其他人能与胡若望在一起呢？傅圣泽接着说："胡若望颇难与人沟通。彼不谙任何西文，亦不知此地规矩与习俗。仆为惟一在此地可与其沟通之人。如仆不与彼处处同行，仅此足可成为彼拒去巴黎或意大利之由。"在神父

傅圣泽眼中，胡若望还不能算是个说得过去的同伴，其动辄违反傅圣泽的意愿，并不是个容易调教的人，他“秉性不正，仆在此次旅途中已完全领教。若强迫其行某事，必招致难以置信之结果。仆已尽力避开此策。”

各种迹象表明，涉及到傅圣泽今后去从之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且日趋恶化。对此，傅圣泽也日益感到无能为力。一方面，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要傅圣泽保密要求他直接向罗马教廷汇报的事，另一方面傅圣泽却又无法违抗上司要他去拉·福来士耶稣会神学院的命令，除非他将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非公开撤销令向耶稣会上级公布，然后直接去罗马。在反复权衡不同行动可能带来的利弊之后，10月5日，傅圣泽终于破釜沉舟，按自己的意愿作了决定。他写信给法国地区耶稣会负责人让·保定(Jean Bodin)，告诉他自己已下了与耶稣会指令相反的承诺。

同一天，傅圣泽再一次提笔给马塞易写信，虽然在四十八小时前他才写过一封信给这位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在信中傅圣泽再一次提到他本人在前封信中所说的话，并重申其所提出的主意是相当不错的。反之，胡若望要是与傅圣泽一起去拉·福来士耶稣会神学院，在那里不拘时间地回答每一位耶稣会同仁的问题，那么每一位同仁都会去研讨教皇遣华特使嘉乐的指示。到了那时，整个罗马的故事将不会有任何市场。“即使仆与该中国人分离而使仆本身行动得以自由，”傅圣泽紧接着写道：“整个世界仍将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

在傅圣泽书桌上的信纸上，留下了这么一行整洁清晰的句子：“即使仆与该中国人分离并自由仆身……”

1722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南特

傅圣泽迟早是要离开南特的。他为自己和胡若望预定了次日出发的公共马车票。马车将沿着卢瓦尔山谷(Loire Valley)，一路到昂热和图尔(Angers and Tours)，然后从那里再取道巴黎，途经布卢瓦(Blois)和奥尔良(Orléans)。

这些天来傅圣泽为那十一大木箱书的事搞得精疲力尽。几经波折，那些书最后算是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的检查，现正从海路邮往勒阿弗尔(Le Harve)。回想起来，他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毫无必要地被耗费去了。为了这些书，傅圣泽在十二天内写了十五封信，其中一半是为突发事件而写，有的内容有重叠，还有的甚至彼此矛盾。由于许多人为这些书卷人繁琐的谈判与交涉，信的数量和内容也就大大地增加了。

比哥农要求公司的管事们不要启封那十一个大木箱，而是把它们原封不动地直接邮到巴黎。但是法国东印度公司的管事们并不把国王图书馆部门总管这个头衔当回事。管事们坚持要将每一个箱子都打开检查，毫不在乎此举会如何损坏箱内的昂贵书籍。傅圣泽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住处与塞森斯仓库，为与稽查员们反复核对书籍清单而颠簸于路上。事后屈指而算，他至少已折腾了六个来回之多。与如在火里的傅圣泽相比，公司的那些管事们如在水中，不但对箱子的破损处视而不见，还任它们遭受日晒雨淋，百虫侵蚀。

在此时期，傅圣泽的中文书籍又受到了一位高人的关心。这位高人是国王私人忏悔神父李涅热斯。在收到傅圣泽要求协助的信后，李涅热斯神父与为国王服务的新国务大臣杜布瓦红衣主教(Cardinal Dubois)商谈了这些书籍的事情。虽然东印度

公司主管们所下令的彻底检查已完了，杜布瓦还是做到了亡羊补牢，下令把检查完的大木板箱全部封印起来，然后把它们从海路运到勒阿弗尔，再从勒阿弗尔经内河水路运转到巴黎。杜布瓦的保护举措是完善的，为防止路上不再遭受额外盘查及舞弊之扰，他还下令将这些箱子直接交给巴黎警察总局的马克·皮埃尔·达介森(Marc Pierre d'Argenson)中尉。这位中尉的职衔看起来虽然不大，但他却是全巴黎保安器材设备的总负责人。而且他还每星期去一次凡尔赛，直接与国王及国务大臣商议要事。自此，傅圣泽的事情由最高阶层直接插手处理了。此外，国务大臣杜布瓦还以书面形式吩咐中尉，让他在傅圣泽到达巴黎时，把那些大木箱直接交给傅圣泽。国务大臣对傅圣泽那些书籍的关照，使他喜出望外。虽然他本人倒更情愿那些大木板箱能走卢瓦尔山谷那条旱路，而非海路。这是因为傅圣泽考虑到英吉利海峡当时正处在一年中暴风雨最多的季节，木箱不但可能会遭受更大的破损，而且万一遇上海难，整批书籍都有可能葬身海底。不过从经费支出方面来看，走卢瓦尔山谷那条旱路的费用会远远高于海路，况且对这批书籍的托运方式也已不由得傅圣泽自己作主。尽管如此，从结论上看，不论那些书籍走海路还是陆路，傅圣泽的努力总算有了部分结果，至少他傅圣泽本人和胡若望，以及他的书籍现在都可以离开南特了。

解决了傅圣泽书籍托运问题的李涅热斯神父，还向他提出了一个解决中国人胡若望问题的建议。他说：如果傅圣泽需要释放掉这个"尴尬"的话，一个曾经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神父阿曼德·纳爱尔(Armand Nyel)目前正在等待最早出发的邮船重返中国。纳爱尔神父七年前回到欧洲，现住巴黎。李涅热斯神父已征得他的同意。那位神父回信说他自己："很愿意带那个中国人回中国，如果留其在此地确实很麻烦的话。我个人业已看出

此事将来定很麻烦。”

此法是否可行尚需推敲，但就算此法行得通，傅圣泽和胡若望仍需先到巴黎，才能展开下一步行动。此次旅行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此时此地的傅圣泽也用不着再写信向哥比农求助了。因为傅圣泽从 10 月 5 日收到的来信中得知，他与教皇特使嘉乐在中国的约定已被证实并在上层内部得到承认，那位地区耶稣会的负责人让·保定最终决定取消命令傅圣泽去拉·福来士耶稣会神学院汇报的决定，转而同意他直接去巴黎。

这段日子，众多信件互相交叉往来，举不胜举。以上所提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两封而已。

胡若望现在在做什么呢？对他的处理目前可是骑虎难下，不得不暂时将他关在那个大花园里。在此期间，胡若望仍是一如既往，照旧拒绝誊写任何东西。想到此，傅圣泽对两人整整九个月的合作结果心酸不已。所谓结果，也仅仅是留在一个狭小的本子上的誊写文件，而那点儿活一般人只需一天就可搞定。

某天清晨，当傅圣泽正在教堂主持弥撒时，同在教堂中的南特修道院院长、神父奥麦垂（Aumaitre）偶然向窗户外的花园望去，发现胡若望正双腿下跪、手指苍天，痛苦地扭曲着脸在哭诉着什么。修道院院里无人能破解那姿势所表示的含意，也无人知道胡若望所说的是什么。

172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布卢瓦

从南特到布卢瓦（Blois）的旅途也不顺利。车一出城，进入乡间的道路后，在傅圣泽的眼里，胡若望马上又变得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见到任何新鲜的东西必定要从车上跳下飞奔直去，以图看个究竟。当路边出现风车时，胡若望就爬到风车上，细细研看

其结构。上一次他们自己雇的四轮马车为胡若望的半道出轨已够麻烦的了，这次是公共马车，胡若望的举动更让车上其他的旅客大吃一惊，都瞪大眼睛瞧着他。

为了防止胡若望故伎重演，此次傅圣泽为胡若望订的是车后排的座位。那座位既不靠门也不靠窗。但是那根本难不倒胡若望，他自有惊人的与人沟通术。胡若望用形体语言、用目视表达的方式来说服其他坐在门边的乘客放弃他们靠门的座位。一旦胡若望移到了车门口，开门跳下车仅是时间问题。上上下下多次回合后，在某日傍晚天将黑时，车上的旅客和几个路边行人用粗缆绳把胡若望捆起来拴在车后，让他一个人跟着车跑，胡若望这才安静了下来。好一阵后，精疲力尽的胡若望才被松绑放回到他自己本来应该坐的座位上。此后，在马车到达旅店前，胡若望再没跳下过车。

公共马车乘客每次共同用餐的时间，也是傅圣泽难堪不已的时间。胡若望好像不知道厨房是禁止入内的地方，他常常自行进入厨房，看到厨房内桌子上和食橱里有他自己喜欢的食物伸手就拿。当厨子们阻止他时，他就大声驳回——用的是傲慢的汉语。接下来是看热闹的人群，扭打，以及出手的拳头。胡若望有一次甚至还找菜刀要用来自卫。

一有机会，傅圣泽总是试着先向胡若望解释诸如此类的规矩与礼节，但胡若望并不常常顺从傅圣泽的意愿。有几天，胡若望拒绝与傅圣泽坐在一起，他要求一个他自己的桌子，并要求傅圣泽把他的饭钱直接交给他。这样，他就能以形体语言要他自己想要的食物。旅途中天气逐渐转冷，胡若望穿上了长袜子和两套内裤。休息时，他占据旅馆内主壁炉前面的一块地方，挽起他的短袍和衬衫的下摆，以便将他的后背烤得暖和些。

傅圣泽对自己如何将胡若望带到巴黎的主要耶稣会分部愈

发忧愁不安，并为此日渐茶饭无心。随身带着这么个举止特别的胡若望，那将是件丑事。他的书籍、研究以及他在罗马的生活都会因此危机重重。人遇到这样的危机，一般都会找朋友帮忙。傅圣泽此时想到两个他可以信赖的朋友，并准备向他们求助。一个是让-巴普泰斯特·杜哈尔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神父，另一个是勒欧那德·哥瑞曼(Leonard Gramain)神父。杜哈尔德神父在1696年时曾是拉·福来士耶稣会神学院的讲师，当时傅圣泽也在该神学院教数学。此时他给国王私人忏悔神父李涅热斯当私人秘书。后者哥瑞曼神父年轻时就是傅圣泽的朋友，他现在是某耶稣会神学院院长，该学院院址在奥尔良(Orléans)。傅圣泽在中国服务期间，哥瑞曼定期汇钱给他，从未间断。藉那些钱的资助，傅圣泽才得以购买更多的书。

傅圣泽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他写了封信给杜哈尔德，请他在巴黎为胡若望找一个私人寄宿处。他又订了两张去奥尔良的马车座位票，准备和胡若望暂时投身彼地，在哥瑞曼的怜悯与关怀之下。

1722年11月3日，星期二，奥尔良

傅圣泽在夜里丢下胡若望独自到巴黎去了，走前没向胡若望留下一句话。傅圣泽相信，假如他告诉胡若望自己要单独去巴黎，胡一定会当众大吵大闹而无法收场。事情的发展果不出傅圣泽所料。当胡若望警觉到傅圣泽的出走，果然大吃一惊，立即拉响警报。神父哥瑞曼想方设法，以各种手势及标识向胡若望解释说傅圣泽暂离数日，不久就会回到胡若望的身边。

胡若望喜欢上了哥瑞曼，并对神父深信不疑。胡若望也喜欢上了奥尔良这个地方。他开始觉得在奥尔良等待傅圣泽是件

不错的事情。他住在一个特别的、用墙围起来的耶稣会住宅院落里，院落中有个极大的花园和高耸的教堂。傅圣泽认为：胡若望现在一个人在此打发日子，应该过得舒适从容。教堂内有两幅大油画，它们给教堂增辉不少。一幅是西蒙·沃爱特画的圣女坐姿图，另一幅的作者不详，画的是在神的光辉照耀下的世俗世界。神的两侧有四个拟人化了的象征，每一个代表世界的四分之一。

巴　　黎

第六章

1722年11月25日，星期三，巴黎

胡若望的恐惧看来已被远远地扔到九霄云外。应傅圣泽的请求，哥瑞曼把胡若望送上了从奥尔良到巴黎的公共马车。这次胡若望独自的旅程却是相当平安，一路无事。胡若望喜爱巴黎，这是他一路上规行矩步的主要原因。爱屋及乌，胡若望也喜爱巴黎所有的东西，包括城市的嘈杂声、大街小巷的繁忙景象、高高的私人建筑物、雄伟的教堂、塞纳河[1]边的码头、豪华的卢浮宫殿、巍然屹立的大桥，以及公共广场。“这里是天堂”，有一天胡若望对傅圣泽说，“这里真是个人间天堂”。胡若望平时并不常以这种语调讲话。

这一年的11月巴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庆喜气中。这是因为年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已长大成人，王室要为他开始执政举行庆祝活动。新国王路易十五将首次参与国事，他的新一轮诞辰即将被宣布，他目前的摄政、叔父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将因此逐渐淡出权力，由年轻的国王以自己的名字掌握朝政。

巴黎的耶稣会为配合这次庆祝活动，也早早地作了准备。其成员演出了自导的中国情调大型芭蕾舞剧，剧情大意是古代中国贤明的君王们是如何在其国土中，根据聪明和德行、而不是根据血统来挑选接班人。就在几个星期前，巴黎还燃放过烟火，办过彩灯展活动，其中部分主题还以中国为主。这些节日的烟火和灯展把法国的夜空装饰得五彩缤纷。

对傅圣泽来说，此时这种节日带来的快乐心情主要也许来

① 塞纳河（Seine），流经巴黎市中心的河流。

自总算将胡若望具体安顿下来的放心心态。胡若望目前在一个英国天主教徒的家中寄宿，那家主人姓白尼斯(Baynes)。寄宿的事是神父杜哈尔德在接到傅圣泽从布卢瓦寄给他的信后，几天之内就安排妥当的。房东詹姆斯·白尼斯曾是被罢黜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Ⅱ)所任命之官员，詹姆斯二世被流放到法国后，他也同国王一起到了法国。詹姆斯二世撒手人寰以后，詹姆斯·白尼斯仍留在巴黎。白尼斯先生已婚，有个女儿年约二十岁。他们接受胡若望在其家中寄宿，并向胡若望提供犹如寄宿公寓般的膳食和住宿条件——面包、葡萄酒、汤、盛有肉食的盘子，再加上一个独用睡房。事实上，他们觉得他们提供给胡若望的服务每天该值二十个5角法币，超出傅圣泽实际付给他们的费用。而傅圣泽的原意却只是想找一个能让胡若望落脚一星期的地方，不过白尼斯一家硬是只愿提供无时间限制的报价，并且声称他们给予胡若望的是“一组套房以适合于一个绅士的资格”。另一方面，神父杜哈尔德在同白尼斯交涉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告诉白尼斯胡若望举止有些古怪，不过当时的交涉双方都宁可相信，充分的休息和可口的饮食可能是剂良方，经久日长会治愈胡若望的毛病。交涉中杜哈尔德只字未提胡若望有暴力倾向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杜哈尔德本人也不甚了解。傅圣泽对胡若望这方面的问题也一直支吾其词。

杜哈尔德个人认为，胡若望的不明发作主要源自于体内的微小不适，这种不适多由水土不服及食物的变换引起。如果真的需要就医，不久就会有个期望去中国的耶稣会教士医生到巴黎来，且该医生的医疗水平有口皆碑。杜哈尔德对胡若望似乎并不担心，他倒是有些担心接受胡若望的人是否也会再次“让胡若望鼻子出血”，不过他未将他的这种担心流于外表，只与傅圣泽私下分担而已。除此之外，杜哈尔德还担心傅圣泽是否会背

着胡若望秘密出走，因为如果那样一来，此地就没有一个可与胡若望沟通的人，而那时的胡若望一定会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不过事实证明，胡若望并没做出想象中的那种过度反应。白尼斯当然不懂汉语，但看上去也没使胡若望感到不自在。在白尼斯家，胡若望仅有的奇特习惯是把他自己房间的床垫、被单和被子都一古脑儿地从床架上挪到地上，并坚持开窗睡觉。白尼斯一家容许他的这种习惯。胡若望有厚厚的被褥，能在 11 月的冬夜，在窗户大开的房间里把自己包得暖暖和和的。

白尼斯的家位于耶稣会梅森宣教院（Maison Professe of the Jesuits）的正后面，介于圣安东尼大教堂（the ure St. Antoine）和塞纳河之间，傅圣泽偶尔能上门看望一下他的这位中国助手。不过傅圣泽太忙，胡若望也有他自己的事——出门去探测他周围的异国新事物。

梅森宣教院是耶稣会在巴黎地区的总部，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新事物够胡若望发现与了解的。宣教院外，一群群楼房和花园坐落在中世纪巴黎旧城的高墙后，它们是靠王室的捐款以及聪明的不动产投资者们所建造的。梅森宣教院的一个主楼里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它们使该楼日日生辉，远近闻名。这两幅画均出自麦其奥·盖瑞第尼（Melchior Gherardini）之笔，其中一幅的主题是赞美圣路易和他的光辉，画面的内容由四个故事组成，观画者可借助于大楼中心的螺旋形楼梯仔细观赏。另一幅画位于大楼北侧的图书室内，画直接画在天花板上，描绘的是耶稣会教士在全世界传播福音的各种情形。那个图书室里有两千多册稀有图书，而且品类繁多。这些图书分别来自三批慷慨的捐赠，时间从 1680 年到 1720 年为止。好奇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此地，他们参观、了解画中的那些殉教者，以及画中对每个圣徒日课所作的图解。图书室里还收藏着前任国王的私人忏

悔神父所捐赠的一些稀有大奖章、一位珍物收藏家以及几位科学探索家捐赠的各种珍贵物品。这些物品的种类形形色色，百般离奇。譬如其中有：一个鸵鸟蛋、一副变色龙的骨架、来自伊甸乐园的一只鸟的标本，以及来自杰里科[1]的一朵蔷薇花。

三十多位牧师和二十多个信徒住在梅森宣教院的主建筑物里，院里另有九个特别雇员照顾他们的起居。这些雇员分别为：看门人、裁缝师、面点师、厨师、餐厅负责人、采购员、圣器收藏室兼教堂看守人，以及药剂师和医生。这九个职员还分别有其自己的仆人与助手为他们服务。光维持这一大伙人的每月基本伙食费大致就需1 500法郎左右，而这些费用仅仅是把橄榄油、面包、葡萄酒、燃料、肉、煤和蜡烛等生活必需品加起来的总额。如在此基础上能再稍稍加上其他一些额外的、较容易到手的东西，如烟管、咀嚼的烟草、鼻烟、热可可和咖啡，以及租马车的费用，那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当然增大这部分开销会有流言蜚语之虞。这座楼就像当时全法国的缩影，看到它，胡若望应该就等于看到了全法国。

离宣教院几步之外就是圣路易大教堂，它是耶稣会在巴黎的宗教中心。虽然比起17世纪的光辉时期来，它好像出现了在走下坡路的颓势，但至少在目前，每星期都有成群的听众拥入中心教堂，来听巴黎最伟大的布道讲演。在这种形势下，教会预算的一个主要项目就是筹措额外的椅子，洗涤每天由信徒和听众的皮靴及鞋子带到教堂内的灰土所需花费的钱款。教堂本身则仍旧显得那么宏伟壮观，它有着硕大的穹隆和面对圣安东尼大教堂的华丽前院，以及三扇既厚实又优雅的大门。这三扇门还是由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先生个人捐赠的。

---

① 杰里科(Jericho)，又称埃里哈(Ariha)，为西亚死海以北的古城。

面对着教堂正门，有一个人工喷泉，那是日新月异的巴黎工艺结晶之一。这个奇迹建于 1707 年，其喷泉的动力来自塞纳河圣母院(Notre-Dame)大桥附近的强力唧筒，唧筒的设计还考虑到其是否能提供足够的水压将水一路穿过邻近的街道楼宇后再送至喷泉。尽管街道楼宇实际上远比喷泉更需要水。

要是从梅森宣教院往南走，不多远就是塞纳河。途中还会经过圣母玛利亚女修道院。塞纳河上还有一座搭建在木桩上的木桥，直通罗维尔岛(the island of Louviers)。罗维尔岛上处处可见成堆劈好的、供壁炉使用的烧柴出售，船码头一带还有水果和干草出售。河沿的一侧是公园，它属于兵工厂的私有地。园内四季常青、百花争艳。公园的一边连接着槌球场。在一排排大树的绿阴下，人们使用租来的球棍在玩槌球。如果胡若望对眼前的这些美景没有兴趣，那么在罗维尔岛与圣母院岛之间还有一座称为圣保罗(St. Paul)的小码头，码头上堆着石灰、木料、鹅卵石，以及煤炭。停泊在码头的大船上人来人往，装满葡萄酒的大木桶不断地被卸到岸上。另外，胡若望还可以见到来来回回拉水的马车也在这一带凑热闹，它们把水从此地拉到勃艮第(Burgundy)和奥塞尔(Auxerre)，不仅如此，到勃艮第、奥塞尔，以及到里昂(Lyons)的长途驿马车也从码头附近的萨恩斯旅馆(the Hôtel de Sens)出发。塞纳河上，还有一座名为蓬玛丽(Pont Marie)的拱形桥。桥一共有五个拱门，将北岸和圣母院岛连接起来。桥边停泊的是出售新鲜水产的船只，它们几乎是二十四小时营业，市民可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到此地采购。

胡若望要是有兴趣的话，还可一路朝东，溜达到圣安东尼教堂，此地是全巴黎面积最大的景点。走过教堂，沿着右前方宽阔平整的大道走下去的话，路的左前方会出现一座高高耸立、光辉灿烂的皇家寓所，再往前走一会，会看见宏伟的包特圣安东尼教

堂。包特圣安东尼教堂有三个巨形拱门，教堂的四个角顶端还竖着高高的尖塔，塔顶的尖角形状奇特，难以名喻。出了包特圣安东尼教堂，抬头向前，可看到八座高高耸立的圆塔尖，那是巴士底狱，圆塔的塔身则藏在监狱城墙内。监狱的左侧是旧城墙的水沟，又深又长。在监狱的一侧，可见到弓弩手和火绳枪兵们在操练。

要是不停步再笔直往前走，越过育婴院后再穿过开阔平坦的乡间田野，会有几栋更加雄伟华丽的豪宅跳入眼中。此时脚下的林阴大道一定灰尘满天，它蜿蜒曲折，直向沙榔东。

胡若望在巴黎漫游探险的当儿，傅圣泽不例外地有上百件事情要去处理。他得去见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讨论具体去罗马的行程；他得与汤布瑞尼（Tamburini）神父联系，以确认自己的计划。汤布瑞尼神父是整个耶稣会的首席负责人，住在罗马。傅圣泽还得同杜哈尔德神父和纳爱尔神父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杜哈尔德神父对中国相当有兴趣，而纳爱尔神父说是不久将被派往中国传教。对于胡若望的问题，法国国王的私人忏悔神父李涅热斯曾经说过，如果事态发展到需要将胡若望送回中国的话，他愿负责将胡若望带回中国。近些日子纳爱尔似乎改变了他的计划，将不再去中国，且近期也不去任何其他地方。纳爱尔和杜海德经常不断地给傅圣泽打气，支持他对中国礼仪和中国古典的重要性所持有的正确看法。傅圣泽知道他俩将会把他有关中国古典与宗教的研究与诠释传递到罗马教廷去。他的观点粗看上去是那么怪僻与矛盾，但他的解释是完整的，而且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傅圣泽解释道，中国人之所以缺少打开解释他们自己古典作品的钥匙，是因为该钥匙实际为基督教的奥义所在。其他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虽然知道基督教的奥义，但他们并未认识到他们已提供了这把钥匙。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并不真正

了解傅圣泽的观点所在。

对于中国人祖传的祭祖及其他礼仪祭典习俗，傅圣泽是这么说的：虽然许多耶稣会教士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祭祖及其他礼仪祭典多于伦理行为而少于宗教实践，但由于教皇已宣布过那些祭祀礼仪是迷信，傅圣泽因此个人也接受教皇的圣断[①]。尽管如此，傅圣泽认为他知道存在于整个问题内部的微妙暧昧之处。傅圣泽指出，他在中国曾会晤过许多有学识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并不相信他们祖先的灵魂住在某些特制的墓碑或牌匾中。举例来说，在中国，如果一个家庭的全部成员分散于各地，他们会在同一时刻祭拜他们的祖先，而不论他们在哪里。他们的举动表明，那是他们祖先的灵魂赋予祭拜仪式的力量，而不是牌匾本身。傅圣泽相信中国人的礼仪祭典习俗最后会被罗马教廷接受，就如同仅仅制定一个市民与政治的祭仪一样。如果罗马教廷下达那样的决定，并不会抵触傅圣泽的基本信条。傅圣泽的这个信条就是：在悠久的历史中，中国人祭拜的一直是基督的神。傅圣泽在中国时曾亲眼所见、并亲自证实了中国皇帝的公共祭典与中国民众的祭拜仪式有明显的不同，它们不但有明显的不同，而且根本就是两回事。傅圣泽相信他个人的特别贡献。他的这个贡献基于他发现了一个能使中国皇帝和教皇双方都满足的折中办法，从而能重新开启传教的大门，让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发展、壮大。

---

① 清初康熙皇帝鉴于耶稣会传教士承明末利玛窦等先期传教士的做法，在宣教的同时，尊重中国人祭祖拜孔的传统，并在中国传授西方科学等，允许传教士在中国部分地区传教。后由于罗马教皇禁令中国教徒祭祖，并前后两次派特使到中国传令，而康熙帝派耶稣会传教士去罗马亲见教皇解释亦未果。对于罗马教廷的顽固政策，康熙帝遂于1720年禁教，几年后更将全部传教士驱逐出境。罗马教廷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解令允许中国教徒祭祖。

即将实施的罗马之行现在占满了傅圣泽的整个脑海。他将各项具体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为能顺利前去罗马而处心积虑地制定了各种切实可行的计划。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已宣布马赛(Marseilles)正在闹鼠疫，虽然那儿的主教已命令所有的教堂都得重新开放，但挥之不去的鼠疫仍从马赛经海路向南传播，其中的一支或已越过阿尔卑斯山，并正往山麓地带移进。此时的傅圣泽正在查找比较靠近北面的陆路，找那些坐马车经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去罗马的路线，并准备预定他和胡若望的车票。剩下的麻烦是他那十一大箱书至今还没有运到勒阿弗尔，加上傅圣泽自己也还没有有效的旅行护照。旅行护照惟有国务大臣杜布瓦可签发，但那位国务大臣大人似乎并不着急。要是实在等不及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等书运到了勒阿弗尔，先让胡若望到那儿，傅圣泽可在护照到手后再去勒阿弗尔，与胡若望和他的那十一箱书在那儿一起会合。他们然后可以一起乘船经英吉利和直布罗陀海峡，为避开鼠疫区域，可能会先在利伏诺(Livorno)上岸。傅圣泽试探了一下胡若望对后一个计划的反应，胡若望没有具体的地理概念，但想到不久就可踏上去罗马的路，并能最终见到教皇，他是盼望这次旅行的。

傅圣泽已没有时间在巴黎为胡若望作向导，不过担任法国耶稣会远东传教负责人的神父奥瑞(Orry)愿意承担此项额外任务。奥瑞神父对胡若望很有兴趣，并希望胡若望在巴黎停留期间过得愉快。他指定了他的一个秘书带着胡若望游览所有外国人可能会有兴趣的巴黎景点。观光游览日排在 11 月 27 号，那天是星期五。

1722年11月27日，星期五，巴黎

胡若望一定走丢了。他没有回到白尼斯家，没人知道他现在何处。

按照预定计划，奥瑞神父的秘书一大清早就到了白尼斯的家，然后带着胡若望外出观光去了。两人先到了位于城西的杜伊勒里宫(the Tuileries Palace)。在那里欣赏美景的时候，人群突然一阵骚动，将两人各自冲散，互不见踪影。等到人群散开后，那秘书在那一带来回搜了个遍，也没找到胡若望，最后不得已满怀沮丧，败兴先归。

白尼斯一家人为此担心不已，他们同时向傅圣泽传报了胡若望走散未归的消息。傅圣泽也着急得很，急忙给巴黎警察署的达介森(D'Argenson)中尉留了个条子，报告胡若望的失踪〔达介森中尉住在离梅森宣教院不远的维利教堂(the Vieille rue du Temple)附近〕。达介森中尉遂将傅圣泽的寻人请求传送给被称做“射击手”的巴黎街头巡逻治安队(the Archers of the Watch)。这支队伍每天晚上挨街巡逻。当夜，他们除了检查教堂外，还特别留意寻找那个被报失的中国人。

“射击手”巡逻治安队(Guet)在巴黎是个重要的景观。全队共一百五十人，队员的职位都是自己出钱买下的，但他们每年能从巴黎市政府收回为自己这个职位所投资的百分之五，此外还有部分税务豁免及特别贴现。队员中的三分之一每日骑在马背上巡逻，其他人则步行。

社会上有的人认为这些队员的生活是一种无聊的混合。此种无聊的混合中搀杂着每天的例行公事、热热闹闹的噱头剧，间或还有戏剧性或小小危险性的突发事件。不过近几年来这支巡

逻治安队队员们的生命充满了危险，那是因为有一帮声名狼藉的痞子结起团伙，他们抢劫杀人，无恶不作。这帮团伙的领头是一个绰号叫"弹药筒"(Cartouche)的年轻地痞。"弹药筒"外表迷人，平日看似穿戴得像模像样，其实只是绣花枕头，大脑里绝对是一包草。那个地痞胸前终日挂着帮会标志，手上总是提着一根带着金属球形把柄的精致手杖。那手杖要是挥舞一下，即刻可把人的脑骨轻易打碎。这帮团伙使巴黎在整整几个年头里充满恐怖。最终有一天，"弹药筒"被同伙出卖，其后于1721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送上了断头台。"弹药筒"的同党和兄弟们现今仍被巴黎巡逻治安队集中关押着，并以较快的速度将他们审判处理。这些人基本上被分成五十人一组，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流放到大船上做工，有的身上则被烙上犯罪者的标记，终身不褪。

除了街头巡逻之外，"射击手"队员们也有其他比较简单的任务。譬如打扫巴黎街道中的一条赛道就是其中的一项。这条清洁的道路使得塞莱恩特伯爵有信心注下大赌，说他能在六个小时内两次往返于巴黎和尚蒂伊(Chantilly)。当今的法国国王为此还专门派了他的私人天文学家卡塞尼(Cassini)来计时确证。尽管比赛中有一个"射击手"队员不小心犯了个大错，闯进了伯爵的赛道并差一点使伯爵掉下马来，塞莱恩特伯爵还是在他二十六匹坐骑的帮助下，仅用了五小时四十分钟结束了赛程，比预定时间早到了二十分钟。最后，伯爵不仅体面地赢回了自己的赌注，还大获1 000多法郎。除了诸如此类的简单任务外，"射击手"队员有时还得身着制服出席一些正式的仪式。如最近他们出席的仪式就有：欢迎过从威尼斯到巴黎来的大使们；年轻的国王出巡时为他护卫以壮声势。

上述诸例，仅是为了证明巴黎的这支"射击手"巡逻治安队

熟悉城中的每一个角落而已。在巴黎，如果有人能找到胡若望，该人必定是这支队伍的一分子。对这些队员们而言，找个走失的人并不是件什么难事。毕竟据我们所知，当时整个巴黎也仅有胡若望这么一个中国人。

172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巴黎

胡若望回来了，他现在与白尼斯家人在一起。“射击手”队员在清晨三点左右找到了他。当时队员们正将近完成他们一整晚的扫街工作，其中有人发现胡若望抱着肩膀坐在匹太特斯·梅森斯(Petites Maisons)医院大门外的石阶上。那医院距塞纳河南边甚远，在城市的西面。“射击手”队员们后来把胡若望送到了白尼斯家，并得到了可观的小费以回报他们的辛苦。那个夜晚异常寒冷，胡若望肮脏不堪，浑身直抖。

事情是这样的：当胡若望与奥瑞神父的秘书走散后，他开始在城里随意乱跑。后来，他过桥越河，在河南边一带逛了一阵，最后陷在当地迷宫般的街区里，天黑之前一直没找到方向。由于胡若望后来是在匹太特斯·梅森斯被发现的，他也许走过了皇家苑(Pont Royal)，在白克路(the rue du Bac)漫游了一圈，然后到了瑟午路(the rue de Serves)。没人知道一直到清晨三点之前胡若望是怎样打发时间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看见了他从来没见过的另一个巴黎的面孔。从当时“射击手”巡逻治安队的记录可知，那一阵他们逮捕的人中有诸如此类的几种可怜的人物：乞丐、童妓、跛腿人、企图自杀者、醉汉、砸门破窗的偷盗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以及无人愿雇用的失业者。当时难道没有个叫弗朗索瓦·海娜琳或苏珊娜·葛兰德的女人在与瑞士水兵做爱前上去与胡若望纠缠过？难道没有一个叫皮埃尔·巴

介特的家伙要向胡若望出售他镶着假宝石的假金项链？当时是否还有个叫玛格丽特·奥格鲁特的女人对着胡若望的脸晃动着她的镀锌铁罐，伪称她在为贫穷的监狱犯人募捐，而不管胡若望懂不懂她讲的话？那些冷酷的、失去灵魂的可怜家伙大部分是巴黎本地人，但其中也搀杂着些从法国其他遥远地区来的人。更远的甚至还有从法国边境的另一边、从佛兰德斯，或是从皮德蒙特以及从瑞士来的人。

见到胡若望安全回来，傅圣泽算是松了口气。不过傅圣泽此时觉得原定星期一去见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日程应该改一改了。改动日程的主要理由是教会中的马塞易（Massei）大人[①]希望亲自见一下胡若望，以确认其是否已准备好去罗马，并在该地服务。藉此机会，傅圣泽将胡若望的冒险经过简单写下，交给了大使的稽查员若塔牧师（Abbé Rota）。傅圣泽在信中强调了胡若望的肮脏、行为不检点，以及服饰不整等方面问题，并询问胡若望是否可被免除会见。大使断然拒绝，指示胡若望必须按时被带到。若塔牧师给傅圣泽的回信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提到大使的指示的："在下向大使（M. le Nonce）提到了足下的简函。大使希望在星期一见到那位中国人，不论那个中国人现在处在他自己所认为的任何状况。大使责令在下转告足下，如果那中国人的习性是毁坏每一样东西、且不在意任何一样东西，那么也无需将那中国人用更好的衣服打扮起来。"

1722年11月30日，星期一，巴黎

胡若望见到了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大人与他的下

① 大人（Monsignor），为天主教中比神父高一级荣衔的神职人员。

属，那是次不成功的会见。胡若望不是由傅圣泽，而是由三天前将胡若望丢失的那位秘书带领，送到若塔牧师那里的。若塔见到胡若望后，再将胡若望引至大使的接待室。接待室里，傅圣泽正襟危坐，早就等在那儿了。

接待室里布满了大使的随从人员。其中有办事员，有绅士，还有听差。胡若望一见到接待室内墙上挂着的十字架，立即双腿一屈，两手着地，也不顾周遭吃惊的眼光，接连磕了几个响头。见此，傅圣泽赶忙起身向从内室走出来的大使解释这是中国人献身于神的外在表现（由于传教士的偏爱，磕头在中国只用于虔诚的"星期五"，也就是耶稣的受难和死亡日，虽然有时这过火的献身表现会使皈依者叛逃）。

碰着这么一位大使，万事都不顺。当胡若望磕完头起身时，傅圣泽将他引见给大使和众人。不过，未及对方开口，胡若望又出了新状况。这是因为胡若望突然注意到室内临时安放着的三把扶手椅。胡若望估计这三把椅子是为他们准备的，但椅子的排列缺少对他正在拜见的、被教皇指定的代表——他是对的——的尊敬。于是，胡若望一边大声叫着"大主教"，一边抓住一把为大使准备的椅子，把它挪到了室内尽头。那是他自己定下的、室内最荣誉的地方。接着，胡若望又拿起另外一把扶手椅，将它放到他认为大使该坐的椅子旁边，力促傅圣泽坐到那去。"至于我自己，"当他放完第二把椅子后说，"我会站在另一边。"而后他开始恭谦地双手低垂，站在室内的另一尽头，面向那两把扶手椅。胡若望的动作是如此之快，没人能防止他这么做。站在一旁的傅圣泽此时开始与大使交谈起来。

傅圣泽再一次地解释胡若望的举动显示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重要性。这位罗马教廷大使到巴黎才一个多月，并在两星期前有机会获得了包括年轻法国国王的第一批听众。大使对他的

个人尊严有其自己强烈的感觉，胡若望的举动既没取悦他，也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会见相当短暂，之后胡若望被允许离开接待室，回到白尼斯的家里。

1722年12月上旬，巴黎

某日夜半，胡若望梦见他的母亲去世了。这一次，他彻底掉进了极度的悲哀深渊之中。白尼斯一家和傅圣泽企图说服胡若望那只不过是场梦，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他母亲去世。但胡若望固执己见，全然听不进众人的劝说。他神情悲切，日夜恸哭，声及四邻。

胡若望的压力痕迹处处可见。他的房间肮脏不堪，房间里的家具都不在原位。白尼斯的女儿进他的房间打扫，他又愤怒不已。发现种种努力都不能让白尼斯小姐立即离开他的房间后，胡若望甚至做出要揍那位小姐的姿势，除非她马上离开胡的房间。另外，胡若望对白尼斯太太的态度，也是那套男女授受不亲的架式，不很友善。白尼斯先生见此，不得不向傅圣泽讨教良策。傅圣泽也没有任何良策可献。他感到那种从身上放血、喝营养汤，以及交替节食的简单疗法对胡若望根本就不管用。有一天，白尼斯先生必须要离家外出，到晚间方能回来。由于担心胡若望趁他不在家时又节外生枝，搞出什么预想不到的事来，白尼斯就将胡若望锁在房间，然后出门了。胡若望则破门而出，害得傅圣泽还得赔出这笔修理费用。偶尔，白尼斯还会用鞭子教训一下胡若望。

胡若望继而对傅圣泽表示，今后傅圣泽做弥撒时他不再帮忙。他们原先共享的那一段一起做弥撒的美好时光，自从离开南特后，仅仅只出现过一次。而此时他们所去的巴黎的这个大

教堂，在端庄方面比其他教堂更神圣庄重，在装饰方面比其他教堂更有品位，在银盘和圣坛悬挂物方面则比其他耶稣会教堂更富有。不仅如此，大教堂内还奉祀着香气四溢的国王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和大康迪[①]的心脏，这些祭祀品不仅可证实耶稣会过去的显赫，还可证实王室与该耶稣会的特别关系。可是令人狐疑的是，胡若望却偏偏要避开这些荣耀的财富。傅圣泽想搞清楚胡若望到底在想些什么，他让人将胡若望传唤到教堂内的圣器收藏室，并让胡若望自己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胡若望服从傅圣泽的传唤，来到了教堂。进了圣器收藏室后，他不直接回答傅圣泽的问题，却告诉傅圣泽，说他看见了在拼花地板上有一个充满十字架的迷宫。胡若望随即踮着脚尖，为避免弄脏这神圣的方块地板，几个箭步蹦到了室外。

胡若望还告诉傅圣泽，说白尼斯一家给他的膳食太好了，他无需如此奢侈。胡若望还老调重弹，再次提出他要去当乞丐，并靠乞讨走遍全法国，与他在路易港城时说的一样。不过他这次并没光停在口头上，而是动了真格。他确实几次离家出走，沿街乞讨。要是有几个好心的人给了他几个铜板——他们有时候是会这么做的——那也是因为胡若望本身是个有趣的异类，相貌不同于欧洲人。胡若望用他讨来的钱买面包和一些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小玩意儿。无论在大庭广众前，还是在大街小巷，胡若望毫无顾忌，常常一边使劲地咬着手中的罗宋面包，一边悠然自得地随意瞎逛。

① 康迪(Conde, 1621—1686)，路易一世的曾孙，法国将军。曾率法军在三十年战争中战胜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后人仰其诸多丰功伟绩而称其为“大康迪”(the Great Condé)。

1722年12月下旬，巴黎

任何能尽快乘船出发到罗马的希望接二连三地被无情击碎了。傅圣泽原本打算和胡若望先到勒阿弗尔，然后再从那里出发到罗马。可是消息传来，说法国东印度公司拒绝照管他那已运到勒阿弗尔的十一箱书，因为国务大臣杜布瓦下过令，傅圣泽运到勒阿弗尔的书都需从停在塞纳河的船上卸下，转运到鲁昂(Rouen)，然后再从那儿直接运到巴黎警察局，交给警察局保护处的达介森中尉。如此一来，傅圣泽的学术性工作势必受阻。

在这段时间里，傅圣泽与胡若望彼此的灵魂曾贴近了一阵，那是胡若望提出要自白忏悔所致。自两人结束在“康蒂王子”号船上的旅行，胡若望还从未提出过要自白忏悔。傅圣泽爽快地答应了胡若望的要求，但是在程序上还有些麻烦要解决。由于一些教会大学和教会机构中反耶稣会人士的不懈要求，几年前巴黎地区的总主教诺瓦耶红衣主教(Cardinal de Noailles)曾下过禁令，不容许任何教士在梅森宣教院听信徒自白忏悔。该禁令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所以甚至年轻的国王路易十五要向他的耶稣会神父李涅热斯忏悔，巴黎教区也不得不向它的上级、在沙楮的上级教区汇报请示。傅圣泽也不例外，他必须去巴黎的总主教那里得到特别豁免。红衣主教诺瓦耶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要自白的请求来自一个异邦人。

傅圣泽尊重个人的内心隐私，他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胡若望偶尔自白的记录。但可察知，胡若望用自己的办法度过了那段困难时期。其间，胡若望还搞了个其他小名堂。他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秘密地做了个小鼓，鼓的直径大约有6英寸长。除了鼓之外，他还自做了一面小旗。小旗大约有1英尺多长。在那面

小旗上，胡若望写了“男女有别”四个粗体字。当他完成此举后，胡若望骄傲地拿出给傅圣泽看。傅圣泽把胡若望的这两件小玩意视为小孩的玩具，随意奚落了几句，没把它们当回事，也没想要没收它们。当时傅圣泽根本不知道那小玩意会被派上什么用处。

当下一个圣日到来时，胡若望将小鼓挂在胸前，拿着小旗跨出了他自己的房间。走出白尼斯家的大门后，他一手高擎小旗，另一手有节奏地敲着鼓，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梅森宣教院，然后再转向邻近的圣保罗教堂。鼓声、嘈杂声以及胡若望有趣的装束与长相一路上吸引了一大群巴黎人，他们莫名其妙地也跟着振奋起来，尾随着胡若望向前挺进。当一行到了圣保罗教堂大门口，胡若望停了下来。他站在这座因拥有三个比例悬殊的高塔而远近闻名的建筑物下，开始了他的胡氏布道。胡若望挥舞着手中的旗帜，手指着旗帜上简单的标志，用中国话向听众大声讲他所悟解的圣道。听众的人数相当多，而且竟都能用法语的耳朵倾心聆听中国广东方言口音的中国话，并不断为胡若望加油打气。

胡若望首日布道出师大捷，大受鼓舞。自那一天后，他养成了带着他的锦旗和战鼓到圣保罗教堂去的习惯。大批听众的追捧，使胡若望相当高兴他能把自己的觉悟告诉那么多的人。几天以后，一边观望的傅圣泽神父却坐立不安起来。原因是政府为遏制潜在的煽动者鼓动民众在公共场所聚集闹事，曾对詹森教派[1]分子在公共场所结众狂欢下过禁令，卷入者可立即被捕并

---

① 詹森教派(Jansenism)，曾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仅有的分支，产生于新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对其采取高压政策，19 世纪后该教派消失。见 Barnes & Noble, New American Encyclopedia, Grolier Incorporated, 1991, p. 359。

被处以极刑。胡若望的这种行为比他不久前在公共场所的乞讨远远危险得多。况且傅圣泽在这些日子里正在凡尔赛，同有关人员商讨他的护照和书籍问题，此时此刻，他无法容忍任何关联到他的丑闻再次发生。因为一旦丑闻发生，马上会传遍整个巴黎，而巴黎现在已有很多人认识傅圣泽了，那是因为神父李涅热斯不断地招引大批趋新鲜赶时髦的人到耶稣会教堂来听傅圣泽的布道。考虑到上述诸如此类的事件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傅圣泽决定冷处理解决。他让白尼斯趁胡若望不在时，到他的房间里悄悄地把鼓和小旗拿走，一扔了之。

小旗和鼓突然不翼而飞，使得胡若望为之萎靡不振，再打不起精神想办法重做一套。

1723 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巴黎

胡若望又一次失踪不见了。持续一个多星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这一次他的出走与 11 月那次的走失不一样。那次他六神无主，在外乱闯了一天一夜，把房东也吓得够呛。而这次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就没人能猜出他会在这个巨大城市的哪个角落。最近的天气也极糟，连日来大雨滂沱，寒风刺骨。大家都知道胡若望身无分文，临走时他只拿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小包，没动房里的任何东西。

傅圣泽犹豫他是否应该再打扰警察中尉达介森。警察局的那批人为他的书籍一直没少出力，但结果却是他们越出力事情越糟。十一大箱书在 1 月底运到巴黎，并交到了达介森手上。但国务大臣杜布瓦却下令不能让傅圣泽把这批书带到罗马。很显然，这是那位国王图书馆馆员比哥农先生把傅圣泽早先的提议太当回事，要将这批书转到他的手中，并将其中的大部分留在

国王图书馆。由于傅圣泽所接触的人多是善于操作别人的人，傅圣泽此时还并不觉得比哥农在巧妙地使他就范，把他逼到下保证将他的全部藏书交给国王图书馆的地步。比哥农似乎还未把事情做绝，实际上他完全可以假装仁慈，一边回应傅圣泽“门槛精”的谩骂，一边把傅圣泽的书籍藏起来为自己将来所用，不过他没有那么做。

对于胡若望，比哥农似乎早就失去兴趣了。比哥农在与他的朋友福蒙特(Fourmont)教授的私人通信中称，他惟能在“证明并非完全不可用”胡若望后，才会雇用他。在写给福蒙特的信中，比哥农对傅圣泽的理论如此酷评：“世上万无此等荒唐之事”；涉及胡若望的使用与否则说：“于仆而言，若将束缚其缰绳松开，仆等尚能用胡若望。”当福蒙特对他们的计策实施显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时，比哥农则极力把他往前推：“仆不知兄为何踌躇未断，仆不信有欲阻碍仆等计划者。”比哥农正在筹划某些复杂的计策。这些计策与傅圣泽的计划一样严肃而且重要，但此计策却事关傅圣泽二十五年的呕心沥血之苦。

几天后，傅圣泽最终鼓起勇气，向达介森中尉通报了胡若望最近的失踪，达介森再一次向“射击手”巡逻队员发出了寻人通知。整整几个星期，队员们竭尽全力地搜寻着胡若望。在此期间，“射击手”巡逻队员们还有他们更重要的任务：他们必须护卫年轻的国王到杜伊勒里宫和卢浮宫(the Louvre)去——那里是国王对他臣民发表正式诰令的场所，队员们在那里要监看有时会倾城而出的上万的民众，由于这些民众的热情常随天气和气候而高涨不下，维持秩序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此外，队员们还要监视节日发射的烟火，避免它们落地时意外引燃其他物品而发生火灾，就像前一个月才发生过的一桩意外火灾一样。尽管为诸如此类的任务忙得不可开交，达介森仍表现出他是多

么认真地执行傅圣泽的寻人请求。他命令特别部门的稽查员路易·杜维尔(Louis Duval)去查胡若望的下落。因为除了杜维尔,不可能有别人能找到胡若望。杜维尔入队前是某公司的主管,时年四十三岁。调入特别部门前,杜维尔的任务是骑马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进行搜索。而此时的杜维尔掌管一个码头巡逻小队,该小队的特别任务是步行巡逻检查塞纳河沿岸的码头、城市各处的储备物资以及大仓库等。在巴黎,所有稽查员的行动都由警察局中尉支配和调遣。这些稽查员有他们自己内部收集的有关全巴黎的消息来源,无论是大众新闻还是小道消息,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稽查员们不但对城里的旅馆、公寓、供膳的宿舍了如指掌,对妓院和经手转卖的赃物也洞察分明。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躲过他们的耳目。

这些"射击手"巡逻队员和杜维尔在巴黎搜索并捕捉到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或是无家可归,或是放荡不羁,或是无所事事。譬如其中的一个是将胳膊藏在内衣、空甩袖子扮残缺的家伙,他因假装可怜沿街乞讨而在小圣安东尼教堂被捕;一个是现任"射击手"巡逻队队员,因在商店聚众闹事被带走;一个是撑着木制假腿沿街要饭的失业裁缝师;另一个是深夜在大街上走迷路的某学校教务长,教务长三十九岁,来自第戎(Dijon)地区;还有一个竟然是拿刀把一匹马的大腿捅个窟窿的十一岁小淘气蛋。巡逻队员甚至还真发现了一个神经病,名叫龟勒斯·来闹儿(Gilles Lenoir),时年二十五岁,原籍布列塔尼(Brittany)。此人曾被关入医院,后被放出。颇为可惜的是,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巡逻队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胡若望行踪的蛛丝马迹。

独闯奥尔良

第七章

1723年2月20日，星期六，奥尔良，耶稣会住宅大院

神父勒欧那德·哥瑞曼给让-巴普泰斯特·杜哈尔德神父发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神父，上帝的安宁将伴随着您。由于在下对神父傅圣泽是否已离开法国去罗马一事无从所知，并且由于杜泰尔神父(Father du Teil)告诉在下神父奥瑞目前不在巴黎，尊敬的神父您一定会原谅在下贸然呈信，报告余等在此发现的某人之困境，而此人对有兴趣去中国传教的同仁有关。

“昨日傍晚七时，余等惊异地在大门石阶处发现尊敬的神父傅圣泽带到巴黎来的那中国人。其样凄惨，余等怜之而将其收留。但余等又实为此事而日渐困惑。此中国人何以独自走出巴黎，日后又将去何处，余等对此丝毫不得要领。盖因其语言、手势均不为余等所能领悟。此人亦无任何书信释其出走而到此地之原因。况且此人意志坚贞，定会在不经意时逃逸而去。又因其口中常诵‘中国’、‘北京’、‘罗马’及‘教皇’等词，余私下窃想，此人欲去罗马，并从罗马回中国。

“倘若尊敬的神父傅圣泽仍在巴黎，恳请台端请傅圣泽神父速将其意图告知在下，并送一书信至此地，如其以前曾送函至余一般。书函应以中文书写，但以法语字母标音，并附上法语翻译，还需惠示该如何向那可怜的中国人解说。

“如神父傅圣泽已离开巴黎，请速速幸示在下应如何处置此事，或可幸告在下之同事奥瑞神父。接台端回函前，在下当照料此失意之人，但在下亦担心此人仍会乘隙出走。除非此人后悔

其所作所为，而失再走之意。

“接信后恳请迅即幸复，在下惟倚靠惠示尚能行事也。此间在下将忠实地等候尊敬的神父幸示。谨颂，您最谦诚的哥瑞曼敬笔。”

1723年2月24日，星期三，奥尔良

困在奥尔良的胡若望一度想回巴黎。当他打点好随身行李，背着个包袱往大门外走时，主管大院居住事务的主任、神父瓦埃恩(Viane)恰巧碰见了他，把他叫住并让他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此后，胡若望不再将他的随身物品打包，并以手势及各种肢体动作极力表示他将会忍耐。但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个没保证的许诺，因为大院里没一处可以上锁，他完全可以再试着跑掉。

神父哥瑞曼所要求的、用中文和法文写的信从傅圣泽那儿寄来了。事与愿违，那封信反而更引起胡若望的焦急不安。信是哥瑞曼大声地念给胡若望听的，虽然神父根本不懂信中那些字母合成的每个单字字义。傅圣泽在信中说，他将不久启程去罗马。显然，胡若望相当害怕傅圣泽计划单独去罗马而不带上他。

巴黎那边，傅圣泽通知警察达介森中尉说胡若望已在奥尔良找到，巴黎警方搜寻胡若望的指令自然也就撤销了。但傅圣泽在信中并没有对哥瑞曼神父等人留下确切的指示，要他们今后如何具体处理胡若望的去向。傅圣泽说他正在试图为胡若望寻找一个可替代的寄宿处。因为傅圣泽感到白尼斯一家经受了太多他们不该经受的遭遇，尽管那一家人忠诚地要将胡若望接

回去。

1723年2月25日，星期四，奥尔良

现在奥尔良耶稣会大院里的人要想同胡若望交谈，已不须再打哑语，也不须以各种夸张的形体动作试图表示某种意义。也许是神的眷顾(Divine Providence)，一个惊人的巧合出现了：这里的教士竟然发现了一个懂中文的翻译！这个翻译是城里一个生意兴隆的食品商，原籍布卢瓦(Blois)，现住在奥尔良。这个食品商曾是康熙皇帝时代罗马天主教廷派到中国的特使马亚尔·德·铎罗红衣主教(Cardinal Maillard de Tournon)的私人厨师。他在1705年离开法国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和澳门住了三年，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胡若望见到有个竟能同他用中文讲话的法国人，显得相当吃惊，兴奋地叫道："你一定是从我的国家来的。"

胡若望又可以说中国话，并可以倾诉他的抱怨了。他说他已经为傅圣泽服务了四年，每年应得十两银子，至今却一文未获。他又说，他到欧洲来，本以为可尽快到巴黎和罗马，然后再回中国，等等等等。读者明鉴，这位胡公说他已为傅圣泽服务了四年，那只是他自己的臆断，事实上，胡若望与傅圣泽在一起总共才十四个月而已。胡若望让自己相信他已为傅圣泽工作了四年，那是因为他与傅圣泽的五年期限契约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如果胡若望认定自己已工作了四年，那么他只需再工作一年。如此一来，胡若望就可在自己的脑海中着手计划从罗马回中国的事了。另一方面，也许谨慎的本分使得胡若望说他被承诺每年获得十两银子的俸禄，而契约上实际规定的是二十两银子。对敌人，一个人不应将自己的个案着力太深。

在随后寄来的信中，傅圣泽对今后怎样安排胡若望仍是含糊一笔带过。傅圣泽还不知道神父哥瑞曼在奥尔良找到了个翻译，要是他知道了还不知该怎么想呢！傅圣泽新寄来的信仍然两份，一份是以法语字母表音的汉文，另一份是法语译文。哥瑞曼也仍照前例，将傅圣泽的信大声地念了一遍。这封信里处处都是数落胡若望的词句。傅圣泽不仅责备胡若望行为相当不检点，而且还声明，如果胡若望不再改变他的行为举止，傅圣泽将与他脱离一切关系。一旁站着的胡若望听到这里，怒火填膺，猛然一个箭步冲到神父哥瑞曼面前，出其不意地将信从惊立在那儿的神父手中一把拽下，在周围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三下两下就把它撕得粉碎。胡若望的动作被视为无礼的傲慢，激怒了哥瑞曼的仆人，胡若望因此结结实实地挨了几个大嘴巴。但这封信也就这么永远地消失了。

1723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奥尔良

下面是哥瑞曼给傅圣泽的信。

“迄今为止，仆已尽一切努力使这中国人能在此地多加忍耐数日，但仆实在难以再使其应允继续在此地暂栖。虽此，仆仍会尽力而为，以方便台端并希望台端因此而欢愉。七、八日前，此中国人开始陷于忧郁症，且不能自拔。此状实令仆惧之。昨日此中国人携其包裹步出大院，恰遇此地某神父，因而将其追回。

“此地恰有一通译，日前仆曾差人召其前来，但通译不巧出城办事，夜晚方归。今晨八时通译至寒舍，仆令其与台端之中国人交谈。仅仆所知，胡氏急欲归巴黎台端处。仆极尽诸愚策，欲使胡氏再在此地停留五、六日，并答应胡氏，仆将迅速致信台端，

乞台端允其返回贵府。倘若仆在五、六日间不得台端幸复，鉴于仆业已应允胡氏离开此地之乞，届时其必定行之。

“仆谨以朋友间私秘作保证，望台端拨冗速示惠策。仆将证明台端信任仆，并证明台端之正确英断。

哥瑞曼敬上”

1723年3月12星期五，奥尔良

胡若望出现在奥尔良的教堂，他又回教堂做礼拜了。他去的这个教堂壮丽辉煌，与奥尔良耶稣教会大院毗邻，教堂里面挂着几幅巨大的油画，画面显示的是天宇四际，画中的上帝则在天国的荣光之上。教堂内四周的墙上还装饰着一些祈祷用物品。胡若望做礼拜时有时很温顺，脱帽并将两手规矩地放在身侧，但有时在教堂内坚持不肯将帽子从头上摘下，并强调他这个举动与在中国朝见皇帝时的规矩一样，表示最高的敬意。

某天夜晚，耶稣会学院某教师望见胡若望独自一人站在院中花园内，双手朝天，对着天上的月亮，久久伫立不动。

傅圣泽给神父哥瑞曼接连发了几封信，要求哥瑞曼通过翻译将他的信转交给胡若望。在那些信件中，傅圣泽极力要使胡若望明白擅自逃离巴黎是毫无道理的。在最后的一封信中，傅圣泽建议胡若望写一封正式悔改信给他，改悔信中还须有胡若望要求原谅错误的内容。

通过那位翻译，哥瑞曼将傅圣泽的要求转告给了胡若望。胡若望回答说他永远不会写那种信给傅圣泽，因为他自己根本就没错。他流着泪又说，他甚至情愿自己的双手被剁掉也不愿写那种信给傅圣泽。

1723年3月16星期二，奥尔良

胡若望最终还是离开了奥尔良。他在清晨两点被送上了去巴黎的公共马车。车票费为6法郎，此外，哥瑞曼还另外给了车夫2法郎和一些5角铜币，以望车夫在途中能确保胡若望不挨饿，并安全地将他送到巴黎的梅森宣教院。傅圣泽已在该宣教院为胡若望准备好了住宿。

尽管胡若望口口声声嚷着要回巴黎，尽管胡若望庆幸回巴黎的指示最后还是从傅圣泽那儿发出而兴高采烈，可是当他听说他必须在清晨两点离开时，又要起小性子来。他说他不想夜半离去，而愿意在白天；他不愿坐马车离去，而喜步行；给车夫的钱可给他，以便他确保自己旅途中不会挨饿。为人和气的哥瑞曼神父这次按捺不住，一股火直冲脑门。他对着胡若望，提高嗓音说座位已定好，车票钱也付出，不可能再有改变。如胡若望拒绝坐马车走，那胡若望将会从床上被扔到大街，被扔出耶稣会大院。胡若望见此，不再闹别扭。告别餐结束后，胡若望由翻译和哥瑞曼的侍仆陪同，去公共马车车站附近的小旅馆，在马车到站前暂歇片刻。

离开大院前，胡若望通过翻译彬彬有礼地向哥瑞曼表示衷心的感谢。哥瑞曼则向傅圣泽送出了一张16法郎又五个5角铜币的账单。这些钱是垫付胡若望两次坐车从奥尔良到巴黎的车票钱，除此次外，还有一次是用于去年11月的。哥瑞曼说奥尔良的神父们将支付胡若望在该地与他们一起居住期间的伙食和居住费用。除此之外，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没人会负担胡若望从巴黎到奥尔良旅途的费用，胡若望须自掏腰包为他自己的旅行支出负责。

通向沙榔东

第八章

1723年3月28日，星期日，巴黎

胡若望现住在圣路易教堂中。这教堂有二层高，紧靠着梅森宣教院。胡若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小房间，位于教堂内中央回廊的外侧拐角处。白天，光线从大圆顶的天窗射进教堂，不但将大厅里大理石雕像和木制雕刻品照得栩栩如生，还使四幅巨大的、有关该教会庇护圣徒故事的油画也显得分外动人。到了晚上，精巧地做出优美姿势的雕像和安琪儿则在黑森寒冷的夜幕中变得扭曲起来。胡若望的房间里有张床、一个柳条椅和一个小桌。房里仅有的一扇窗被胡若望一直开着，为的是与外部的世界相连。与白尼斯家相比，无论在房间的宽敞还是舒适方面，胡若望目前的住房条件相差甚远，不过胡若望却做出相当满足的样子。

胡若望能住进此教堂，是梅森宣教院修道院院长、盖拉德神父(Father Gaillard)在傅圣泽的请求下点头同意的。盖拉德时年八十一岁，也是梅森宣教院的直接上司。但盖拉德神父只给了傅圣泽几个星期的许可，因为几星期后他俩将离开巴黎去罗马。

傅圣泽又一次提笔给国王图书馆馆员比哥农写信。但此次他不再有焦躁感，也不再向这位图书馆馆员推心置腹地倾吐心事。巴黎警察署的达介森中尉在受压后，同意先交出部分傅圣泽的书籍给罗马天主教廷驻巴黎大使，那些书将在大使的安排下由水路运到罗马。其他的书籍也将随后托运到罗马。时来运转，此时此刻的傅圣泽可谓自信满怀，他不但拒绝接受任何比哥农先前提出的、帮助海关清点大木条箱中书籍的要求，甚至竟大言不惭地要求比哥农，将自己和布热特施先生一起在南京为法

国国王图书馆购买的、在七个大木条箱中的部分书籍借给他使用些日子。傅圣泽特别想到沉睡在那七个大木箱中的二十卷书籍中的某一套书。那是一套有关明朝礼仪的全集。他打算在罗马停留期间将这套全集作为他研究中国经典的参考书。

回到巴黎的胡若望又开始擅自逛起街来。他每日一早必定带着傅圣泽给他的当日饭钱出门，信步而游。胡若望用这些钱买他所喜之物，并在随意之处购食充饥。他做姿势摆动作、装小丑唱异曲，不几日就成了马赖（Marais）一带家喻户晓的受欢迎人物。实际上，他的名声有可能传得还更远。胡若望此时就像进入了个狂欢世界，巴黎的春季庙会好像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社会治安条例在此时好像都会网开一面。胡若望到哪里，哪里就是个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世界。这个畸形的、有异国情调的、乱七八糟的人物招来一大批群众，他们大声为他叫好，并以笑声为他捧场。

此时的胡若望春风得意，满脸喜色。自从离开路易港市后，他从未再誊写过一个字，也不再提起他要写的旅游记。对傅圣泽要胡若望安定下来后开始着手誊写中国经典的要求，胡若望也断然拒绝。傅圣泽告诫他，如他拒绝工作，将一个铜板也得不到。对于傅圣泽的告诫，胡若望只耸了耸肩算作回答。当傅圣泽找出他们在广东订的工作契约，对着胡若望挥舞并质问时，胡若望甚至企图将它从傅圣泽的手中抓下。

1723年4月8日，星期四，巴黎

时至今日，去罗马的事已万事俱备，只待启程动身了。去罗马的出国旅行护照已由国务大臣杜布瓦签署发下，罗马天主教廷驻巴黎大使也为促成此事而全力以赴。另一方面，警察中尉

达介森对留下的书籍礼貌有加，比哥农也宽宏大量，对傅圣泽不再有怨言。傅圣泽的第一捆书籍，在早些日子前已交到罗马天主教廷驻巴黎大使的手上，并由其负责先托运到马赛，现正等着装船运至罗马。另一方面，耶稣会上层反对傅圣泽去罗马的声音也逐渐消失，现在惟一可能出麻烦的是胡若望目前的居住问题。由于胡若望在大街上闹腾的小报告频频传入神父盖拉德的耳朵，院长下令胡若望即刻搬出他的小屋，并禁止胡若望今后再回到梅森宣教院。好在傅圣泽得知后向神父祈求慈悲成功，胡若望被允许再使用该小屋两到三天，因为两三天后傅圣泽和胡若望将异地而去。

傅圣泽定了两张 4 月 12 日离开巴黎去里昂的公共马车票，并预付了车费。订完票后，他急急忙忙去找胡若望，要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1723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巴黎

胡若望不想去罗马！

这不啻是个晴天霹雳。而这又确确实实是胡若望在星期四亲口对傅圣泽说的。几天来，不论傅圣泽怎么做工作，胡若望显得毫不动摇，丝毫不变其初衷。一开始傅圣泽并未很认真，还想戏弄一下胡若望，就揶揄地对他说："教皇已下旨召见我了。"仔细观察着胡若望的脸部表情变化，傅圣泽又接着说："教皇也传旨要召见你。"傅圣泽并稍稍地怀些私心补充道："到了罗马后你将不愁任何匮缺，那里的人将尽一切努力使你愉快。"见胡若望不为所动，傅圣泽企图稍稍吓唬胡若望一下："若你不与我一起走，我离开巴黎后谁会照管你?"胡若望只是眉头紧皱，一声不吱。

傅圣泽见胡若望果真严肃，且其不去罗马意志坚强，毫无转念余地，不得已派了个信差去告诉罗马天主教廷驻巴黎大使这一新的变数。大使派了他的监督官马克·卡第那力(Marc Cardinali)到胡若望的住处去探望他，并让傅圣泽当翻译。谈话后，卡第那力也发现胡若望拒去罗马的意志坚定，毫不动摇。

此后的几天，胡若望除了在早晨暂离教堂片刻，出外买面包之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那间小房间里。这是因为胡若望相信有人曾经告诉过他、或者是他自己这么理解别人所说的这么一句话：傅圣泽是个谋杀者。胡若望似乎认为这消息来自耶稣会修道院长盖拉德神父，但只有上帝才知道胡若望是从哪得来的这种无稽之谈。不仅如此，胡若望似乎还认为他自己也卷入了傅圣泽的杀人罪孽中，尽管那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为此，胡若望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不安之中。他整天躺在床上，眼瞪着天花板，却想不出任何一个合理的装病借口以躲开与傅圣泽同行。他想把门拴上，门上既没有闩也没有锁。当傅圣泽或其他人进屋来，规劝他去罗马时，胡若望只顾将头蒙在被褥里，一言不发。

1723年4月11日，星期日，巴黎

晚饭后不少人挤进了胡若望栖身所在的教堂内小卧室，另一些人则围在门口。其中有傅圣泽，有白尼斯，有罗马天主教廷大使的监督官马克·卡第那力，有两个耶稣会教士，还有一些其他来看热闹的人。白尼斯被叫到这里是因为他熟知对付胡若望之道，两个耶稣会教士则是受命于修道院院长盖拉德神父的吩咐，为了将胡若望赶出这个小房间而挤进来的。一开始，傅圣泽先以理相劝，不一会，他的嗓音随着火气一点点大起来。胡若望不甘示弱，也大声回应，以自己的吓唬声回应威胁。

天渐渐黑了下来，上车的时间将在午夜之后的凌晨四点。众人决定将胡若望先带到萨恩斯旅馆（The Hôtel de Sens）附近的小客栈去。小客栈背靠蓬玛丽河（the Pont Marie），其前方有一大片开阔地，公共马车将从该处出发。一行人架起胡若望，一边将他紧紧握成双拳的两手硬行掰开，一边将他从狭窄的楼梯上往下拖。胡若望脸暴青筋，怒不可遏，拼命反抗并竭力狂喊。众人也不停手脚，一气将胡若望抬到教堂外，并顺着漆黑的街路向小客栈挣扎走去。小客栈离梅森宣教院不远，仅百余步。在这个名为圣凯瑟林的小客栈（St. Catherine's Inn）内，傅圣泽已经预先为胡若望租下了一个单人小房间，为期一夜。胡若望被拖拉到这个小客栈后，便被锁在屋子里，但他的简单晚餐并未被漏掉，傅圣泽请人作了准备。

傅圣泽只身回到了他在梅森宣教院的房间，他将在第二天永远地离开那个地方。弯腰落座后，他定了定神，然后摸了支笔开始写起信来。收信人是巴黎警察局中尉达介森。内容如下：

“达介森先生钧鉴：

“因神的眷顾，敝人目前处境艰难。鉴此，请容敝人再次斗胆拜乞贵局与钧座幸助，一如敝人先前数次所乞。敝人亦藉此对先前数次鼎诚惠助，由衷地谨表真诚之谢意。

“敝人将于明日动身乘里昂驿车去罗马。因诸多事由，敝人无法将此次行程延期。敝人曾一直倚靠敝人所携来此地之中国人，且该中国人情况敝人亦曾获许向钧座禀报。但该中国人近来精神错乱，委实令人难以相信。现该中国人又拒绝与敝人共去罗马，而罗马之行却是其毕生所思。敝人与该中国人初次乘船渡洋时，其曾曰去罗马实为其渡洋目的之一。非仅如此，其还切望从陆路自力步行归回中国。前不久，该中国人即开始实施

此项计划。当其走至奥尔良时，天寒地冻，其又身无分文。最后是敝人筹措将该中国人送上驿车带回巴黎。

“归巴黎后，其愚行日见增生，毫无减退之迹象。其初抵本地时，一日忽曰天使现身其面前，并曰天使力促其建创伟大功业，但其却无法言清详细。日后其再次言此。敝人无意在此将其之荒谬之举动逐一细数，但诸此之类，以一言而蔽之，其荒谬愚蠢之举发展至今日，已绝非为偶发事件，而为家常便饭之陋习。其蠢行，恶意狠毒与其顽固不化并行。祷告，恐吓，或宽仁对其均无效用。

“敝人今知无力迫其同赴罗马，必留其独处此地。故敝人需通报钧座此中国人之本质。钧座明鉴，若不将此不幸之人监禁并送至此类人物应去之处，其未来将不堪所想。若任其在外，其将以乞讨为生，先遍行巴黎，而后恐将行乞全王国，生出无穷无尽之麻烦。为此，钧座实应防以未然矣。

“敝人一直切盼此中国人改此愚行，故之前未能将实情相告。在此，谨乞钧座拨冗录下敝人之述，下令拘捕此卑鄙小人。一俟拘捕，因其无机再恣纵，但愿其将返回本貌。敝人全权授予钧座许可处治该中国人。谨此再次恳请幸助，并不胜感激。

“谨以敝人之荣誉担保。

谨致

最尊敬的钧座

傅圣泽

1723年4月11日，巴黎”

信写完后，傅圣泽一头钻进他的行李堆，整理行李去了。除了他到巴黎后才收到的那些书，他还有许多衣物尚未整理和收拾。这些衣物与那十一个大木箱中的书一起，才会为傅圣泽造

就一个真正的、堂堂一流的研究文库。

1723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巴黎

尽管时间还未到凌晨四点，一小群人已聚在一起。他们是来为神父傅圣泽送行的。白尼斯又一次出现在此。人群中还有个姓史密斯的英国人。史密斯也是个天主教徒，二十年前，当傅圣泽在拉·福来士耶稣会神学院执教时，史密斯还是他数学班的学生。史密斯当晚还把他的孩子都带到这里给傅圣泽送行。不过一行中并不见罗马天主教廷驻巴黎大使的监督官马克·卡第那力的踪影，虽然他说过他会来送行。

傅圣泽再一次走进了胡若望的房间，打算最后一次以理说服他坐上公共马车，与傅圣泽同去罗马。胡若望仍在盛怒之中，丝毫不为所动。很明显，胡若望是不会走的。

驿车整装待发，傅圣泽的行李已被装上了车。此刻胡若望若回心转意，同意登车与傅圣泽同行的话，那他傅圣泽将会把写给达介森中尉的信丢掉。但形势没有任何转机。与助手将在此地永别的傅圣泽，在登车之前终于下决心将此信送出。由于那位原定揽下此差事的、有条不紊的卡第那力还未到场，傅圣泽就把信托交给了白尼斯。在一时的冲动下，傅圣泽还给了白尼斯 100 法郎，让他用这笔费用照顾胡若望的生活。傅圣泽的这 100 法郎是从罗马天主教廷驻巴黎大使给他用于去罗马旅行使用的 1 000法郎中抽出的。收下这 100 法郎，这位英国人白尼斯立即在等待出发的马车旁，匆匆找了张纸用法语写下收据。龙飞凤舞的字体中，还夹着几个错别字。

傅圣泽上了车，车门随后关上并上了锁。前面的马夫扬起鞭子大声吆喝着，命马抬腿上路。伴着沉闷的车轮声，这辆大马

车向里昂驰去。里昂有去斯特拉斯堡或去罗马的公共马车，去罗马的旅客须在那里转车。

在这辆马车上，或许是在属于最便宜座位的那个角落——通常在远离门和窗的车后部，有一个票已出售了的座位白白地空在那里。

1723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巴黎

今天，白尼斯和卡第那力到小客栈接走了胡若望。白尼斯租了一辆马车，卡第那力则骑在马背上。白尼斯另外还叫了个朋友，以防万一冲突时人手不够。

从星期天晚上算起，胡若望被关在圣凯瑟林小客栈里已四天多，其间有些时候他是被粗麻绳绑着的。说服胡若望的代价也是不小的，其中包括两次派人到胡若望的房间与他交涉。此外，白尼斯和卡第那力还花费了远远超出预算的费用，劝客栈看守人往胡若望嘴里喂食和支付胡若望的住宿费。话说回来，胡若望本人看上去倒并不想逃跑。

把胡若望送进精神病收容院所需的文件在四天后才办完。送胡若望进精神病收容院的决定是傅圣泽和罗马天主教廷大使两人共同制定的。他们认为胡若望要是拒绝去罗马，剩下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去精神病院。如果胡若望在精神病院的状况有好转，然后可将他送到任何一艘去中国的法国东印度公司船上，让其回国。

马克·卡第那力是在清晨五点遇到白尼斯的，当时傅圣泽的车才刚出发。卡第那力狼狈不堪地赶来，并为迟到而遗憾不已。原因出在他那个睡得过于舒坦而忘了及时叫醒他的仆人。八点之前，白尼斯和卡第那力一起来到了警察署达介森中尉的

办公室，准备当面将傅圣泽的信交给中尉并寻求官方帮助。不巧得很，中尉那天正在凡尔赛宫，与年轻的国王和国务大臣红衣主教杜布瓦举行例行的照会，中尉办公室的其他职员让白尼斯和卡第那力下星期三再到该办公室找中尉。

没人愿等那么长的时间。罗马天主教廷大使马塞易这次派出了他的随身助手、稽查员若塔(Rota)先生直接去凡尔赛交涉。若塔在星期二见到了国务大臣杜布瓦。经过协商，他得到了一纸送院“封印公文”(lettre de cachet)。就凭那张纸，他们可以将胡若望押送到沙榔东的精神病收容院。仅仅那样的一张由当权者发出的简函，竟能将一个独立的个体——人，不经任何审讯，扔出社会之外，并整整好几年！此信由国务大臣以国王的名义颁发，下传给警察中尉以具体执行。不过也许杜布瓦当时未把“封印公文”直接交给还在凡尔赛的达介森中尉，而是先交给了巴黎警察署的官员。另一方面，白尼斯和卡第那力并未取消他们将在星期三晚面见达介森中尉的约定，现在他们可以催促中尉尽早实施这封“封印公文”的命令。达介森答应他们将查看最后的落实情况，并嘱咐两人次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时再返回找他。当两人第二天按时再到警察署时，达介森交给两人一份国务大臣签发的拘押令副本和一封给兄弟慈善会(the Brothers of Charity)会长的信。该会长掌管沙榔东的收容院。达介森还告诉两人，皇家财政部将负责胡若望住院的所有费用。

从警察署出来后，白尼斯和卡第那力两人先到圣凯瑟林小客栈，将胡若望的住宿费用等一并结清，然后各自带着鞭子直奔胡若望的房间。由于他俩都无法与胡若望讲清他们将要做的，因此惟有一途，就是用鞭子把胡若望赶出房间。在外等着的马车、闪亮的灯、两人脸上的表情、挥舞的鞭子，使胡若望知道此次来者不善，恐惧感顿生。出于自卫，胡若望伸出手指朝卡第那力

的脸上乱挥，卡第那力往后一跳，但胡若望顺手抓住了他的衬衫，卡第那力使劲一挣，衬衫哗啦一声，前后分家。白尼斯此时则抡起鞭子猛力抽打胡若望，脱出身来的卡第那力也奋力甩动着撕破的袖子，不甘落后。在白尼斯那个朋友的帮忙下，三人随后将打趴下的胡若望硬拽到了马车上。但胡若望又从马车上一滚而下，躺在地上，以防他们再将他拽上马车。街上看热闹的巴黎市民开始多了起来。尽管那些懒惰的家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上去他们对胡若望倒是同情有加。于是，白尼斯和他的那位朋友再次将胡若望从地上使劲拉起，塞进马车，两人也随即一并挤了进去。与此同时，车边的卡第那力强行把看热闹的群众往后推。而后，三人合力将一副手铐铐在胡若望的手腕上，并将手铐锁定。

马车终于启程。卡第那力独自骑在马上，策马走在车旁算是护驾。从圣凯瑟林小客栈到圣安东尼港(the Porte St. Antoine)有两条近道，这两条道都始于沙榔东。一条通过梅森宣教院和有着硕大的穹隆的耶稣会圣路易教堂；另一条则通过有三个畸形尖塔的、名为圣保罗的地方教区教堂。在奔驰的马车车窗后，有一张脸时隐时现。这张脸的下巴搁在被手铐铐住的手上，头被绑着动弹不得，脸上的两只眼睛只能见到随着马车轮子跳动而一左一右拍打着脸的双手。

身陷精神病院

第九章

1723年5月6日,星期四,沙榔东

沙榔东收容院有四幢主楼,每幢楼里都有数间禁锢精神病人的小牢房。四幢主楼都朝向一个不对称的中心交叉点,它们都是三层建筑,第三层上面都还有一层阁楼,屋顶是双重斜坡式的。每幢楼的内部造型也都一样,每一层的中央是走廊,走廊两侧是一字排开的小牢房。

这四幢楼的右侧尽头都有一条走道,通向兄弟慈善会餐厅。到了餐厅,可以看到餐厅的上面一层是个宽大雅致的客厅,用来招待贵宾和举行正式会议。客厅上方,也就是最顶层,是为患者们准备的小礼拜堂,患者们可利用楼里不同的楼梯到该礼拜堂。兄弟慈善会的兄弟们还可在餐厅内,顺着厨房上方的走廊,一直走到建筑物外面的一座小桥。穿过这座小桥,然后再越过与小桥毗邻的小天井,有个20英亩大的漂亮花园和一个家庭农场就会映入眼帘。这里描述的仅仅是沙榔东优美的自然景色之一。沙榔东这地方不仅有胡桃树,有绿树成阴的大道,有大道边优美的人行道,还有菜园和葡萄园,长年供医院所需。再往前走,就是大片的公共草地、林地和优美的皇家凡尔赛城堡。花园的西侧尽头是医院的公共墓地。花园确实漂亮,但禁止患者入内,虽然花园四周的墙都很矮,足可轻易跃过。

花园位于一块凸地上,大约有6英尺高,四周是平地。花园三面被田野怀抱,另一面是个断崖,陡峭险峻,直插河岸,其下面是横着的马恩河(the river Marne)。断崖上方,就是医院为精神病患者盖的宿舍楼。为防止泥土下滑,断崖下面用石块垒起,以撑住后面的泥土。由于石块垒起的墙比宿舍的屋顶还高出几码,可以看到餐厅和宿舍楼把这面石墙当作自然屏障,将它们的

后墙贴在石墙的右角一侧。各个建筑物的东西墙还互相连接，后墙则背向马恩河。因此，这一面简单的高墙，形成了两个无出口的天井。

这两个天井终年不见阳光，是因为其面积不大且周围的建筑物又太高。由于风也刮不进去，天井内一年四季充满着医院下水和人类排泄物的刺鼻臭味。兄弟慈善会曾多次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过此事——会员总共才十人，他们经常使用黑白小石块以秘密投票来决定医院的事务——但这些兄弟们对如何解决后院天井的臭味问题始终是束手无策。虽然他们也曾考虑过或者建造几个有效的公共厕所，或者将一些主要的设施移走，譬如将诊疗所以及他们自己的寓所远远搬离这块臭味扑鼻之地等。但从未有任何一种方案被具体实施过。

今天，胡若望躺在这个天井中自己的床垫上。是院长命人把他抬到外面的。因为自 4 月 15 日白尼斯和卡第那力将他送至沙榔东后，他绝少离床。院长相信些许空气——尽管是这种刺鼻的空气——将对胡若望的健康有益。床垫上的胡若望这时如果坐起来，他可看到茫茫在上的苍天。

1723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罗马

傅圣泽到了罗马，虽然途中偶患微恙，总还算是一路平安。在通往里昂的路上，他还顺路到阿瓦隆（Avallon）他姐夫的庄园去看望了一下他的姐姐。那庄园在约讷河（Yonne）和瑟兰河（Serein）之间。离开里昂后，驿马车载着他穿过阿尔卑斯山脉，越过都灵和米兰，最后在 6 月 14 日抵达罗马。

傅圣泽在 6 月 8 日，几乎是一到罗马，立即就收到了谒见教皇的请柬。请柬是由教皇英诺森十三世（the Pope Innocent XIII）

发出的。他们在一起谈了大约两小时有关中国和礼仪祭典方面的问题。那时刻令傅圣泽欢欣鼓舞，终身难忘。尤其是教皇前不久还重病缠身。

来到罗马后，傅圣泽并未投宿于耶稣会会馆，尽管耶稣会在罗马的会馆相当大而且条件又好。傅圣泽在教皇亲自的安排下，被邀请住在属于天主教圣公会神学院的一个大公寓里。到了罗马后的傅圣泽，除了教皇外还见到了圣公会总会长赛可派恩红衣主教（Cardinal Sacripante）和秘书卡拉法（Caraffa）。由于这两人掌管所有的对外传教活动，所以他俩不但是广州那位胡若望的原始雇主、潘如神父的最高领导，也是现已离开半个世界的胡若望的最上级领导。

不论怎么说，傅圣泽并没有彻底将胡若望忘记干净。从白尼斯和卡第那力处寄来的几封信都说胡若望正被适当地照料着。不过这些消息还没使傅圣泽放心。当白尼斯把胡若望与那封拘捕函提交给沙榔东收容院院长时，白尼斯向院长保证，国王将通过达介森中尉或国务大臣杜布瓦，支付胡若望在该院期间的住院费。但事实上，自从胡若望住进该收容院后，院方从没收到过一个铜板。卡第那力的信中还提到该院长说他不会将胡若望再留在该院，除非立即交出钱款。但是胡若望的住院费用至今尚无着落。现在，在罗马的傅圣泽与赛可派恩和卡拉法意想不到的接触，对傅圣泽可能是个机会难得的天助。傅圣泽现在可通过他俩，直接同专门调停特殊问题、包括中国传教问题的红衣主教们联系。那些红衣主教都是由教皇任命才担任此类职务的。毫无疑问，胡若望的事情当属中国问题之内。傅圣泽开始向这些红衣主教们起草一份有关“一个书写名称为若望胡的中国人”的上诉书，这次他以意大利语拼写胡若望的名字。

傅圣泽现在还没有给胡若望写信，因他要办的事实在太多。

这些要办的事是：1)须将他脑海中所有有关中国礼仪祭典的想法，以及有关中国人是否生来就迷信的论题整理成文，然后交给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细审；2)须小心翼翼地准备一份报告，记述他与其他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不论有直接接触的还是无直接接触的，其中包括1721年春教皇特使嘉乐访华时他与特使的关系；3)须将他的观点向红衣主教特别调查委员会作一次报告；此外，4)傅圣泽还须将他有关早期中国文字和中国经典著作的解释整理成文并分类，以显示出那些通往一个真正宗教的隐蔽代码。傅圣泽私下思量，以他目前所拥有的书籍，他还无法成稿。为此，他傅圣泽还有最后一个企图，这个企图也许是受比哥农启发的，就是把那些他在巴黎被没收充公的书籍要回来。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为此一直向法国国务大臣红衣主教杜布瓦施加压力。那些书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被运送到罗马。如此一来，傅圣泽将再次把他个人图书馆的大部分书籍聚在一处。尽管他还有另外一千二百册书籍滞留在北京，还不算他那些被迫留在广州的书籍。

美中不足的是，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傅圣泽同法国国王私人忏悔神父李涅热斯的关系有了新变化。他开始厌倦同法国国王私人忏悔神父李涅热斯逐渐升温的、不愉快甚至恼怒的通信。当初傅圣泽的中文书籍遇到麻烦时，神父李涅热斯曾极热忱地帮过忙。但现在李涅热斯神父发现傅圣泽的观点听来刺耳，傅圣泽的个人举止鲁莽，对过去的耶稣会同事们在礼仪祭典方面的议论指责过度。在6月29日给傅圣泽的信中，李涅热斯这么写道："余实惑之，较之学些许汉语，台端应更能有所为。为学汉语而费工时不如钻研圣洁之科学"。

"惠函与台端为人不甚相配"，傅圣泽在回信中这么写道。他必须坦言指出耶稣会教士应对教皇彻底服从和忠诚，而不是

对任何其他人。傅圣泽接着指出,他傅圣泽自己在过去所有的重大关头,都坚定不移地遵守着这一点。无论是命他离开北京而事先未有一纸通知,以至毁了他那一段的学习时间并丢失了大量的书籍,还是在五十七岁时颠簸在暴风骇浪的海洋上,他傅圣泽都毫无怨言。因此,法王私人忏悔神父的指责是不妥当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傅圣泽用华丽的词藻和出其不意的抨击来作为这封回信的结尾:"敝人谨愿此函能悦于台端,诚然台端确凿无误的诚意与率直并无助敝人获益,诚如台端多次所述。"

除此之外,还有件值得恭贺的事情需要提一下。似乎是傅圣泽时来运转,他在罗马偶然遇到了另一个中国人。那是个受过很好教育的、儒雅有礼的年轻人。那年轻人被送到罗马来学习,以培养成神父。年轻人非常乐意帮助傅圣泽解读他所需知的中文经典。此后,对傅圣泽来讲,胡若望的存在已并非不可少,因此也就很自然地,胡若望被甩出他的圈子去了。

1723年10月21日,星期四,沙榔东

钱的问题又使傅圣泽日益焦躁不安起来。如果无法将现金付给沙榔东的兄弟慈善会,胡若望势必遇到麻烦。而问题实际上并不出自兄弟慈善会,因为兄弟慈善会会员们并不是贪婪的人,他们远远不是这种人。兄弟会成员奉献出他们的生命年华来照顾年老病残者和心理失常者。问题出在上帝圣若望教会(St. John of God)。该教会开始期望沙榔东收容院的运营能扭亏转盈。盈利的钱将回馈到作此决定的中央办公厅,该办公厅为了各种目的和企图,要向沙榔东收容院每年征收3 000法郎的"税金"。否则,沙榔东收容院将必须继续以捐赠物和捐款给贫困家庭的名目向社会募捐,并以此来维持收容院的日常运营。

但如果那样做的话，将有可能使收入逆差加大，甚至可能出现不得不关闭收容院的险情。虽然赠捐物常可换成几百法郎，有时也会得到大批的捐赠，价值达到几千法郎或更多。赠捐物中有时会有出现家具以及意想不到的银制餐具（或许是那些死亡的患者们留给兄弟会员们的）。对于今后如何经营的问题，兄弟慈善会员们决定不被外压影响，要一如既往按原宗旨办事。对每一事例的利弊，他们都以投票的方式作出了相应决定。

沙榔东收容院内部还有其他一大堆问题纠缠着慈善会的兄弟们，这些问题是需要大笔钱来解决的。餐厅的屋顶在漏水，主要的重建方案因劳动力和建筑材料费用的上涨，导致建筑商威胁要取消契约而不得不暂时搁浅。此外，供给整个收容院用水的储水池也在漏水。把水送到储水池的设施也不是没有问题，由马匹作动力、沉重而笨大的抽水泵的一个轮子烂了个口子，不定哪天就会出大纰漏。一方面大笔的钱须支出，另一方面，大笔的钱却在不断外流。为确保收容院今后在土地方面的资力，兄弟慈善会或须购买位于沙榔东上方的一块山坡地，或须购买沙榔东村子中的几座可改做商店的房子，那几所房子到手后可出租给商人，房子的阁楼还可作为带家具的房间租出。有时诸如此类的扩张计划需直接以现金交易，如售出位于沙榔东大道道路尽头的、地址为巴黎福堡圣安东尼的五所小房后，再以现金18 500 法郎购回位于沙榔东地区内的两所漂亮大房。那房子的墙上爬满了藤蔓，需要找人清理，房屋四周也需种些树木以遮住道路和杂树林。此外马厩的粪肥还须清出，并把它们用车送到农田里去。

兄弟慈善会与沙榔东的巴黎人有最优惠待遇协定之契约。兄弟们只需交付很少的基本租金，花园每一英亩地的租金也只有三十个铜币而已。但这种优待条件目前受到了挑战。收容院

和沙椰东的庄园主劳瑞尔(De Lauriére)与他的夫人,为他们的土地、为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一直争执不休,劳瑞尔夫人甚至比丈夫更刁蛮。这对夫妇在通往医院正面的土地上平地垒起一面石墙,以阻止船从马恩河运给医院任何补给品。收容院方面则不得不为诸如此类的事情雇用收费昂贵的律师,尽管兄弟会员们也可以请他们自己的支持者帮忙。譬如卡瑞·理江(Carré Le Jeune) 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为兄弟慈善会在巴黎议会牵线拉关系当说客的。还有来自奥尔良地区的罗贝拉兹先生也是。罗贝拉兹先生是沙椰东收容院的长期住院者,他的儿子是本地区议会中的一个律师,罗贝拉兹愿意帮兄弟慈善会争取到条件有利的大笔贷款。

对于像胡若望那样的贫困住院者,沙椰东收容院并不从他们那里挣一个铜币。收容院以其精神病专科与老年医疗院的名声,从住院者和患者那儿获得收入,再用收入的盈余部分来填补贫困住院者的支出。当然,如果这些贫困住院者能付款,他们会被照料得非常好。事实上,制度规定院长必须每星期两次探望患者,“并应尽量在熟知患者的病情下安慰患者”。院方还须将患者的医疗状况与院长的探查记录精确地写成报告,然后定期邮给患者家属。到了冬天,医院还燃烧原木用来取暖。收容院大楼外朝南,满目尽是庄稼地,其间多水泽,景色悦目,一片田园风光;收容院内的墙上挂着织锦画,地上还铺着毯子。甚至胡若望住的那栋楼,如果好好布置安排的话,也可以搞成舒舒适适的居住处所。在兄弟会员们的餐厅以及厨房的下方,有一个分开的、专为安排危急病人使用的医疗建筑物。该建筑物里有一个巨大的房间,房内有十四张床,整整齐齐地隔成两排,房间靠北的尽头安放着圣坛,以便病人在床上能做礼拜。

以上各项细节所述,均可体现沙椰东收容院基金之宗旨。

该基金是1641年由审计总长塞巴斯丁·来布拉恩克(Sebastien Leblanc)捐赠给属于上帝圣若望教会的兄弟慈善会的。医院内平日尽量保持干净无尘,因为许多兄弟会员晚间在一楼主病房上面的一排房间内休息。一些靠养老金生活、身体状况尚还不错的人也可同兄弟会员住在同一宿舍中。出了收容院主楼,往东侧靠近温室的地方望去,可以看见院长的住宅。住宅里还有个图书馆。此外,院方甚至还允许一些表现最好的、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在收容院外小丘上的花园里散步。不过花园的围墙太矮,对那些危险的住院患者是不开放的。

对依靠养老金生活的终身住院者,兄弟慈善会一次收费6 000法郎。由于许多家庭无力凑齐如此大笔现金,土地和房子也可作抵押。那些不动产有时会在新银行的票据上更值钱,但有时却会破产,所以在当时的法国是必须极其小心处理诸如此类不动产的。有些家庭甚至会以将来亲属死后所要继承的遗产作担保,将家里的精神病患者送到沙榔东收容院来。如前法国国王的步兵让·巴提思特·参福瑞(Jean Batiste Sainfray)就是用此种办法将他的疯子兄长皮埃尔(Pierre)送到沙榔东收容院的。这种付款方式对收容院而言犹如赌博一般,危险性相当大。譬如上了年纪的弗朗索瓦·罗比拉德(François Robillard)已住院十三年了,他的饭量从来都超过他该得的份额。在须付的总数之外,他的家庭成员——那些下了保证法兰塞奥斯在世时将负责付款的亲属——每年还须再为他额外的食物和衣物另付130法郎左右。倘若他那些作保的亲属过世,剩下的问题就难说了。

对于收容院里那些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入院时是须交费的。费用一般每年交一次,院方按不同标准收费,其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从900法郎到1 200法郎;另一种从

1 200法郎到2 000法郎。付费多的住院者每顿主餐中有鸡肉或其他家禽肉。付费少的，其餐盘中的肉量自然也就少得可怜了。

某些住院老人非常富有，他们的个人财产远超过大多数人整年的收入。当巴荣·赖维涅(Baron Leveneur)把他的刺绣外套和背心交给兄弟会员去出售，以便用出售的钱来购置老人们专用小礼拜堂内圣坛上的外罩布时，兄弟会员们才知道那两件衣物竟值500法郎！收容院里甚至还住着个勉强可称得上是英国贵族的人，大名曼呢尔(Manners)。曼呢尔先生是个私生子，他是已去世的拉特兰公爵(Duke of Rutland)的非嫡出兄长。这位曼呢尔先生住在沙榔东已八、九年了。他或许与白尼斯一样，当时为英王詹姆斯效劳而与英王一起被赶出自己的祖国来到法国，并一直居留至今，成了个白发苍苍的耆老。另一种可能性是他的出生丑闻太富有戏剧性，他的英国亲戚们也许希望他离他们越远越好。

迄今为止，尚无分文作为胡若望的住院医疗费付到沙榔东来，尽管当胡若望被送进收容院的时候院方似乎得到保证会有下列三方人士或机构为他住院费用负责：白尼斯、法国政府，以及天主教教会。从白尼斯的情况看，其将傅圣泽留给他的100法郎中的40法郎用于支付胡若望在圣凯瑟林小客栈的住宿费用，以及其他诸如租车将胡若望从小客栈送到沙榔东，并在日后到沙榔东观察胡若望等支出方面。其余的60法郎白尼斯就留到自己的口袋中去了。法国政府方面，国务大臣杜布瓦和警察中尉达介森并没将他们的保证贯彻落实。所谓国王会支付胡若望的住院费用，并一直到他康复出院为止的许诺，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在这种情况下，经傅圣泽再三催促，罗马的红衣主教们开了会，会上并表决决定，教会将拨出费用，由驻巴黎罗马教廷大使具体执行，将费用落实到处理胡若望的问题上。会议决

定，如果胡若望恢复神智，这笔钱将用于送他回中国，如果胡若望继续胡搅蛮缠，这笔钱将支付给沙榔东收容院。可惜的是这笔钱却从未从罗马寄出过。究其原因，这个麻烦乃出自红衣主教们的决议用词模糊不清。在一封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信笺中，红衣主教们极其谨慎地告诉大使，惟有在兄弟慈善会拒绝提供胡若望基本的食物和住宿后，大使才可动用天主教圣公会的基金。而大使将该函理解为主教们的决议是要他“为天主教圣公会寻求最大的有利条件”，并也是为了“最合适于那个中国人”。于是这位大使在10月份安排了同收容院院长的会晤。双方见面时，大使竭力说服院长按收容院的慈善案例来收留胡若望。

没有证据显示兄弟慈善会曾经从容地虐待过胡若望。记录显示，处在那些病人中的兄弟会会员们整天像花花公子似的，无精打采地从事着他们所献身的工作。这些人中，有沉溺于大输赢的桌球的；有整天徘徊在厨房，靠着厨房做饭时的热量取暖的；有肆无忌惮地换上便服走出院外到乡间逛着玩或办私事去的；有喜欢炫耀自己的挂表或昂贵的鼻烟盒的；有故意让软衬衣的衣领欲藏故显地拖在颈外，假袖口甩在袖外，脚上还套着双高级长袜子，大衣外披件合身的外褂，甚至鞋上还缀着黄铜色的搭扣以显示自己高贵优雅的；此外，还有沉湎于打猎而一直在收容院的领地内举枪练射击的。相比之下，终身住院养老的耆老们中无人拥有火器。在这种状况下，兄弟会会员们对胡若望的照看不可能是经常的。贫穷的患者通常被交给一个合同工照管，此人名为赖康恩特（Lecomte），虽然他不太被院方信赖，但要找到一个愿做这种工作的人也不太容易。

据某些了解内情的人描述，沙榔东收容院中不交住院费而受“慈善恩泽”的患者的最大麻烦，以及引起他们感觉到“蒙受耻

辱和痛苦”的事情，也许是那些日日平淡无奇的生活之积累、寂寞孤单、刺骨的寒冷，与那些富有的患者成明显对比的粗劣伙食，以及生活物资方面的匮缺。这些蒙受“慈善恩泽”的患者可去的地方只有诊所、澡房，以及可稍稍舒展一下胳膊踢踢腿、散几圈步的一小块空地。这些患者还缺乏阳光、蜡烛、阅读物，并且无所事事。白尼斯对该收容院物资提供的状况曾以宽宏大量的口吻记录道：“没什么可向胡若望提供娱乐或减轻他的精神压力的东西。”收容院里不给最贫困的患者发鞋子，患者们也得不到干净的亚麻布和新的床单枕套。胡若望被送到收容院时，带着已破旧不堪的、傅圣泽在瓦讷给他做的套装，还有他自己的两套中式服装。当这些衣服穿坏后，收容院不会给他换新的。

收容院院长对世俗的具体事物不太在意，但他对胡若望的精神状况倒很留心。当胡若望被问道——当然是以手势或其他姿势——是否要为他作忏悔听解或领受圣餐时，他以手势清楚地表示“不”。

1723年10月22日，星期五，至1725年8月9日星期四，沙榔东

没人确实知道胡若望到底是疯了还是神智仍然正常。有的人说他疯，有的人则说他根本就没病。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稽查员若塔牧师有一段时间也认为胡若望“神志已恢复清醒”，卡第那力则发现胡“更多或更少动怒”。白尼斯不再插手胡若望的事，他把所有傅圣泽给他的钱都耗尽在去沙榔东的路上了。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本人，正如大使所应做的一样，对胡若望精神是否有问题一事未下定论，保留意见，不过他认为此时最好不要将胡若望送回中国。国家行政方面，达介森中尉则下令，除非

从他的办公室得到特别许可令，任何人都禁止到沙榔东探望胡若望。自那以后，也确实没有任何探访者到收容院看过胡若望。收容院方面，院长也随意试着找了找懂中文的人，期望胡若望可能会告诉他们胡若望自己的想法，但在他的寻找范围内，没有一个会讲中文的。

沙榔东收容院里关闭贫穷患者牢房的尺寸虽不尽相同，但每个牢房都差不多为 12 英尺深，单边长度最小为 7 英尺，最大为 9 英尺，牢房的墙厚 2 英尺。门是用 2 英寸厚的橡木板做的，只能往里开。门外除了有两道锁之外，还有个大门闩。门上有个四方形的洞，距地面大约 3 英尺高的地方。食物和水就经这个洞从外面传给里面的人。经营和管理这个收容院的兄弟慈善会成员都不参与这种实际操作，他们认为避而远之才是聪明之举。

牢房的墙和天花板是用灰泥抹成的，上层牢房的地面是用砖铺的，下层牢房的地面是用粗石块铺的。每间牢房对着门的那面墙上有一扇窗，大约有 3 英尺宽、4 英尺半高。窗格子上镶着玻璃，不过玻璃常常破损不齐。窗被嵌在木槽框里，患者可自行将窗推上或推下。窗框外侧有铁栅栏，以防患者逃跑。

上层的部分牢房内还有壁炉，窗户向南的房间里还可看到收容院内的天井。天井内有时会有生面孔出现，这是因为当地人有时会把天井当作公园随意进来逛逛。站在天井放眼远眺，可发现地势缓缓而下，直到马恩河边。在河水的尽头，有个小码头，马恩河将收容院所需的补给轻轻放在她自己柔滑的身上，从各处缓缓地移送到此。收容院内，只有一楼牢房与其他楼层的牢房结构有所不同。所有的窗都需从外面伸手透过铁栅栏关闭，并在外面用木闩扣上。窗关上后，整个牢房就成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世界。

收容院每个牢房中的床都固定在靠窗的墙角，床架是用粗大的木材做的，四方形，每一边有 2、3 英寸见方。床框靠着墙，以床脚支撑着。床脚所用的木材与床框一样。床框上钉着小板条，各小板条之间有空隙，算作床板。褥子就铺在那上面。

每个牢房内靠门挨墙的那块地方，还有个顶部开着大椭圆洞的、看去像个结结实实的木箱般的东西。椭圆洞下，有个用来装患者排泄物的桶。桶后面的墙上有个四方形洞口，洞口平时用橡木做的小门堵着，小门外侧有个木拴横着，当做锁用。当桶内积满秽物后，洞门可从外打开，将桶拿到外面走廊上出空后再从原洞送回，而用不着派人走进牢房里取放此秽物桶。

自 1723 年 10 月 21 日至 1725 年 8 月 9 日，在整整近两年的时间里，胡若望就一直被关在这所沙榔东收容院。在此期间，收容院长和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都同意继续将胡若望作为免交住院费的受慈善患者处理。在这六百五十八天里，仅有一条确切的有关胡若望的信息得以留下。这条信息是：有一个沙榔东的工作人员给了胡若望一条质量不错的、暖暖和和的毯子，以驱长夜之寒。胡若望却把它撕成了碎片。

重见天日

第十章

1725年8月10日，星期五，沙榔东

此时此刻，有个人正在同胡若望用汉语交谈。胡若望最后一次听到他会说的语言，是在1723年春季的某一天。那天傅圣泽用汉语问胡若望是否愿意改变主意与他一起去罗马。自那以后，胡若望再没听到过有人用他的母语讲话。现在这个说汉语的人个子高大，皮肤黝黑。除了官方汉语，他还能讲一些带点外国口音的广东方言。

这个人是越北[①]地方的汉人。他是独自一人被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带到沙榔东来的。胡若望见过这位大使。那是大约在三年前的某日早晨，当时胡若望还曾经摆动过这位大使的家具。说起这个越北人懂广东话，那可真是个破天荒的奇遇。这个越北人是由奥地利传教士罗伯特·巴罗兹(Roberto Barrozzi)神父领洗而入天主教的。当在北部湾服务的巴罗兹接到教廷召其回欧洲的命令时，他们为等清政府的通行许可不得不在广州居住了一年左右。其间这位越北人利用机会学习了广东方言。到了巴黎后，这位越北人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又飞快地捡起了法语。某天，大使的贴身工作人员中有人听说巴罗兹神父那里有个懂三门语言的人，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大使。亏得那个大使还算有些记性，骤然想起了两年前罗马红衣主教们有关要时时检查胡若望精神状况的责戒。他现在可以仅仅间隔一人，由他本人直接同胡若望对话，并可亲自下判断。

见大使来访，胡若望的话多了起来。胡若望的全部话语只

---

① 所谓越北人，即北部湾地区人。北部湾指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与越南东北部间水域。

集中在一点：傅圣泽欠他的钱。他俩订了契约，但傅圣泽并未遵守。胡若望每年应得二十两银子，但却从未收到分文。傅圣泽必须把欠他的钱还给他。

那位越北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将胡若望的原话译成法语，问题是他并未全部听懂胡若望的广东方言。大使记下了傅圣泽欠胡若望工钱的话，并对院长提到的有关胡若望将一条好毯子撕成碎片的事颇感兴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大使通过翻译问道。胡若望回道："因为那毯子已给了我，是我的了。"在大使与翻译离开前，胡若望还字迹潦草地匆匆赶写了一封给傅圣泽的信，问傅圣泽何时回巴黎。信写完后，胡若望将它交给了那位越北人，并深信他定会将此信送到罗马。

去过沙榔东之后，大使觉得胡若望的神智也许是正常的。他决定打听一下不论是从圣马罗(St. Malo)、路易港，还是从奥斯坦德启航的船期，为的是遵照两年前罗马红衣主教们有关教会应给付这笔旅费的会议决定，将此事作个了结。另外，他个人还认为，如果傅圣泽确实欠胡若望工钱的话，他应该向胡若望提供穿得较体面的服装费用，并且当胡若望到达广州后，他还应该提供安全送胡若望回到家乡的旅费。否则，对胡若望就失之公平。大使并决定提笔向傅圣泽写下他个人的建议。在这种可想见的令人困惑的境况中，胡若望写的那封信不知不觉地就不见了踪影。

1725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罗马，巴黎，沙榔东

8 月底，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信被邮送到了傅圣泽的住处，傅圣泽当即回复。在给大使的回信上，傅圣泽声明：胡若望不但从未按契约完成他自己同意做的工作，而且胡若望也一直令他相当失望。因此，胡若望根本无权向他索取所谓一年二十

两的银子。况且，“胡若望索求薪资之举，即可证明其神智尚未恢复正常”。

傅圣泽本人认为，他的立场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不过傅圣泽并非没有理会大使信中含蓄提到的、傅圣泽曾经许下的提供胡若望回程船票的保证——如果他傅圣泽要是有这笔钱的话。傅圣泽此时手头并不宽绰，尽管他最近才被任命为主教。他的主教职称实际上是个荣誉头衔（Eleutheropolis），被任命后的他傅圣泽的全名现在成了“让-弗朗索瓦・傅圣泽”，名义上是帕提部斯・印非德琉姆（Partibus Infidelium）地区的主教。听起来，他是个有管辖区域的主教，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所谓帕提部斯・印非德琉姆地区只是个历史上的地名，位于现在的马其顿和巴勒斯坦境内。原则上，教会规定耶稣会教徒是不能接受诸如此类头衔的，但新近经选举上任的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 XIII）特别豁免了傅圣泽年轻时曾立下的誓言，那誓言是避开所有的荣誉职称。

甚至在回大使信之前，傅圣泽已寄出封简函给罗马红衣主教委员会，论及有关那位中国人的问题，委员会主席是赛可派恩红衣主教（Cardinal Sacripant）。傅圣泽提醒他们那个“书写名称为若望胡的中国人”之存在，那个中国人到欧洲是作为帮他解读中文书籍的秘书和助手来的。他再一次提到，当时教皇特使嘉乐曾答应假如胡若望到罗马，教会会雇用胡若望。他提醒委员们胡若望是如何变疯的、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又是如何慈悲地将那个中国人送进一个慈善医院里的。傅圣泽还提醒这些红衣主教们，他们曾经在 1723 年 9 月投票决定拨钱给胡若望的宽仁之举，并建议此善行可再重施，并再追加些为胡若望购衣以及其在当地的出门坐车费。他恳请道：“敝人恭谦地恳求高贵的大人们，赐予该可怜的新入门教徒宽大与慈悲。”在信的结尾处，

傅圣泽写道："谨希赐予其更大善行，因迄今为止，天主教传道总会的神圣社团(the Sacred College of the Propaganda)实际上还从未破费过一文钱，用以帮助这个人。"

对胡若望之事，红衣主教们在9月5日之前开会时做了新的决定。他们决定支付胡若望的归国费用和任何其他合理的附带费用。当红衣主教们知道胡若望来自广州后，他们认为教会不须再为他支付在广州登岸后归乡的旅费。时隔数日，红衣主教们将会议决定传达给了在巴黎的罗马教廷大使。

收到会议决定的大使，在9月24日写了回信。信中他感谢红衣主教赛可派恩的恩慈。但他提到，由于在翌年1月之前没有去中国的船只，他也因此会有"充分的时间为该中国人安排好出发事项"。

外面的世界再怎么闹腾，也与关押在收容院的胡若望毫不相关。他的躯体仍被禁锢在那个小小的单人牢房里。

1725年10月12日，星期五，沙榔东

近四年来，神父戈维理一直在为胡若望的事担忧。当初他并不希望傅圣泽带个中国人助手一起回欧洲。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戈维理不认同傅圣泽许多关于中国古籍的宗教解释；另部分原因是因为傅圣泽将有关中国礼仪祭典的想法与研究竟然转到另一教派的天主教圣公会进行；其他的部分原因则是考虑到万一胡若望死在海外，可能会引起对合法宣教问题看法的分歧，以及藉此广州。

天主教组织也可能将被索取钱财的问题。再就是可能还有戈维理神父对傅圣泽品行相当厌烦的个人情感。戈维理当时曾企图向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的官员布热特施先生

和屈维尔先生施压，不让中国助手坐船同傅圣泽一起出走。

整体而言，当胡若望离开广州后，戈维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胡若望离岸没多久，他的母亲与其兄弟随即到广州的耶稣会上门索钱，令戈维理头痛不已。这对母子认为，既然傅圣泽属于耶稣会，那么戈维理也就有分摊他们生活费用的责任。戈维理曾把他们打发到圣公会的潘如神父那里，原因是胡若望原来在该处工作，胡若望出国也是在他的鼓动下而实现的。本来广州地区的本地居民与外来的西方人关系就很紧张，当在珠江岸边稻田收割的一个孩童被英国船上的士兵称做射鸟而打死后，那种紧张关系犹如雪上加霜，更是每况愈下。射杀事件发生在 1722 年 10 月，“事故”杀手是个水兵，名叫斯凯特古德，事后水兵幸运地逃脱了，但随之而来的赔偿费为二千两银子，丧子的家庭拿到三百五十两，剩下的都进了地方官吏的腰包。这件事的影响尤深，至今在地方上还能私下听到对西方人的抱怨。

事件发生两个月后，中国的康熙皇帝驾崩（1722 年 12 月）。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环境也开始有了显著的变化。继位的雍正皇帝、康熙帝的儿子，对欧洲人毫不关心，对他们的宗教也不保护。在广州和澳门的许多西方人自此生活在半流放的状态中。耶稣会在北京的影响到此也骤然停止。该教会自 16 世纪晚期以来，一直遵循由利马窦那一代传教士开创的传教策略，不过至此也大受挫折。那策略是：通过与中国人意识形态的通融调和，而吸引皈依天主教的信徒。

在此恶劣的传教形势下，戈维理于 1724 年回到了欧洲。载他回欧洲的是一艘英籍轮船，船名为“梦她归”（Montague）。戈维理在船上时，曾经给傅圣泽写了封信，不过那封信是他 7 月份抵岸后才邮出的。他在信中向傅圣泽传达了来自中国的坏消息，并议论到傅圣泽有关中国古典的观点：“足下希藉助释明中国人权威经

典之系统以拯救在中国之传教活动。但此帷幕极长，且深藏在真实宗教之巨大谜团中。”傅圣泽看到这句话，可能认为这是戈维理对他的讥讽或批评，在回信的信纸边白处他又加写了戈维理不能全看懂的解释。不过在9月下旬，傅圣泽还是对戈维理的议论作了很有礼貌的、有关中国经典和政治方面的讨论与回答。信中傅圣泽还询问了所有他所认识的、在中国的神父们的近况。尽管如此，当写到信尾处，傅圣泽还是故意将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母拼错，并以淡墨水写出。写完信后的傅圣泽觉似乎仍旧觉得不尽兴，掂量再三，他又留下了一句揶揄话："敬请足下将所知任何有关德·拉·布热特施与垂北特·德·屈维尔的音信传报此处。"

戈维理给傅圣泽的回函写于11月5日。之前他为病所困，甚至回信的当儿他还躺在医院，在接受治疗和恢复中。信中他向傅圣泽介绍了所有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近况，但对德·拉·布热特施与垂北特·德·屈维尔两人则一字未提。11月22日，在傅圣泽抽出时间复信前，戈维理又提笔向傅圣泽谈起其他两件事。其一是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企图理清历年来傅圣泽的书籍之购买和记账问题；其二是胡若望的问题。戈维理此次将傅圣泽带胡若望出走后在广州当地发生的事兜底托出。在记述胡若望的家人如何到耶稣会催讨要钱的事后，戈维理问道，要是胡若望的家人听到胡若望神经出了问题、听到胡若望到欧洲后所遇到的一切后会如何想？"其夫人与子女将使余等安宁耶？如此中国人生不能归国并死于法国，彼等恐有权索取巨额赔偿以慰其心灵与生活之损害。"戈维理还指出，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好诉讼。看看最近发生的三起欧洲人致中国人死的事件就可证明这一点。每次的结局都是灾难性的。你傅圣泽难道不能劝说教皇将胡若望送回故乡？

戈维理的这封信使傅圣泽气愤填膺。1725年1月2日，他

提笔反驳道："足下之担忧击余剧甚。"当时你戈维理倘若不加干涉，我傅圣泽原可在寻找所需中国人，在谈雇用条件时"非仅可得更优惠之协定、更合适之人选，且还能省去一切日后由所携来之人造成的所有麻烦"。倘若胡若望，一个四十岁的成年人，自愿从独立自主的道上退出，胡若望的儿子盖司帕怎可埋怨他人？再者，胡若望是个鳏夫，其妻早已去世，哪有夫人来闹事之理。关于戈维理所举的三户中国人受害者家庭索赔事，假如那三户中国家庭得到赔偿，是因为案件性质不同。该类案件均为暴力事件，事件中不仅使用枪支刀剑，甚至还有欧洲人攻击中国政府官员。在诸如此类的案件中，傅圣泽评论道："百姓为其同胞之鲜血而醒悟。诸此百姓为寻求复仇而将事件闹大。中国官员有权惩处怀兽性与鲁莽之外国人。"但论及胡若望时，情况则大不一样："又无人犯罪，何有清白者受折磨之说？"假如胡若望死在欧洲，难道还会有人为"其去世起因于欧洲人而诉讼不成"？戈维理究竟设定何种普世标准来衡量、裁定此类事情？傅圣泽继而反问道："倘若中国人登船与余等渡海旅行，至西方王国，余等还需为保证其不死而尽力？世上岂有如此思虑事物之人，甚至在中国？"

戈维理没有答复这封措辞激烈的信，他也未很快采取行动。因为当时达介森中尉禁止探望胡若望的禁令仍旧有效，时机也不成熟。戈维理接下来要办的事是去找白尼斯，他必须首先见到这位白尼斯。通过白尼斯，戈维理知道沙榔东收容院院长为胡若望至今仍未领过圣餐和未做过忏悔一事而有所挂念，而收容院还找不到会用中文为胡若望做弥撒的牧师。如戈维理到收容院去听胡若望的忏悔，他可绕过达介森中尉的禁令。不过除此之外他还须对另一个禁令得到豁免权。那个禁令是巴黎大主教诺阿耶红衣主教(Cardinal de Noailles)定下的。主教禁止耶

稣会教士在他的教区内听教徒忏悔。

傅圣泽曾为听取胡若望的忏悔而得到过一次豁免。戈维理要求沙榔东收容院特宾(Turpin)院长获得另一次豁免,惟此他才可去沙榔东见到胡若望。院长允之。从大主教处得到豁免后,戈维理就动身去收容院了。

待胡若望讲完其自身的故事,做了忏悔后,胡若望问起他自己的问题来:“我为何被关押在此?”戈维理没有勇气直接告诉胡若望说那是因为人们认为胡若望疯了,而是转而答道:汝得此局面,主要源自二因。汝自认令堂逝世,号天哭地,突如其来之悲戚令众人大惑不解,此一因也;众人觉神父傅圣泽既已离去,汝只身滞留巴黎而恐汝再次走失并闹出差错,此二因也。

戈维理与胡若望是在收容院中专为安度晚年的老年住院人士所预备的小教堂内交谈的,小教堂在接待厅的上层,屋里当时还坐着其他人。小教堂内的圣坛装饰得很高雅,圣坛上铺着红色的天鹅绒布,天鹅绒布上还有件金色衣服。这两件东西是巴荣·赖维涅老人出售他的刺绣外套和背心所得来的500法郎,加上兄弟会员投票决定再追加500法郎后的总数换来的。

戈维理听了胡若望的忏悔。与前次傅圣泽听胡若望的忏悔一样,他尊重胡若望的隐私,从未以任何形式透露忏悔内容。忏悔后,他本人相信胡若望的神经并非不正常。戈维理认为胡若望是个知文识字的中国人,其一直被不体面地虐待并剥夺了应有的俸禄。戈维理极其希望胡若望能返自由之身,但戈维理不会对神圣的忏悔不忠,而且他也用不着如此做。戈维理只需将他在沙榔东看见的和听到的要点告诉他在巴黎的朋友们,让传闻起作用就可以了。

戈维理离开沙榔东时让胡若望再给傅圣泽写一封信。此次戈维理将会确认该信是否会送到傅圣泽手中,而戈维理也将以

他自己的语言告诉傅圣泽胡若望向他所诉说的一切。

胡若望给傅圣泽的信：写于沙榔东，1725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30 日间

"谨启奉者：

忆自粤东航海同行，及至一年有奇月日即到大西巴里京城[①]，并无过犯，可谓托赖天主罢德肋[②]保佑。不辱相携，执事咸宜，难谢万一矣。

岂料从无相识之奔事，晋住其楼，不知奚听而妄称罢德肋杀人。令我害怕，连日其苦。曾告白无罪。既辞，又强种种应对。已于至西洋五十个月日，纳有启一封，交现住间置沙榔东高汉人[③]手送投。阅请示归期，未知到否。

目前又会清水濠堂戈老爷[④]驾临慰言。道及老伯尔台现在罗母府[⑤]……无恙。

常思至西[⑥]转广东，愿请……在迩，难容失信，陷我××[⑦]往，养亲有缺，瞻礼进堂，伏听弥撒等事俱失，恐太得罪天主，则深难逭赎，兹因悃情，叩及便呈，仰希金谅。凡事省察循理，祈早示行期，统难失望可也，不宣。禀上傅罢德肋、圣讳方济各老爷座前。

赣郡堂晚生胡若望顿首。"[⑧]

---

① 巴里，指今巴黎。

② 此处指傅圣泽神父。

③ 高汉人，指高个子汉人，指做大使翻译的越北人。

④ 指原负责广州府清水濠耶稣会教堂教务的戈维理神父。

⑤ 罗母府，为罗马。

⑥ 指南斯等法国西岸港口。

⑦ 此处原文不清。

⑧ 此段信文据英文版原著扉页内所载胡若望原函影印件抄录。原函部分已损，无法辨认。

1725年11月15日,星期四,罗马

11月12日,是星期一。该晚,傅圣泽收到了戈维理给他寄来的长信。戈维理在信中描写了他与胡若望于上个月在沙榔东会见的情况。除了戈维理的信外,傅圣泽还发现有一封胡若望的来信也在等着他。傅圣泽前一阵出远门,当晚才到家。他是到圭特若红衣主教(Cardinal Gualterio)的别墅去的,并在那里过了几星期悠然自在的日子。红衣主教的别墅在其家乡,位于奥维多(Orvieto) 附近。

三天后的星期四上午,无法抑制满腔怒火的傅圣泽,终于按捺不住提笔给戈维理复信。字里行间处处充满了他的狂暴和怒火,而且它们竟交织成十二页信纸! 相对胡若望的来信,傅圣泽并没怎么理会,因为那只是个头脑糊涂的神经病在胡闹,是一堆汉字的涂鸦,根本不值一驳。尽管如此,由于胡若望与戈维理唱双簧,在戈维理拐弯抹角对傅圣泽的行为举止进行指责时,胡若望将其自身的压力也怪罪于傅圣泽的行为举止这一方面,傅圣泽不得不对两人指责之共同处进行反驳。

你们两人煽起了三个有争议的论点,傅圣泽写道。其一:胡若望应该回国,胡若望渴望回家;其二,胡若望相当正常;其三,我欠胡若望的钱。

关于第一点,我的意见是,让胡若望走,走得越快越好! 如他这次真同意走,想想他在开往欧洲船上的所作所为,奥斯坦德港船或其他任何船上的船员中如还有人同意让他搭船的话。

第二点关于胡若望的精神正常之说。在十字架前磕头在中国是可容忍的,尽管磕三次、四次,或甚至极其令人震惊地磕九次也是平常标准,但没有人像胡若望那样,磕那种他自己发明的

五个响头的。除此之外，他胡若望在巴黎大街上满街乱跑是怎么回事？他母亲还活着他怎么能为他母亲服丧？他在路易港乱骑别人的马、他拿刀乱舞，他搞破白尼斯家的门，他在圣保罗的奇妙布道，他在冬天睡在打开的窗下，他在梅森宣教院圣器收藏室内的跳跃，他在冬季冒雨独自出走到奥尔良，那些又都是怎么回事？睁大眼睛去问问白尼斯，问问白尼斯的女儿，胡若望是否正常，再去问问罗马教廷大使的工作人员去！

第三点，我傅圣泽欠他胡若望的钱？合同就是合同。胡若望拒绝工作，不管那是因为他的蠢行、他的恶意、他的不听使唤、他的反叛心理，还是其他原因所致，不论找什么理由我傅圣泽都不在乎，例子多得是，随手可拈。惟一的结果就是胡若望没做任何事情！他胡若望在广州可是拿到过十两半银子。他有过上好的被褥，在路易港他得到一套上乘料子的衣服，他坐公共马车到巴黎不用自掏腰包买票，他有饭吃，他还得到交给白尼斯的 100 法郎！用不着再告诉这人更多的了，告诉他他是个疯子，要面对面地告诉他，就像我曾经做过的那样！

让圣公会来管这人的钱并把这人送到船上去吧！但你戈维理也得记住，就因为你当初在广州瞎搀和，使得另外可能随我走的中国人退出，而留给了我这么个东西。

真诚地属于你的，还有其他，其他……

富凯（傅圣泽）

1725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巴黎

最近，巴黎警察局中尉一职在人事方面有了变动。三个月前来了个新上任的中尉，名叫瑞奈·海若特（Rene Herault）。

上任后的海若特立即听到了有关胡若望的传闻。不瞒人说，听小道消息，听传闻和谣言并扑灭它们是警察中尉工作中的一项。看起来好像有个中国人被不适当地关押在沙榭东的收容院中了。

海若特是个非常讲究工作效率的人。他出身于鲁昂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到任时岁数虽比达介森大些，但也不过才三十四岁。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后他曾鳏居过一段时期。他的两任夫人都出身于事业成功且政治上有权势的家庭。当中尉前，海若特在巴黎和其他省担任过其他多个重要警务职位，年轻轻的他处事老成，经验丰富。

海若特发现胡若望被监禁在沙榭东是由他的前任达介森中尉和国务大臣杜布瓦所发的一纸"封印公文"所致。海若特还发现达介森和国务大臣杜布瓦曾答应从国王的财政部拨钱支付胡若望的住院费用，但实际上从未执行过。达介森已调走，杜布瓦也不在人世了。重新解决胡若望的问题，在人事方面已不存在什么瓜葛了。因此，海若特从新的国务大臣那里申请到一份新的"封印公文"，内容是撤销原"封印公文"的命令，然后将它寄给了沙榭东收容院院长特宾先生。收容院乐得赶紧放人，公函一到，胡若望立马就给放出来了。

海若特将胡若望安排在巴黎市内的一套舒适公寓中。他还作了安排，让胡若望洗得干干净净，并给他置办了一套较合适的衣服。不仅如此，他还另请皇家财政部拨出800法郎，以之用于胡若望的回国费用，以及偿还从未为胡若望付过的、他在沙榭东的住院费用。做事井井有条的海若特中尉还要求罗马教廷大使尽快同奥斯坦德的法国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联系，确认哪一艘船在1月份将最先出发，并确保胡若望沿路通行无阻及得到登船许可。

考虑周到的海若特还特地安排了私人教师到胡若望的公寓，去教他法语。

1726年1月16日，星期三；巴黎

胡若望坐着长途公共马车离开了巴黎。车轮轰响，压着底下的大道，一路奔向布鲁塞尔。到达布鲁塞尔后，胡若望将住在另一位罗马教廷大使斯宾理(Spinelli)神父的住宅，然后再被送到奥斯坦德。他要在那里等待东印度公司的船回广州，他的铺位在此之前已被预订好。

回归自由的胡若望最近的情况也不尽人满意。海若特中尉的命令使得胡若望被释放了，不过他的举止却是每况愈下。胡若望不仅拒绝学法语，并在他的公寓内搞出太多的节外生枝，以致海若特将他从公寓迁出，送到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的处所。虽然如此，胡若望的举止在大使处也没什么改变。

马塞易也因此又一次命令他的监督官马克·卡第那力监管胡若望。从他俩以往的交往来看，派卡第那力监管胡若望也是必然之举。卡第那力此时已为胡若望订好了1月下旬从奥斯坦德出航的东印度公司船的铺位票，并确认无误；他还两次为胡若望订了从巴黎到布鲁塞尔的长途公共马车票，冀望胡若望能早日离开巴黎。但这两次车票都因胡若望在马车启程的最后一刻拒绝登车而白白浪费，无人收益。

卡第那力必须完成任务，将胡若望送出巴黎。以往的教训使得卡第那力不敢掉以轻心。这一次他早早地将胡若望带到了公共马车站，还带了位耶稣会神父以帮助翻译和解决任何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驿马车即将启程之际，胡若望再一次犹豫起来，止步不前并拒绝登车。卡第那力不再多话，动手抓着胡若望

就往车里推，胡若望却拽着卡第那力不让推，并且一下子就将卡第那力的衬衫拉破。狼狈不堪的卡第那力心一横，不再顾忌，使足全身的力气竭力要把胡若望塞进车里，还叫几个边上看热闹的伸手帮着推。突然多出的几只手，使得头在前身在后的胡若望顿时失去重心，一下被甩进了车里。当胡若望不由自主地翻身滚进车厢时，闲着的双脚却不甘就此罢休，管他三七二十一，往后猛然狠狠地一蹬，不偏不倚正中才将胡若望推进车厢后准备抽身的卡第那力前胸，使这位监督官大人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好几大步。踉踉跄跄回到车旁，准备上车监送胡若望的卡第那力突然瞧见车厢内还有个乘客，私下大喜，忙趁机托付，请他一路监看胡若望，他自己则乐得免去这趟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四年后，卡第那力回忆当时事情发生的经过，并提笔记录下来。他写道：当时还有个很有耐心的耶稣会神父在场，那位神父可证实所发生的那场麻烦。不过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位原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监督官却已记不起那位神父的姓名了。回顾历史，我们今日却可确实无误地肯定，那天在场的那位神父就是戈维理。戈维理怀着满腔爱心为胡若望作翻译，直到最后一分钟，到胡若望安全地离开了他的视线为止。

第十一章

返　乡

1726年11月上旬，中国，广州附近

胡若望的双脚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广州。海上旅行一路无事，三艘奥斯坦德大帆船在10月份一起抵达了广东当局指定的船舶停留处。大帆船的船员们不仅带回了胡若望，还有他们的货物，在中国作贸易需用的金块银锭，另加上一大捆捎给在北京和广州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信件。

胡若望跳下船后，立刻冲向家里，与家人团圆。他看到了他的母亲，了解到自他离国后，母亲除了教会宣传品，别的一样都没收到过。胡若望也见到了儿子盖司帕。儿子已长大成人，在教会为潘如神父工作。

回国后的胡若望去了一次圣公会传教所，潘如神父仍在那里当主管。看守大门的门卫却是个新面孔，并不认识胡若望。胡若望并不是特意为寒暄而去，而是去要他那笔钱，那笔曾经答应给他的每年二十两银子，合起来共五年的欠俸。而这笔俸禄傅圣泽从来就没给过他。潘如神父为了让胡若望闭嘴，不再到处宣扬，给了他一些东西作为部分付款。

胡若望不再与神父多说，径自走到圣公会传教所和教堂外的空地上，站住了脚。面对大街，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大声吼叫起来。

嗓门像个高音喇叭的胡若望冲着大街上的路人打招呼，直到把他们都叫到跟前，来倾听他的诉苦。他告诉群众说他才去过欧洲——那些西方神父们的老家，并悲惨地倾诉他在欧洲所受到的粗暴待遇，还向他们诉苦，说他从未收到他曾被许诺的俸禄，而他是有权要回这份俸禄的。

胡若望口若悬河，语言生动且毫不畏缩。围观的听众越聚越多，不一会就把整个大街堵得水泄不通。潘如神父不愿见事态闹得不可收拾，遂走出大院警告胡若望，若不立即离去，他将叫中国官员来赶人。胡若望不说别的，只索要他的俸银。潘如继而说服从奥斯坦德来的船长，请那位船长让出他从胡若望的旅费中所得的差额好处，虽然那位船长并不情愿将已入口袋的大洋再白白送出。旅费出自法国国王的礼品信托部，是巴黎警察局海若特中尉命令交给船长的。

胡若望拿到了这笔钱。他用之采购衣物。他像要过新年似的给自己家人添置新衣服。之后，他带着母亲和儿子，穿着崭新的衣服回到不远的老家探亲去了。

一段时间后，胡若望的儿子盖司帕忍受不了父亲的态度而离家出走了，他在澳门的一个教会中找了个栖身地暂时居住下来。

胡若望自己则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去享受天年。四周景色如故，乡音绕耳，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儿子走了，没什么，孩子大了总是要远走高飞的。但胡若望还有他健在的母亲与他在一起。他的乡里从来没人像他那样出过如此远的远门，就是在广州，不，甚至在整个广东省，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出过西洋的老广。

回到故乡的胡若望常坐在夕阳下，瞅着气根满身、枝梢下垂的老榕树。收割季节才过，满目的稻梗在夕阳的照耀下发出金色的亮光。脚下，儿时看惯的河水此时在一边静静地淌着，抬头向远处看去，极目之处是连绵的山峦，它们将天边剖出条蜿蜒的曲线。“胡伯伯，胡伯伯！”孩子们围绕在胡若望的身边，不停地欢叫着，他们眼睁得大大的，心里满怀着期待。他们尖细、充满信心的声音冲向那无声无际的天空：“胡伯伯，告诉我们，山外那

边的地方是什么样儿的?”

胡若望眯着眼,顿了一会,然后闭上眼柔声慢语道:“嗨,孩子们,那地方和咱这儿一样,没什么不一样”。

注　释

前　言

傅圣泽的三部“真实之叙述”(Récit Fidéle)手稿列于文献 AAE; BAV, Borg Cin 467; 以及 BL, Add MSS 26 817之条目下面。由 Henri Cordier 出版社出版的 AAE 的副本中,则列在 RF(Récit Fidéle,“真实之叙述”简称)之下。

lettres Juives, V, letter 147,第 269—273 页。这封信讥讽地题献给堂吉诃德的侍者(桑丘潘沙)。该信指出,根据一封“封印公文”的信,胡若望企图展现拘押系统的虐待欺压真相。文中并未出现胡若望的名字,但有傅圣泽的名字。

伏尔泰,《哲学辞典》,1784 年版,第 304—306 页。原文为: Voltaire,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1784 ed., section “Ana, anecdotes”, pp. 304—306.

第一章　质　　疑

1725 年 10 月 12 日

有关戈维理致傅圣泽的信: 1725 年 10 月 15 日: BAV, Borg Cin, 467,第 165—168 页;关于描述前星期五与胡若望的会面,如 10 月 12 日。傅圣泽自己对这封信的部分总结与评论见 RF 541—547;有关戈维理(Goville),见 Pfister no. 258, Dehergne, Repertoire, no, 382;关于他在 1718 年的语言和英语功力,见 Morse, Ⅰ,第 158 页;戈维理将胡若望提的问题以罗马字记为“so muen kin kinti,” 改用拼音应为“(Weisheme) suomen jinjindi”〔(为什么)锁门紧紧地。——译注〕

第二章　出　　发

1721 年 9 月 30 日

有关雇用胡若望,见 RF 384—85。此事发生在胡若望初次遇见傅圣

泽的三个月之前，即1721年12月31日。

Witek有一份极好的介绍罗马福音传信部圣公会的职能与组织的文章，见15—22页。

有关1704年广州的教会与传教士的类别，参见Fontaney, "letter of 15 January, 1704"，第324页。傅圣泽计算，1721年有八个天主教神父住在广州市，其中有两个耶稣会教士，两个圣方济会修道士，一个奥古斯丁会教士，一个多明我会教士，一个圣公会教士，和一个属"D. D. Gallorum"组织的教士。对住在广东省内的其他传教士，傅圣泽说有十八个。见傅圣泽"Catalogus Omnium Missionariorum"，第69页。

有关胡若望的岁数，见RF 529。有关江西("赣")省，见胡若望信，BAV, Borg Cin, 511，第5，第24行。有关胡若望的母亲与儿子，见Gaspar, RF 551, 565。胡若望的妻子早已死亡一事("depuis longues années")出现在傅圣泽于1725年1月给戈维理(Goville)的信中，见BAV, Borg Cin, 467，155页。在同一封信中，傅圣泽提到胡若望的儿子盖司帕(Gaspar)"déja grand"，还提到胡若望与其母亲、弟弟，以及儿子同住。见傅圣泽的脚注，RF 538。

胡若望的语言功力可从现存的、胡氏本人于1725年10月30(?)日给傅圣泽的信中可见一斑。见BAV、Borg Cin, 511，第5项。在1722年9月9日给在路易港的比哥农(Bignon)的信中，傅圣泽写道："Le Chinois qui a passé avec moi n' est pas un lettre du premier ordre, il n'est pas mesme gradué. Mais il écrit et il a lu toute sa vie."见BAV, Borg Lat, 565，第130页。

1721年8月10日那封引起严重后果的错投信，源自两个不同书写文字的"Wang"。见BAV, Borg Lat, 565，第103页。

Gaspard (有时为Kaspar, Gaspar) Castner(有时为Kastner), Pfister no. 220. Dehergne no. 157, 1700—1701年在佛山布道。Giovanni (Jean) Laureati, Pfister no. 221, Dehergne no. 451，也于1700年在佛山布道。1701年Chavagnac神父在佛山写道："J'y trouvai un très-grand nombre de fervens Chrétiens, et ce Père devait, quelques jours qprès mon départ,

baptiser trois cens Caté-chumènes dans les Villages circonvoisins qui sont de son ressort"——Chavagnac,第 72 页。成为教徒的日子是随意记下的，但由于胡若望是从这个特定的地域来的，这种看法看来相当不可靠。

毫无疑问，胡若望是圣公会教堂的传道师。虽然傅圣泽在 RF 留下的文件从没提到这一点，但傅圣泽于 1725 年 11 月 15 日给戈维理的信中却展现出来。见第 180—181 页。培罗尼也在 1727 年 1 月 10 日的信中证实了这一点。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27 页。

有关广州传道师的活动，见傅圣泽 1704 年 1 月 5 日的信，第 322—323 页。有关传道师所共享的信赖，可参见 Jaques 于 1722 年 11 月 1 日的信，第 191—192 页。有关传道师们黎明扫街等工作，参见 Gaubil（引自神父 Baudory）1722 年 11 月 4 日在 Lettres Edifiantes 中的信，第 202—207 页；以及 Gaubil 编辑的"西蒙"（Simon）第 29—32 页中有关医院和洗礼的程序，1719 年与 1721 年受洗礼的人数。

此处关于广州的描述依据 Jacques，第 186—188 页，以及 Gaubil 编辑的"西蒙"（Simon）第 40—42 页中有关广州的描写（信上的日期错写为 1722，应为 1723）。另可参见 Gaubil 编辑的"西蒙"（Simon）第 494 页中的广州地图。Planche Ⅱ. 有关黄埔：Dermigny 的 La Chine，Ⅰ，286。其他在 Morse，Ⅱ 的地图，1 与 320。

有关樊守义（教名 Louis Fan）回中国，以及广州府官员因此事件为康熙帝作的年日录，可见《康熙翰文奏折》第 13，以及 701—702 页。有关该总督报告樊守义"正在奏写其在西洋期间见闻录"，见同奏折第 711 页。《身见录》成于 1721 年。见 Fang Hao 翻译的樊守义《身见录》，第 856 页。樊的《身见录》还另有个转译本，在 Rosso 印刷，见第 332—334 页。

胡若望与教皇，见 RF 385。

1721 年 10 月 6 日

1721 年 10 月 6 日旅行开始前，傅圣泽提到他从 8 月 10 日到 10 月 6 日生了场大病，那场病使得他无力提笔写任何东西。见 BAV, Borg Lat, 565，第 104 页。在 1724 年 12 月 7 日傅圣泽给戈维理的信中，他提到那场病几乎要了他的命。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41 页。另还可见于

1721年10月4日(Witek,第376页)傅圣泽在去罗马途中给嘉乐(Mezzabarba)写的信中,那可能是傅圣泽最后一次提起他曾患的那场大病。那封信应写于10月9日。见BAV, Borg Lat, 565,第104页。其中傅圣泽记录了与Ciru的谈话。在这个记录中傅圣泽谈到了他从罗马教皇大使那收到了他9日去信后的回函。另可参见同上117页,傅圣泽于1722年5月30日给嘉乐的信。信中傅圣泽讨论了他从江西去广州途中患的一场大病,本书作者称那地方为"Chiuchiang"(那词太难解读,也可为"Chinchiang")。有关傅圣泽对自己岁数的感觉与急迫感,可参考傅圣泽给Hervieu信中的一段话:"当一个人五十七岁"。应当指出的是"在第五十七个年头"。原文见于第184页。傅圣泽生于1665年3月12日,见Witek,第75页。

有关生辰的信息见Witek,第80—81及第169页。

有关仓促出发之记载,见Witek,第242—243页,及BL, Add SS 26 816,第144页。

有关私人信件被毁,见BAV, Borg Cin, 467,第183—184页。Dentrecolles与Bouvet的信、见同上,第164—165页。有关一千二百册中文书籍以及另外数目不详的欧文书籍被留下未能带走一事,傅圣泽在1732年是这么告诉访问他的客人Joseph Spence的:"在匆促离开时,我几乎丢落了我所有书籍的半数。"见Spence编, Osborn, Observations, Ⅱ(no. 1 411),第524页。

2月20日到广州,见BAV, Borg Lat, 565,第117页。

开船:BAV, Borg Lat, 565,第117页。

书目:见BL, Add MSS 20, 583A。另见Omont,第810—811页。

有关教义概要,见Witek,第207页,概要基于傅圣泽于1719年10月26日给Guibert的信(MS);另可见Witek,第155页。

关于傅圣泽给Hervieu的信,见BL, Add MSS 26 816,广州:见1721年6月1日。第151—186页。(在第186页中傅圣泽加了一句话,说这封信从未被寄出去的原因是"les dispositions dans lesquelles se trouvait alors le P. Hervieu."有关第十三个卦形,见"tongren",同上,第166页。No.

14，“dayou”，见第 170 页。Nos. 24 和 59，“fu” 和“huan”，见第 171 页。有关“天下大众重新团聚”，见第 172 页。

有关“如此大业令人越干心越甜”，见 BL，Add MSS 26 816，第 174 页。有关第十三个卦形等诸此方面的观点，被称作“figurism”。可见于 Witek 的 Controversial Ideas（《有争议的观点》）以及 Mungello 的 Curious Land（《好奇的土地》）。

有关傅圣泽的誊写员和秘书，见 Witek，第 209—210 页。有关 1718 年禁止傅圣泽使用誊写员和秘书，见同上 236 页。此外，Witek 书中的参考书目中也可见于许多与此相关的文献。此外，一些穿插在傅圣泽关于礼仪方面的、有九百零六页之多的他的私人信件和书稿中用毛笔书写的优美中文字，也明白无误地证明傅圣泽有过中国秘书与誊写员。见 BAV，Borg Lat. 566。

有关两位中国学者，以及他们如何具体到耶稣会教堂，见 BAV，Borg Cin，467，154 页（录自于 1725 年 1 月 2 日傅圣泽给戈维理的信）；以及第 180 页（录自于 1725 年 11 月 15 日傅圣泽给戈维理的信）。

有关早期中国人到欧洲，见 Dehergne 和 Fang Hao 的有关著作。有关沈福宗（教名 Michael Shen），见 Theodore Foss，“European Sojourn（欧洲旅居）”和 Thomas Hyde，ed. Gregory Sharpe，Ⅱ，第 516—520 页。有关黄嘉略（教名 Arcadio Huang），见 Elisseeff-Poisle，Fréret，第 41—50 页；还有 Knud Lundbaek，T. S. Bayer，第 87—88 页。此外，在熟知文献的基础上，对黄嘉略事迹作了详细推测的，要数 Elisseeff 的 Moi Arcade。樊守义曾写《身见录》，以描述其在欧洲所见所闻。樊与艾若瑟（Provana）的遗体一起抵达澳门之事，也被汇报给康熙皇帝。见《康熙翰文奏折》，Ⅷ，701。一份删减过的樊守义旅行录在 Rosso 被出版过，见第 332—334 页。

有关樊守义到北京和东北地区，见 Witek，第 240—242 页，和 notes 226 页，230 页。傅圣泽在他的信中提及过神父艾若瑟（Provana）和主教奥恩（De Lionne），信中还有嘉乐（Mezzabarba）、神父封塔内（Fontaney）、神父马哈来恩斯（Maghalaens），“M. Bernard”和 Ripa。那封信是于 1725 年 1 月 2 日写给戈维理神父的。见 BAV，Borg Cin，467，第 157 页。此外，

Witek(p. 244, n. 237)5 月 18 日在广州的一次宴会,在那次宴会上,傅圣泽与嘉乐、马哈来恩斯神父在一起。如果他们在会上交换他们对拥有中国助手的看法,那应是很有趣的。有关具体罗马教廷派遣此次使节之事,见 Sostegno Viani 的 Istoria。

当时从海外归国的中国移民被相当谨慎地报告给康熙皇帝。见《康熙翰文奏折》,Ⅷ, 828, 在 1721 年一项,记录了三百一十五个这种人。

有关培罗尼在 12 月 4 日和 13 日的出访,可见 BAV, Borg Lat, 565, p. 107r;另同上,p. 106v。从记录中可知当时培罗尼与嘉乐一起在澳门。

波倪塔地区贸易主管是斯卡特古德(Scattergood)。有关这次事件,见 Morse, Ⅰ,第 168—169 页。1689 年可怕的外国人优先权,可见同上,第 82—84 页。

三个被关在监狱的是: Appiani, Borghese,和 Guignes。见 Rosso,第 187—188 页;Witek, p. 271, n. 54。

关于傅圣泽的静思,见 BAV, Borg Lat, 565, p. 107r。关于戈维理访问的例子,见 BAV, Borg Lat, 565,第 98 页(5 月 29 日)。

傅圣泽与培罗尼的友情似乎起于 6 月下旬。参考同上,第 99 页。

傅圣泽在 1721 年 8 月 4 日写了一封长信给戈维理,谈的是有关中国经典与他的书。见 BL, Add MSS 26 816,第 144—150 页。书的目录和花费信息在 1724 年 11 月 22 日和 1725 年 1 月 2 日的来往信件中。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50—153 页和第 153—165 页。双方都论及到以前 1721 年在广州的讨论。有关戈维理的生辰、事迹的资讯贫乏,仅有的可参见 Pfister no. 258 和 Dehergne no. 382.

傅圣泽相信戈维理误导了那两位学者,有关傅圣泽最为动怒的陈述,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54 页,始于傅圣泽于 1725 年 1 月 2 日给戈维理的信。

1721 年 12 月 22 日

有关 12 月 22 日的日期与培罗尼,见 RF,第 384 页中"douze ou quinze jours avant que les vaisseaux misent à la voile",1722 年 1 月 5 日那一段。

有关"康蒂王子"号(Prince de Conti)的船速、停船地点,参见 BAV,

Borg Lat，565，第117—118页。希望5、6月前到法国的材料，见同上，第126页。傅圣泽1722年8月27日给Orry神父的信。有关中国人与外国船的行驶，见《康熙翰文奏折》，Ⅷ，766，356。此外，BAV的参考资料并不支持Dermigny所称的法国特权在1720年与1724年间废止不用（desuetude）的说法。另见Morse，Ⅰ，252，有关英国；Dermigny，Ⅰ，361，有关他们南特由来。

有关布热特施先生购书，见BL，Add MSS 26 816，傅圣泽在1721年6月1日给Hervieu的信，见第182—183页。另还可见Omont，第810页，傅圣泽给比哥农的信。

有关书籍的托运费用，见BAV，Borg Cin，467，第152页。那些书籍的费用是268法郎又十三个5角铜币。加上托运费用共“超过300法郎”。也就是说，托运费用为31法郎或还要多。

有关船上官员小客舱生出的利益，见Dermigny，Ⅰ，234。

1721年12月31日

傅圣泽雇用胡若望的经过文件见于RF 384—385，BAV，Borg Lat。其中565中的记录是对该文件的重要补遗。另外，1722年10月3日傅圣泽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Massei）的信中，具体地记录了傅圣泽与胡若望面谈的时间为“出发前的五、六天”。出发日期为1722年1月5日。

傅圣泽是个美髯公，他的大胡子甚至在他1725年到了罗马后也因此能保存下来。1739年，当De Brosses见到傅圣泽时，对他的大胡子印象深刻。见Witek，第315—316页以及n. 160。

有关在1722年11月左右耶稣会教士在广州穿的衣服，神父Jean-Baptiste Jacques在1722年11月1日寄给Abbé Raphaelis的信中对这方面有描述。

RF 541提供了傅圣泽手绘的一幅胡若望鬼鬼祟祟和脏乱模样的素描。RF 535则提供了傅圣泽评论胡若望的黑皮肤（bazané）的记录。在RF中还时常可见傅圣泽对胡若望不吸引人的外貌之描述。需指出的是，傅圣泽在去广州前的近二十年间，生活在身材修长、皮肤白净的北方中国人中间。

Fioravanti 向傅圣泽保证盖司帕已被培罗尼雇用。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55 页,是傅圣泽在 1725 年 1 月 2 日给戈维理的信。

有关契约与购物,见 RF 385。有关那条质量上乘的被子,在 BAV, Borg Cin, 467,第 178 页中得到增补。胡若望拒绝保留他那份合同复本,可由戈维理证之,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67—168 页。

傅圣泽与胡若望订的合同与伙食补贴明显地被改写过。见 RF 559,傅圣泽在 1730 年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Massei)的信。

傅圣泽在 BAV, Borg Lat, 565,第 143 页里留下了有关嘉乐的许诺记录。

同上,144 页中可见傅圣泽曾困惑地否定他曾许诺要将胡若望带到罗马,虽然他引用了胡若望的“希望和期望”。有关许可的书信指的是在傅圣泽附录中的 A 和 B,见 BAV, Borg Cin, 467, Pt. Ⅱ,第 117—119 页。有关胡若望打算回国后将他自己的旅行纪写下来,以出名一事,是傅圣泽在 RF 552 最后部分记录的。有关戈维理有关合法性的质疑,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51 页,是 1724 年 11 月 22 日戈维理致傅圣泽的信。在此封信中,戈维理提到了他离开中国前曾发生过的事件。

有关戈维理在中国的居住、传教工作时间,见 Pfister no. 258。

1722 年 1 月 5 日

有关“康蒂王子”号 (Prince de Conti) 船员总数,见 RF 388;枪支见 BL, Add MSS 26 817, p. 233;船的大约尺寸,则请参考 Dermigny, Ⅰ, 203—207,521。

屈维尔(Treville)的信已被印刷,见 RF 386。在 BAV, Borg Cin, 467,第 185 页处,最后一封信被放在“真实之叙述”(Récit Fidèle)抄件里的第三次补遗中。鉴于傅圣泽即将踏上旅途,该信应成于 1 月 4 日。

傅圣泽将其个人拥有物列了份清单,在 BAV, Borg Lat, 565, p. 157v。

有关货物在 1722 年 7 月期间之记录,见 Le Mercure,第 174 页;另有关“嘎拉提”号 (Galatée)和“马武喏”号 (Maure) 的货物,见 Le Mercure,第 204 页。

关于利润,见 Dermigny, I, 420—421。

有关巴黎财务官 John Law 重新编组公司的资料,见 Dermigny, I,第155—156 页以及后注。另可见 Buffet,第 245—253 页,第 261—263 页。

第三章　海上之旅

1722 年 1 月 13 日

有关八天平静不动的日子,见 BAV, Borg Lat, 565, p. 112r。

有关三角地丘陵不毛之地之说,有许多到访者提到过,譬如其中的 Jacques,见第 186 页。

Witek 的参考书目里收录了(p. 377) 傅圣泽 1 月 6 日、8 日、和 10 日的信件。傅圣泽在 BAV, Borg Lat, 565, p. 110v,详细叙述了他安排合理的誊写,日期在 1 月 13 日,船离 Ling Teng (Lin Tin) 岛不远。

有关与胡若望同桌用饭的人以及胡若望的举止习惯,见 RF 387。本书作者个人以为胡若望同桌用饭的人以及胡若望的举止习惯当出现在早些时候,如同晚些时候出现的一样。

有关船员的俸禄,见 Buffet,第 87 页。有关船上非正式官员的人数和俸禄,见 Dermigny, I, 222, 233。法国船只上的官员远远超编,在某些异常的例子中,船上官员竟占整个船员人数的 39%。见 Dermigny, I, 222, 表。

1722 年 1 月 21 日

关于澳门的日期,见 BAV, Borg Lat, 565,第 118 页。

有关傅圣泽在航海途中,见 BAV, Borg Lat, 565, p. 112r 中的"nous eusmes la plus heureuse navigation jusqu'au Pol Condor"。

胡若望晕船之事,见 RF 387。有关他们在 1 月 22 日上岸的情况,见 Gaubil 编,Simon,第 24 页。

1722 年 1 月 24 日

有关建岛暂行方案,见 Jacques177 上半页,另见 Gaubil 编,Simon,第 494 页。

有关 Gaubil 对岛的描述,见第 10、18 页(这封信的日期不可能是 1722 年 2 月 23 日,正如 Simon 编的书中指出,由于它包含了 1722 年 6 月的天文学观察,应该是在晚夏的广州)。见 Jacques 观点,第 174 页。

见 Jacques，第 176 页：三个已婚的士兵；Jacques，第 180 页以及 Gaubil，第 19 页：死亡了的英国人；Jacques，第 182 页：取人质。

有关法国和德国士兵，见 Gaubil，第 23 页。有关丢弃该岛的决定，见 Gaubil，第 24 页。英国人早先将该岛称为 Poulo Condor，见 Morse，I，129，135。

有关"嘎拉提"号（Galatée）的供应，见 Jacques，第 176 页。

有关傅圣泽在该岛上以及他收到的信，见 BAV，Borg Lat，565，第 112 页，第 188 页。傅圣泽为别人寄信一事，Jacques 和 Gaubil 在同上著作中提及。另可见第 123 页。

Gaubil，p. 24，指出实际日期比 1 月早，"le 25 au matin ces trois vaisseaux misent *à* la voile et ramenèrenten France la colonie"。而傅圣泽在 BAV，borg Lat，565，第 112 页说他们是在 2 月 6 日离开的。傅圣泽的回忆似乎更准确，尤其是他提供的时间与需要集合士兵和居住者撤离该岛有关。

有关禁止荷兰通商，见 Demigny，I，193—95；希图获利，见 BAV，Borg Lat，565，第 112 页。

1722 年 3 月 5 日

傅圣泽有一段文字，描述他自己逐渐对具体的航海技术开始感兴趣，见 BAV，Borg Lat，565，第 112 页，以及第 118 页。〔傅圣泽把绞船索（warp）写作"touer"〕

胡若望从 1 月 5 日起，一直病了两个月。见 RF 387。

1722 年 3 月下旬

胡若望挨揍——"quelques gourmades"，见 RF 387。

该地点与 BAV，Borg Lat，565，第 112 页所记载的一致。

有关胡若望对船上那些粗暴的海员的吹毛求疵观点——"la grossièreté des matelots et des soldats"——被傅圣泽提及过。见 RF 390。

关于当众挨鞭事件，见 RF 387。

1722 年 3 月 30 日

傅圣泽所描写和记录的日期在 BAV，Borg Lat，565，第 112 页。

有关从中国途经好望角回欧洲的航海分析，可见 Dermigny，I，263—264。

RF 388 有重新着重说明失去桅杆的记载。

有关船未能靠上圣赫勒拿岛(St. Helena) 和船上开会的事，见 BAV，Borg Lat，565，第 112 页。

1722 年 5 月 9 日

在 RF 388 有一段对战役的简单记载。此外，在 BAV，Borg Lat，565，第 112 页处有主要的增补材料。"康蒂王子"号 (Prince de Conti) 船上的加农炮的具体材料在以上的文献中欠缺，但被增补至 BL，Add MSS 26817，第 233 页。

BAV，Borg Cin，467，第 7 页证实"康蒂王子"号受到"canon *à* Boulet"攻击。傅圣泽在 RF 388 断言胡若望在那次攻击中的表现，是胡若望开始脑筋变得有问题的证据。

有关接近海港后的种种，见 Frezier，p. 270，和 Russell-Wood，第 43—44 页。

有关巴西海岸介绍，见 Dermigny，I，250—51，关于 1719—69 年每个月的精确情况，见第 246 页。同书还有更详细的有关从中国回欧洲在巴西中途暂停的贸易商评述，见第 264 页，"cette relâche ne se justiferait nullement au retour，alors qu'on continue *à* la pratiquer *à* l'aller. " 有一份能证实这方面情况介绍的当时的地图，见 Dermigny，IV，地图 1。另一方面，Frezier(第 277 页) 提到大型货船一般在 3 月由里斯本(Lisbon)驶到该地。

1722 年 5 月 20 日

有关该城市当时概观，见 Frezier，第 272—279；与 Russell-Wood，第 50—58 页。

关于水手们对登陆巴西寻欢的看法，以及巴西妇女，参见 Dermigny，I，250—251，n. 8。

有关夏尔・德・贝勒维尔兄弟(Charles de Belleville)，见 Witek，第 255 页和 n. 6，Pfister no. 237，以及 Dehergne no. 96。傅圣泽对 5 月 13 日登陆时他同船人的苦境、他在当地耶稣会的生活都有详细的描写，见

BAV, Borg Lat, 565,第 113 页和 122 页。

应总督的要求,傅圣泽写了一份长长的有关他在中国的报告,其中有嘉乐访华、康熙皇帝给葡萄牙的礼品,以及他本人航海经历的小结。傅圣泽自己还留了份底,把笔迹工整的那份在 5 月 30 日交给了总督。

有关耶稣会教堂,现今为对公众开放的 Bahia 大教堂,见 Frezier,第 277 页; Santos, figs. 32(教堂建筑计划); 44; 以及 Campiglia,第 20—24 页,第 37—47 页(包括教堂内圣器储藏室内的详细照片)。

1722 年 5 月 31 日

关于出发日期,见 BAV, Borg Lat, 565, 第 112 页。傅圣泽说他们被命停在船上不许下船有"十四到十五天",想来是从 5 月 10 日开始算的。

有关当地冬天的食物与采购,见 Frezier,第 279 页。

1722 年 7 月下旬

有关船停留在巴西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 的日子,见 BAV, Borg Lat, 565,第 112 页。在第 112 页叙述的这一部分,可能还指望在 MS 处增补有关此次出发,以及对下一阶段的大西洋上航行作出更详细的说明,MS 处留下了空白。

胡若望的顺从,以及他在船上给傅圣泽的帮助,还有他的梦,他对傅圣泽谈话的反应,均可见 RF 389。

1722 年 8 月中旬

有关拉科鲁尼亚外海 (La Coruña)小插曲,见 RF 388—89;有关这方面的增补材料,见傅圣泽于 1722 年 8 月 27 日给他的法国耶稣会上司神父奥瑞 (Orry) 的信。

在 RF 388 纸的空白边,傅圣泽记录下拉科鲁尼亚总督的名字是 Marquis de Ricbourg。也许傅圣泽在登陆时,将 Burin de Ricquebourg,路易港长官的名字与前一人搞混了。

有许多文献论及 1721—1722 年在马赛(Marseilles) 发生的那场鼠疫,那是次破坏性的瘟疫(见 Le Mercure 之叙述)。当那场鼠疫结束后,巴黎市政府在 1723 年 2 月举行了庆祝活动和大弥撒。见 Mercure 有关 1723 年 2 月,第 380 页)。

傅圣泽1702年11月12日在江西南昌写给Duc de la Force的信(lettres Edifiantes, XVII, 73—128)。有关疯子的插入片断出现在95—101页之间。神父Chavagnac掌握着这件事,但傅圣泽主张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人在福州的江西镇,时间在6月和7月,他跟踪着此事的进展。

见RF389,傅圣泽,"Je consolois dans l'espérance que la terre pourroit le remettre"。

1722年8月27日

有关企图驶向格鲁瓦岛(Isle de Groix),路易港的护航船等,见BAV, Borg Lat, 565,第123页。

有关格鲁瓦岛与走私活动,见Dermigny, I, 238—239。有关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巡逻船——"pataches",见Buffet,第88—89页,第94页。

路易港港口地图,见Buffet,第394—395页。

有关傅圣泽1722年8月27日给Orry神父的信,见BAV, Borg Lat, 565,第125—126页。8月27日的日子无误,尽管在傅圣泽急忙中写下的数字更像17。

第四章　接近欧洲大陆

1722年8月28日

有关东印度公司的赖斯陶白克(M. Lestobec)部长,见BAV, Borg Lat, 565,第123页。

傅圣泽给比哥农的信在BN, MS Nouvelle Acq. Fr. 6556,第103—104页中。大部分信件在奥门特(Omont)印刷出,见第810—811页;有部分失踪,见Pinot, Connaissance,第10—11页(因地址投递错误,不是给傅圣泽,而是给了Fourmont)。Omont和Pinot都没有提到BN 6556,第104页中左手边栏的增注。这说明这些信件是在船上写的,然后信封上又出现了被退回后重写的、傅圣泽搬到雷诺(Renault)家以后的地址。一份手写原稿在BAV, Borg Lat, 565,第125页中。有关比哥农的工作,见Elisseeff-Poisle,第31—33页。

雷诺与"canot du Roy",见RF390; Buffet,第94页; BAV, Borg Lat, 565,第123页。有关雷诺当时是"commissaire ordonnateur",可参见Buf-

fet，第 93 页。傅圣泽与雷诺多年乘坐 Le Bon 船的经历，Witek 作了仔细拼凑和认真研究，见 87 页。由于该船是在 1698 年离岸的，RF 390 里并没怎么提到这二十五年前的事。

关于“兴奋地下船”之记录，见 Buffet，第 48—49 页。

1722 年 8 月 29 日

有关雷诺的邀请、胡若望住宿的安排，见 RF 390。傅圣泽接走胡若望，书单，见 BAV，Borg Lat，565，第 123 页。如同傅圣泽用法语写道："J'allai encore *à* Bord pour y chercher mon chinois"。

有关“嘎拉提”号（Galatée）在 7 月 15 日回到法国，见 Le Mercure 对 1722 年 7 月的记述，第 174 页。Omont 对其他七个大木板箱的去向作了跟踪调查，见第 814—815 页。还可见于 BAV，Borg Lat，565，第 129 页。在该档案里，傅圣泽记录了 1722 年 9 月上旬前“嘎拉提”号带来的书。比哥农（BN，MS Français 15195，第 93 页）记录了他们最后由 M. Guymont 进行的最后清理，时间推算为 9 月 23 日的傍晚，在南特，如同他在 9 月 25 日写的“d'avant hier au soir” 那样。

胡若望与家仆，见 RF 391。

1722 年 9 月 1 日

有关雷诺的工作性质，见 Buffet，第 90—94 页；另有关路易港的居住选择，见 Buffet，第 80—82 页。

皇家中尉和要塞的指挥官瑞快保格（Ricquebourg）和他儿子的信息，见 Buffet，第 27 页，第 94—96 页，第 484 页。

傅圣泽自豪地记录了他的新朋友和一连串的社会活动在 BAV，Borg Lat，565，第 123 页。

有关港口负责人保罗·毕高特（Paul Bigot），见 Buffet，第 93 页；有关马丁·杜帕克（Martin du Parc），见 Buffet，第 81 页与第 92 页。

有关 1722 年 9 月上旬瑞快保格与杜帕克的争吵，见 Buffet，第 95 页。

关于裁缝和摩卡咖啡，见 Buffet，第 275—276 页，第 448 页。有关过膝紧身短大衣（justaucorps），见 BAV，Borg Cin，467，第 178 页中，1725 年 11 月 15 日傅圣泽给戈维理的信。在 RF 400 的注解中，那件紧身短大衣被写

作“d'un drap fort fin et fort beau”。

胡若望画大马车——原文为“il griffonna les premiers carrosses qui se présentèrent *à* ses yeux”。见 RF552。有一些不多的关于路况与驿马车的介绍，见 Buffet，第 387—388 页，第 399 页。另同上，第 11—17 页有对该城市街区的一般描述。

在路易港，有几个小时誊写，见 RF 535。

1722 年 9 月 2 日

有关胡若望骑马的事，是胡若望在 8 月 29 日到达四天后发生的“il ne s'estoit pas ecoulé trois ou quatre jours depuis qu'on le eut amenń chez M. Renaut [sic]”)。见 Buffet，第 397—398 页，有关马与“portes cochères”。

作者笔下的路易港的街道，以及 Buffet（第 393—394 页，第 399 页）描述的 18 世纪该城市街道的模样。较富有的人一般掮着椅子来接送他们的女人。有关街道地图，见 Buffet，第 394—395 页。

RF 391 文件中含有将胡若望送回家的信息。

1722 年 9 月 9 日

傅圣泽估计胡若望的工作为五至六小时。见 RF 535。

9 月 5 日比哥农的信和傅圣泽回信的主要内容被誊写在 BAV，Borg Lat，565，第 129 页和第 130 页。

法国国王图书馆的早期发展被 Omont 精细地作出了图表。见 Omont，第 806—809 页。有关福蒙特（Fourmont）教授，见 Lundbaek，第 88—89 页。

有关黄嘉略（教名 Arcadio Huang）与比哥农，见 Lundbaek，第 87—88 页。

1722 年 9 月 15 日

关于 9 月 14 日傅圣泽给比哥农的信，见 Omont，第 811—812 页。

船上儒安专职牧师（Abbé Jouin）奇特的事件可见 Buffet，第 68 页。

请求法国东印度公司允许将受潮书籍作保护性处理的请愿，在 9 月 11 日被提及。那是在写给比哥农信之后。见 BAV，Borg Lat. 565，第 131 页。

有关路易港的贫穷，见 Buffet，第 45—47，87，370—374 页。有关城市那些夜晚的灵魂，同上，第 398 页。

有关胡若望坚持要乞讨，见 RF 392。傅圣泽对此的解释，见 RF 552。有关新的对流浪者的法律，见 Robert Schwartz，Policing the Poor，第 29—31 页。

第五章　在法国各省

1722 年 9 月 17 日

有关去瓦讷(Vannes)的旅途和胡若望的举止，见 RF 392—393，559。傅圣泽租用了“calàche”，本书作者将其翻译为“hoqueton”，意同“家仆”。

马路和乡间，作者的描述，以及 18 世纪“Cassini”地图第 6 页覆盖南布列塔尼(Brittany，法国西北部一地区)沿海地区部分。

傅圣泽在 RF 393 增补了一段话，说那位仆人回路易港后，将他们旅途的故事传遍了整个路易港。

那是出发去瓦讷(Vannes)的同一天到达的。是傅圣泽在同一天晚上给的。见 BAV，Borg Lat，565，第 131 页。

瓦讷的大教堂(Vannes Cathedral)并不是个十分受人喜欢的建筑物，但它在拥挤的、像迷宫般的街道里显得特别有力。对该大教堂的分析，见 P. Thomas-Lacroix，Le vieux Vannes，第 16—22 页，以及他羡慕的措辞“sa masse trapue”，第 22 页。

1722 年 9 月 19 日

有关瓦讷的神学院，见 Delattre，V，cols，16—18。有关宗教静修，见同上，cols. 第 24—26 页，另见从 col. 25，no. 1 抽出的引用文。有关神学院院长安德烈·高解特(André Goujet)，见同上，col. 20。有关高解特和他的同事们都热忱地欢迎傅圣泽，见 BAV，Borg Lat，565，第 131 页。

傅圣泽简单地提到买衣服的事，详见 RF393，与胡若望愿意帮傅圣泽做弥撒的记录在一起。RF 400 强调那是“d'une étoffe assez grossière”。事实上那是“le frère couturier du collège de Vannes qui l'acheta”，写在纸的边缘后被补进 BAV，Borg Cin，467，第 16 页的。上述可以证实在巴黎档案文献馆(the Archiv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RF 中的这两份手稿是被

Cordier 出版社后来在誊写时注上日期的。

由雷诺转交的信在 9 月 19 日收到。见 BAV, Borg Lat, 565,第 131 页。

有关傅圣泽的策略,见 Witek,第 256—258 页,以及信中的参考文献目录,第 378 页。傅圣泽 9 月 19 日寄给比哥农的信标明是在路易港(见 BAV, Borg Lat, 565,第 138—139 页),那一定是傅圣泽不小心的笔误,因该时傅圣泽已在瓦讷。在 Borg Lat 文件中,9 月 19 日傅圣泽写给法国国王私人忏悔神父李涅热斯(Linières)的信正确地写着维恩斯。

比哥农在 9 月 24 日的通知上,提及有关傅圣泽因经济方面的原因无法去巴黎的事。见 BAV, Borg Lat,565,第 127 页。有关对胡若望的安排,比哥农特别写了个条子给他的同事福蒙特(Fourmont) 教授,日期为 1722 年 9 月 25 日。见 BN, MS Français 15195,第 94 页。

1722 年 10 月 5 日

有人告诉傅圣泽要做在南特的 M. Felonceau (sp?) 的工作,傅圣泽并曾在 9 月 4 日写过信给那些检查官员。见 BAV, Borg Lat, 565,第 128—129 页,第 131 页。

有关塞森斯(Sesines) 的公司仓库和离南特的距离,见 Omont,第 815 页, BN, 以及 MS Nouv. Acq. Fr. 6556,第 110 页。

有关耶稣会在南特为建立神学院受的挫折和斗争最后被写在 Delattre, Ⅲ, cols. 773—778。有关水道学课程,见 cols. 784—785。像在南特的房子一样,他们也参加静思的时兴项目。

胡若望和弥撒,妇女是原因,见 RF 393。该时期在广州绝无妇女在公共场合出现的观点,见 Jacques, 第 188 页。

比哥农写于 1722 年 9 月 24 日的信被收藏于 BAV, Borg Lat, 565,第 127 页。

傅圣泽在 1722 年 9 月 19 日的信,见 Omont,第 812—813 页。

傅圣泽于 1722 年 10 月 3 日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 (Massei) 的信见 BAV, Borg Lat, 565,第 143—144 页。本书作者把傅圣泽的那句 “écarts éstranges” 的话译为“outrageous behavior”(粗暴无礼的举止)。

10月5日，傅圣泽给比哥农的信，见 Witek，第257—258页、以及 n. 14。

10月5日，傅圣泽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的信，见 BAV，Borg Lat，565，第145页。

1722年10月20日

预订公共马车票，见 Omont，第815页。傅圣泽10月15日给比哥农的信在 BAV，Borg Lat，565，第158页。傅圣泽在信中提到他在10月22日离开南特，到达昂热和图尔（Angers and Tours）是在25日。

信的目录，见 Witek，参考文献目录，第379—380页。

有关比哥农的要求，见傅圣泽自10月12日的信，Omont，第813页。

有关大箱子的破损以及傅圣泽往塞森斯仓库六次，见 Omont，第814—815页；见 BN MS Nouv. Acq. Fr. 6556，第110页，10月15日信。这封信提到傅圣泽已去了塞森斯仓库四次。

李涅热斯给傅圣泽的信，见 Bib. Ste. Geneviève MS 1961，第9页。

傅圣泽愿走卢瓦尔山谷（Loire Valley）那条路，见 BN，MS Nouv. Acq. Fr. 6556，第110页。

神父李涅热斯（Linières）对处理胡若望的看法，见 Bib. Ste. Geneviève，MS 1961，第8页。神父纳爱尔（Nyel）最后没有再去中国，见 Dehergne，Repertoire，no. 592。

法国地区耶稣会负责人让·保定(Jean Bodin) 批准傅圣泽去巴黎，见 Witek，第257—258页，以及 n. 14。

有关南特的居住情况，见 Gilbertt-Xavier Aumaître，Delattre，Ⅲ，cols. 779以及793。

胡若望跪地而哭被记载于 RF 393。

1722年10月27日

有关胡若望的旅行与在小客栈的记录可见于 RF 394 中。其中还有傅圣泽企图将胡若望安排在“le fonds”座位。另在 RF 552 中傅圣泽重申胡若望对风车的调查。

傅圣泽在 RF394 中迷人地把胡若望的自娱称为“cette impudente ma-

noeuvre”。

傅圣泽为找合理的借口而反对将胡若望送到梅森宣教院（the Maison Professe of the Jesuits)。见 RF 395。

有关神父杜哈尔德（du Halde）与傅圣泽，见 Witek，第 83 页；从 RF 396 档案材料中可断定傅圣泽写信的日期。杜哈尔德神父后来成了有名的中国历史学者。

有关哥瑞曼（Gramain）神父与傅圣泽在 10 月 30 日的到达，见 RF 395；哥瑞曼是奥尔良(Orléans)地区的主管牧师，神学院院长。见 Delattre，Ⅲ，col. 1015。哥瑞曼汇给傅圣泽书款，从 BAV，Borg Cin，467，第 161—62 页的记录中可知至少有 60 法郎。在 RF 560 文件中，傅圣泽把哥瑞曼称作为他的“intime ami”。

有关傅圣泽的出发和胡若望的拉警报，见 RF 397，399。由于傅圣泽到达巴黎是三天后的晚上，可推算他是在第二天的晚上从奥尔良出发的。

有关奥尔良耶稣会教堂的两张照片，见 Delattre，Ⅲ，cols. 1007—1008。另一幅的作者不详的画原名为“dans le goût de Vignon”。

第六章　巴　　黎

1722 年 11 月 25 日

有关胡若望喜爱巴黎，见 RF 398。有关为年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已成人开始执政而举行庆祝，以及耶稣会排练的芭蕾舞，见 Le Mercure，1722 年 8 月，第 201—203 页，第 164 页。有关 11 月 5 至 10 日放烟火，见 Le Mercure，1722 年 11 月，第 109—122 页。

有关白尼斯(Baynes）与他的女儿，见 RF 397，402；有关马克・卡第那力(Marc Cardinali）的证词，见 RF 569。有关每天额外的二十个 5 角铜币的超出最低标准和房间的尺寸，见 RF 402。

杜哈尔德对胡若望麻烦的冷静看法可从他写在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1 日的信中看到。见 RF 396—397。

有关耶稣会梅森宣教院（Maison Professe of the Jesuits）的基本情况介绍，可见 Delattre，Ⅲ，cols. 1259—1287。Germain Brice 的Ⅱ，183—187 页里，对梅森宣教院、图书馆有简洁的介绍，在 192—193 页里还有对

喷泉的介绍。另外，对梅森宣教院有具体描述的，主要有 Louis Blond 的 Maison Professe，第 24—53 页，第 77—89 页，以及第 96—97 页。有关宣教院旧时的辉煌时期，Jacques Wilhelm 在其 Au Marais 一书中的第 109—126 页作了生动的介绍。Jacques 并在该书的第 115 页对该宣教院内的珍品列了份清单。

胡若望出门后能够很容易地走到马赖（Marais）一带。相关资料可见 Curiositez de Paris, I；有关罗维尔岛（the island of Louviers）的自由市场和八个索尔（sols）一场的"邮寄"（Mail）游戏，见该书第 331 页；有关圣保罗（St. Paul）河边市场和水上运输，见该书第 341 页；有关圣安东尼港（the Porte St. Antoine）与石弩的射程，见该书 321 与 324 页；有关沙榔东（Charenton）附近的路，见该书 324 页；对有关圣安东尼港（the Porte St. Antoine）的介绍，还可见 Germain Brice, Ⅱ，第 233 页；对有关沙榔东（Charenton）附近的路的描写，还可见同书 241 页。

杜哈尔德和纳爱尔（Nyel）的谈话可见 Witek，第 261—262 页。谈话日期无法具体确定，似乎在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评论之前，或是傅圣泽藉此可更利于为自己辩护。另可见傅圣泽在 RF 404 中对他自己较棘手处境的评论。

傅圣泽的旅行计划见 RF 405。他写道，他 11 月 4 日在巴黎开始计划旅行。确切地说，如果他的那些书籍能通过海关检查的话，他当时希望他能够直接从路易港出发去巴黎。有关官方宣告瘟疫结束的详细介绍，可见 Le Mercure, 1722 年 7 月，176，第 206 页；以及 1722 年 9 月，第 52—64 页；第 114—118 页。

有关神父奥瑞（Orry）的帮助，见 RF 398—399。

1722 年 11 月 27 日

有关胡若望不辞而别，踪影全无，见 RF 398—399。关于巴黎警察署达介森（D'Argenson）中尉的居住情况，见 Curiositez, I, 304；以及 Brice, I, 面向第 1 页地图，第四十号大楼。

有关"弹药筒"（Cartouche）抢劫杀人团伙，见 Le Mercure, 1722 年 6 月，第 140 页；1722 年 7 月，第 185—191 页；1722 年 8 月，第 220—223 页；

以及1722年9月，第192页。Williams, Police of Paris，第66—84页中提供了绝好的巴黎景观介绍，本书作者亦相当受益。但是该书叙述的有关“射击手”队(Guet)活动，与他在同书的70页所叙述的18世纪“射击手”队活动终止的结论有矛盾。此外，Curiositez, I，第374—375页简单地提到了有关“射击手”队的活动情况；Jean Chagniot的“Le Guet et la garde”也对“射击手”队在18世纪的活动有比较宽视野的分析。

有关Saillant不同凡响的大赌，以及教皇的私人天文学家卡塞尼(Cassini)的角色，见Le Mercure，1722年8月，第197—199页。

有关威尼斯(Venetian)大使和“射击手”队，见Le Mercure，1722年9月，第186页。

1722年11月28日

胡若望被发现的记载在RF 398中。

这份目录来自于“高级警官”达介森(D'Argenson)中尉的听证。日期在1722年12月15日，见AN Y 9423。高级警官的复查每个月有两次。见Williams，第28—36页。目录是11月下旬可被大众拿走的。

有关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回函，见RF 399。有关大使个人要亲自见胡若望的理由，见RF 400。

1722年11月30日。

有关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听众，见RF 400—401。

大使在10月9日到达巴黎之记录，见Le Mercure，1722年10月，第156页。有关大使的第一个听众，见同书，1722年11月，第189页。

1722年12月上旬

有关胡若望梦见其母去世，见RF 402。胡若望的悲恸是那么深，以至两年后戈维理神父到巴黎后就听到了这些。详见BAV, Borg Cin, 467，第168页，戈维理在1725年10月15日信中的回忆。

有关房间和破了锁的门，见RF 402—403。在RF 569，马克·卡第那力(Marc Cardinali)编造了个令人吃惊的主张，说胡若望“voulant battre la fille de son hôte”，白尼斯则“obligé de le menacer et [le] battre avec un fouet, l'enfermer dans un cabinet et le garder à vue”。

有关弥撒和圣器收藏室的插曲，见 RF 401。在圣路易教堂内有许多华丽炫耀的展示，教堂本身也颇雄伟壮丽，与耶稣会梅森宣教院相连。Constans 在其 L'Eglise 一书中对此有精辟的描述。此外，Brice，Ⅱ，170—186 对该教堂建筑物的正面有高度的赞美；Blond 在 Curiositez 中也对该教堂作了基本介绍，见该书第 64—71 页。

本书作者曾在 1986 年访问了这所教堂。拼花地板还在，似乎仍是 17 世纪时的遗物。它们确实是个复杂的连接图案组合，每一方形硬木的外围是薄而长的板条，板条长短不齐，排列得有条不紊。以肉眼看，每一组拼花地板都犹如含有一个大的中央十字交叉，它的两侧是两个小的十字图形，就像基督受难像(Calvary)一样。

好饭好菜和乞讨，见 RF 402—403。在纸张的一侧已腐蚀了的 RF 402，傅圣泽写道：胡若望在白尼斯家里绝对比他在中国吃得好。那里典型的食物是"du riz cuit *à* l'eau，du thé grossier et des légumes assaisonnés avec une huile pestilente"。

有关运向鲁昂 (Rouen) 的书，见 RF 405。

胡若望的忏悔，见 RF 404。有关基本耶稣会禁条，以及神父李涅热斯(Linières)，见 Delattre，Ⅲ，1217—1218，1276。

胡若望的小鼓和旗帜，见 RF 403。胡若望原游行所去旧圣保罗(St. Paul) 已在 1799 年被拆毁。Constans 的 L'Eglise，illus. No. 4 里载有重新翻拍的一张该教堂的原照。照片清晰。胡若望的行动与该照片中的宗教狂欢和聚谈相当吻合。B. R. Kreiser 在他的 Miracles，Convulsions and Ecclesiastical Politics 里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描述。有关对 1730 年代那些精力充沛的巴黎年轻人活动的描述，还可见 Robert Darnton 所著 Great Cat Massacre 那本书中一篇不错的文章"Workers Revolt"。

傅圣泽对没收胡若望的小鼓和旗帜一事，以他自己认为得体的隐私词句记载如下："par adresse，on enleva secrètement *à* Jean Hou [John Hu] sa bannière et son tambou"，见 RF 403。有关傅圣泽与凡尔赛的谨慎交涉，在 Witek，第 259 页中有相关述说。

有关为神父李涅热斯(Linières)的布道而吸引大批人来的流行聚会，

是以纪念“夫人”、女修道院院长 Regent d'Orlèans 的名义下召开的。详见 Le Mercure，1723 年 1 月，第 192 页。

1723 年 2 月 21 日

有关恶劣的天气与胡若望的失踪，见 RF 406。同页中记载胡若望出走的日期为 2 月 12 日或 13 日。在 BL，Add MSS 26817，第 241 页，傅圣泽把日期订正为“14 或 15 日”。

有关达介森在 2 月 2 日给傅圣泽的条子，通知他书籍已在前周三到达（即 1 月 27 日）之记录，后被增补进“真实之叙述”（Récit Fidèle），在 BL，Add MSS 26817，第 241 页，写于纸边。该增补之记录不见于 RF。其他有关书籍的交涉，见 Witek，第 259 页，关于讨论的长短时间，见同书第 283—284 页。同书 n. 89 中稍现对有关原始大木板箱事件的混淆。此外，比哥农的方案见于他写给福蒙特（Fourmont）的那封相当厉害的信。详见 BN，MS Fran sais 15195，第 94 页（1722 年 9 月 25 日）；第 95 页（1722 年 10 月 4 日），尤其为第 97 页（1722 年 11 月 3 日）。在第 101 页（1723 年 3 月 25 日）的信中，写得则更为实际：“要确准保留好他（傅圣泽）的信，那封信将使我有权力要求拥有这些尚在考虑中的书籍。”有关比哥农的朋友福蒙特教授，见 Lundbaek 所著 T. S. Bayer，第 87—90 页，以及第 104—106 页中的分析。

达介森 2 月 23 日给傅圣泽的信被收录在 RF 406—407 里。在那封信中达介森说他已下命令给杜维尔（Louis Duval）。但看上去无论傅圣泽还是达介森，当时都不急着办理此事。有关杜维尔的工作，见 Williams，第 71—72 页；关于对调查员的日常工作的描写，见同书第 95 页（第 101 页中有张不错的表，列出那些调查员的活动范围，但仅限于 1750 年以后）。此外，Chagniot 的“Le Guet”，第 59—60 页中记述了杜维尔如何认真地执行任务。有关“射击手”巡逻队员在 2 月下旬的活动区域，见 Le Mercure 中 1723 年 2 月部分的记录与描写，尤请详见第 379 页和第 382—390 页。

此处和其他部分所谈到的该时期的高级警官，见 AN Y9423，“Estat des Personnes”在 1723 年 2 月 26 日（共有 11 页）。龟勒斯・来闹儿（Gilles Lenoir）的记录在第 2 页，他有“l'esprit allienné”。有关拿刀把马腿

捅窟窿的十一岁小淘气蛋，名叫皮埃尔·来森(Pierre Laisne)，有关他的记录在第6—7页中。可惜的是值班警察的登记记录不完整。

那位学校教务长名叫Claude Arme，后来在他的妻子指证后被释放。因为他的妻子能拿出教务长是个交税人的证据（“son Mary est à la Capitation”），见同书，第2页。

第七章 独闯奥尔良

1723年2月20日

哥瑞曼（Leonard Gramain）信的全文被誊写在RF 407—408中。该信由本书作者翻译成英文。

1723年2月24日

有关胡若望性急不愿再等，见RF 409。傅圣泽用中文写的信，见RF 410。

傅圣泽对达介森的抱歉，见RF 408。傅圣泽找房子，见RF 409和415。

1723年2月25日

同声翻译和神的眷顾(Divine Providence)，见RF 410—411；有关那个同声翻译与马亚尔·德·铎罗红衣主教(Cardinal Maillard de Tournon)在中国的服务，RF中并无有关记载，但在BL，Add MSS 26817，第244页中被增写在纸页边缘。

成了碎片的信，见RF 413，哥瑞曼（Gramain）在3月13日所参考背面的文字是“il y a quinze jours”。

在胡若望又一次与其分离的那些情绪化的日子里，傅圣泽在RF中对胡若望用了些他最严厉的用词，回忆文中写道：“la laideur de Chinois qui était extraordinaire”(第410页)，并形容胡若望为“une des plus affreuses figures qui fut jamais sous le ciel”(第411页)。

1723年3月8日

胡若望谦恭的礼拜举止和他戴帽做礼拜，见RF 413。在一张纸的边角处，傅圣泽增写了胡若望在奥尔良戴帽子做礼拜的事情，并指出那种做法在中国的礼仪中是相当重要的。见BL，Add MSS 26817，第265页。

胡若望看月亮，见 RF 415。

傅圣泽通过哥瑞曼送出的信，见 RF 411—412；要求哥瑞曼劝说胡若望，见 RF 413—414；胡若望的回答，见 RF 415。

1723 年 3 月 16 日

哥瑞曼信中有关胡若望于 1723 年 3 月 16 日出发的详情，见 RF 414。复制的 RF 记述似乎暗指 3 月 16 日的单程票是 12 法郎(livres)；但此数目事实上被傅圣泽在后来增写的笔记中，记录为关联到两次往来于奥尔良与巴黎之间的路程，见 BL，Add MSS 26817，第 246 页。

第八章　通向沙榭东

1723 年 3 月 28 日

傅圣泽描述胡若望的房间为“dans le coin d'un des jubés qui sont sur l'église de Saint-Louis”，见 RF 416；关于家具，见 RF 419；有关梅森宣教院修道院院长、神父盖拉德(Father Gaillard)的许可，见 RF 417。大使的监督官卡第那力(Cardinali)将之称做“un petit endroit près du jubé de l'Eglise”，见 RF 569。

有关教堂，见 Martine Constans，L'Eglise，以及 Blond，Maison Professe. 有关图画，见 Wilhelm 的 Au Marais，第 112 页。关于圣路易教堂的三张大型油画，它们现在仍然悬挂在教堂内走廊的两侧。

傅圣泽在 3 月 22 日和 3 月 28 日的信未被列在 Witek 书中的参考文献第 381 页中，这两封信也许已不复见。但傅圣泽写下了那些日子的部分情况。这些可以从 BN，MS Français 15195 的材料中重新组织复原。比哥农给福蒙特的信在 104；比哥农写给塔革尼牧师(Abbé Targny)的信也在 104，这两封信都写于 3 月 31 日。另还可见 Omont，第 817 页中比哥农给傅圣泽的信，虽然 Omont 在 816 中将比哥农给傅圣泽的信错写为傅圣泽给比哥农的信。

有关傅圣泽第一批去马赛(Marseilles)的书籍，见 RF 417。

胡若望在街上，见 RF 416—417。作为 18 世纪初离奇的巴黎街道景观之一，巴黎市民不见到胡若望是不太可能的。Robert Isherwood“entertainment”对此有极好的描述。另还可见 Thomas Crow，Painters，第 45—

54 页。

傅圣泽重新要求胡若望誊写，见 RF 416。

胡若望企图抢契约，见 RF 536，虽然不见具体日期，但与傅圣泽所写的那些评论的前后文极相符。

1723 年 4 月 8 日

RF 417—418 为有关傅圣泽为出发去罗马做准备的记录。

书籍托运到马赛的日期为 1723 年 4 月 5 日。这可从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用意大利语写给赛可派恩红衣主教(Cardinal Sacripante)的信中的内容得到证实。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19 页，item D（尽管由于明显的错误，日期被写成了 1728 年 4 月 5 日）。被翻译成法语的同样内容的文句 RF 524 可见。

日期为 4 月 8 日，可见 RF 418——"dans trois jours il faudrait se mettre en marche"。

1723 年 4 月 10 日

有关所有具体记录，见 RF 418—419。傅圣泽写道："nulle représentation, nulle instance, nulle caresse, nulle crainte ne fut capable de fléchir sa folle opiniastreté"见 RF 418。有关胡若望相信傅圣泽也许曾谋杀过人，以及那种他暗指来自一个"管理人" 的想法，大概推测是指神父盖拉德(Father Gaillard)。见胡若望 1725 年 10 月信的内容。

1723 年 4 月 11 日

驱逐胡若望，见 RF 419。傅圣泽还加了句"quelques autres personnes s'y trouvèrent aussi"，但并未说明谁在场，或为什么那些人在场。本书作者取傅圣泽的"二或三个"耶稣会教士和"three or four hommes fors" 的记录。本书作者并假设那些佣人来自于数目可观的在耶稣会梅森宣教院工作的雇员中。

有关小客栈，见 RF 420。萨恩斯旅馆(The Hôtel de Sens) 的名字在卡第那力(Cardinali) 的证词中出现过，见 RF 570。关于萨恩斯旅馆作为去里昂公共马车的出发地点，见 Curiositez, 337。卡第那力的证词写于 1730 年 3 月 27 日，是此次事件的重要参考资料。他证词中的每一句话都

经得起谨慎以及记忆准确的检证，但是在七年后要他追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是难以准确无误的。事实上，他把在 11、12 以及 15 日那三天中发生的事情搞混在一起，当作是同一天傅圣泽出发时所发生的。这部分的叙述明白无误地与 11 日的事有关联。

关于给达介森的信，见 RF 420—421，信由本书作者译成英文。

有关傅圣泽整理行李，见 RF 420："obligé de finir quelques balots de livres et de hardes qui n'étoient pas encore en ordre."

1723 年 4 月 12 日

有关傅圣泽在他的出发期间与他的祝福者，见 RF 421。白尼斯提到傅圣泽的"anglois nommé M. Smihson"（sic）大概是"frère Smith"，见 RF 527。

有关卡第那力的记述，见 RF 569—570，但是事实可能被曲解了，如同上述，他把出发去沙榔东（Charenton）当作此次出发。说胡若望被锁在房间里，众人都离去，这点应该不会错。见 Baynes，RF 526。此外，卡第那力对傅圣泽的评论也可说明："j'ai vu votre Révérence partir"——这句话带有暗示，即如果可能的话他愿意与他在一起（RF 523）。卡第那力声明他仅仅在那天早晨的五点钟在家与白尼斯会合，那是句有矛盾的话。

有关傅圣泽将胡若望放在公共马车的"les fonds"，见 RF 394。

这 100 法郎是为将来用的，不是为过去。白尼斯已经收到了胡若望早期花费的全部费用"en pension"，见 RF 422。白尼斯的收据被收藏在 BAV，Borg Cin 467，第 119 页，如同事项 C，在傅圣泽《真实之叙述》的附录中。收据原文是这么写的："Je recu des Reverend Père Foucquet la Some de cent livres pour l'usage du Chinois fait à Paris ce 12 Avril 1723."傅圣泽在收据边上注明是白尼斯的亲笔字。此收据还被傅圣泽亲自证明写于白尼斯之手，见 BAV，Borg Cin，467，第 176 页（1725 年 11 月 15 日给戈维理的信）。

1723 年 4 月 15 日

有关白尼斯的记述，见 RF 526—527。关于卡第那力的记述，包括胡若望被捆起来的记述，见 RF 523—524，569—570（这封信中有几件事相叠

在一起)。有关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记述,见 RF 525。

有关国务大臣杜布瓦红衣主教(Cardinal Dubois) 的角色在一封 1726 年 2 月的匿名信中有记载,该信与傅圣泽的确认注释,见 RF 550。对于"封印公文" (lettre de cachet) 的研究有许多,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 ancien régime。Williams 在程序上对处理警察中尉与国务大臣的关系,作了很好的总结,见 Williams,第 42 页。对具体滥用"封印公文" (lettre de cachet) 系统,以方便为下拘捕令送胡若望到沙榭东(Charenton) 的论述,可见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1733 年编), Ⅻ,第 35—37 页。

有关重要且详细记录给胡若望上手铐的事,是由沙榭东收容院院长告诉戈维理的。原文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65 页:"ce Chinois qui lui fut livré les menotes aux mains."为此,傅圣泽不悦地回应道:"Je ne scavois rien des menotes dont vous me parlez. Ceux qui les lui mirent eurent indubitablement des bonnes raisons d'en user ainsi."(同书,第 176—177 页)

有关从萨恩斯旅馆(The Hôtel de Sens) 到圣安东尼港的临时街道,见 Brice, I, 折叠地图面向第 1 页处。

第九章　身陷精神病院

1723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

有关楼宇建筑、天井的陡峭,见 Esquirol 的地图,插图 xxvii。本书作者是经 Michel Foucault 的不朽之作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而发现 Esquirol 的著作的。见 Esquirol 对沙榭东和该院早期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法,第 42—43 页,以及第 69—72 页。Mercier 在 Tableau, XII, 36 中评论慈善兄弟会的会员们因接受被"封印公文" (letter de cachet)打上精神病烙印的精神病患者,而如何背叛了他们的职业道德,并成了狱卒的。Marcel Gauchet 和 Gladys Swain 在 La pratique 中对沙榭东收容院做了一个很好的概况介绍,有关 Esquirol 的更具体的角色可见 P. Sevestre 的"Eloge de la maison de Charenton"。此外,Colin Jones 所著的 Charity and Bienfaisance (第 56—59 页) 从不同方面提供了同时代的蒙特培里收容院,是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的一幅阴暗冷酷的写照。

慈善兄弟会的会员兄弟们在1723年8月14日开会讨论了臭味问题："la mauvaise odeur des lieux communes du dortoir [? et] d'au dessus [? de] la salle des malades."见AN，AJ 2：84。有关公共厕所问题的会议是在1722年2月2日召开的。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厕所是否被建成。见AN，AJ2：84，1722年2月2日，第6项。

有关那些庭院中继续存在的不适健康的环境——"vicieuse, défavorable au renouvellement de l'air"——见Esquirol，第545页。

有关胡若望和床垫，见RF 527。收容院院长的原话，至少按照白尼斯的报告，说是胡若望"se tenoit toujours fort tranquillement dans son lit, et qu'il avait fait porter son matelas dans la cour pour lui faire prendre l'air"。

1723年7月27日

傅圣泽有两张关于这次旅途的简单纪要被保存在BAV，Borg lat, 523，第84—85页，如同Witek，第265页，n. 36中所指出的一样。这份纪要主要是一份路上花费细目，写得相当潦草，极难懂，其中还记录了给白尼斯的100法郎。有关傅圣泽的姐姐，她嫁给了Antoine Guillaume d'Orbigny，其为Avallon地方的领主（Seigneur of Avallon）。见Witek，第77页。

有关傅圣泽的教皇听众，见RF 528；Witek，第266页。教皇英诺森十三世（Innocent XIII）此后不久他界。

有关傅圣泽与红衣主教们的会谈，以及请愿的计划，见RF 528—529。

关于担心白尼斯之事，见RF 528；有关红衣主教关于胡若望可能要被逐出的报告，见RF 529。有关傅圣泽以意大利语拼写胡若望（Giovanni Hu），见BAV，Borg Cin，467，第120—121页，附录（annexe）F。傅圣泽用意大利语写给红衣主教的信，还有他自己将其译成法语的译本，放在RF里。在这个译本中，傅圣泽将胡若望的名字拼为"Giovanni Hu"。见同上，第123—124页，附录I。

傅圣泽没写信给胡若望。参见他在事后写给戈维理的信中相当站不住脚的理由，BAV，Borg Cin，467，第181页。

有关傅圣泽在罗马那段时期的一般生活，以及嘉乐问的问题，见

Witek,第 265—274 页。

红衣主教 8 月 16 日对傅圣泽与罗马教皇遣华特使嘉乐接触情况的调查被保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档案里,该档案现在大不列颠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档案名为“Risposte date dal. P. Gio. Francesco Foucquet”。见 BL, Add MSS 26817,第 179—189 页。

有关书籍没收,见 Witek,第 259 页, n. 21。最后的那批书籍能被还回,是在国务大臣杜布瓦 (Dubois)1723 年 8 月死后。这批书籍在 11 月到了罗马。见 Witek,第 284 页, n. 89。

有关傅圣泽与法国国王私人忏悔神父李涅热斯(Linières)的冲突,见 Bib. Ste. Geneviève, MS 1961,第 10—15 页,摘引,以及第 11 页、第 15 页中 1723 年 6 月 29 日与 7 月 27 日的信。

有关傅圣泽新的中国人助手,见傅圣泽亲自誊写的、1723 年 7 月 19 日给 Marc Cardinali 的信。该信被保留在 RF 527,原文为:“vous avez trouvé un jeune Chinois, qui vous remplace ce malheureux qui est resté ici à Charenton”。在这封信中,傅圣泽谈到那位新的中国人,非常可惜的是这封信未能被保存住。那位中国人是谁?最大的可能是他作为红衣主教嘉乐的随从被带到了罗马。嘉乐是在 1723 年 5 月回到罗马的,比傅圣泽早到一个月(见 Witek,第 266 页)。嘉乐是傅圣泽在 1725 年 1 月 2 日给戈维理那封狂怒的信中特别提到的、将中国人带到欧洲的七个人之中的一人。其他六人则是洪若翰(Fontaney),艾若瑟(Provana)、薄纳德(Bernard)、马哈来恩斯(Maghalaens)、马国贤(Ripa),以及奥恩(Lionne)。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57 页艾若瑟带樊守义(Fan Shouyi),奥恩几年前带黄嘉略(Arcadio Huang)。马国贤带了几名中国人到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城学习,同行的还有一位中国老师,但这是发生在一年以后的事。马国贤和傅圣泽毫无疑问地 1724 年在罗马见过面。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31 页和 143 页。

〔洪若翰(1643—1710),全名 Jean de Fontaney,法国耶稣会士天文学家;艾若瑟(1662—1720),马国贤(1682—1745) 全名 Matteo Ripa,擅长雕塑和绘画,曾任清朝宫廷画家。详见柯孟德译自意大利文的:《马国贤,中

国宫廷中的画家—雕刻家—传教士》，台北欧语出版社 1983 年版（Ripa，Matteo，1983，Matteo Ripa，peintre-graveur-mis-sionnaire à la cour de Chine. Traduit de l'italien par Christophe Comentale. Taipei，Ouyu chubanshe，1983）。——译注]

1723 年 10 月 21 日

有关 3 000 法郎的“税”，见 AN，AJ2：84；有关 1722 年 2 月 2 日收容院方（Capitulaire）记录，见同上第 12 项。

有关给贫困家庭的补助，见同上：1720 年 1 月 4 日，1721 年 4 月 6 日，1721 年 12 月 8 日，1722 年 6 月 28 日，1723 年 2 月 14 日，以及 1723 年 9 月 5 日的收容院方记录。有关家具和银器，见 1725 年 8 月 26 日的记录。

漏水和与建筑商之间的麻烦，见同上：1721 年 3 月 5 日收容院方记录，以及 1720 年 8 月 8 日之记录。

有关储水池和水泵之问题，见同上：1722 年 2 月 2 日收容院方记录第 6 项，以及 1723 年 2 月 14 日之记录。

有关土地和地产的买卖，见 1719 年 11 月 3 日，1720 年 4 月 25 日，1723 年 10 月 24 日的收容院方记录。据此素材而导向其他原始资料的，见 Jean Favier，Les Archives Nationales，Etat Général des fonds，Ⅱ（Paris，1978），第 496—497 页中所列全部目录。

有关葡萄树、树木、粪肥，见 AN，AJ2：84 中 1721 年 12 月 8 日，1723 年 7 月 6 日，1723 年 10 月 24 日，以及 1725 年 6 月 3 日的收容院方记录。

有关沙榔东（Charenton）收容院的承诺，见同上：1725 年 10 月 25 日收容院方记录；有关庄园主劳瑞尔（De Laurière）的争斗，见 1721 年 3 月 5 日收容院方记录。Esquirol，第 549 页中也提到了收容院与劳瑞尔不断的纠纷。

有关卡瑞·理江（Carré Le Jeune），见 1725 年 2 月 18 日和 Robillards1721 年 6 月 24 日的收容院方记录。收容院最大的地产购买，是花费 50 000 法郎从费瑞尔伯爵（the Comte de Ferrière）处买下位于圣安东尼路 16 号（16 rue St. Antoine）的一座宅第。那笔购买使收容院陷入无穷无尽的财政和实际运作的麻烦。详情可见 1724 年 6 月 5 日，1724 年 7 月 6 日，

1724年8月7日，1724年8月10日，以及1725年12月19日的收容院方记录。

有关收容院长的访问，见1722年2月2日收容院方记录第5项，“autant pour les consoler que pour connoitre leur situation”。Esquirol，第551页将收容院方记录错抄成每月一次。

有关捐款的历史记载，见Esquirol，第541—542页；有关收容院，见同上：第547页。在AN，AJ2：87中有个诱人的标题：“Chronologie de faits intéressant l'histoire de l'hospice de Charenton，de 1646 à 1717”，只可惜那是有关1641年豁免的部分日期和评论，而且是在1717年更新的。祈祷活动在1676年，小礼拜堂的奉献在1679年举行。

关于靠养老金生活的终身住院者与收容院的兄弟会员们共享住处和撞球室，见Esquirol，第548页。有关部分终身住院者有特权进花园，见第547页。有关Marquis de Sade被监禁在沙榔东收容院时他所感受的意外舒适的可能性，见Gilbert Lely，Vie，第595—605页，该文与Peter Weiss在Marat-Sade中的评论在一起。

把胡若望拘捕到沙榔东收容院的费用及基本数字，见Esquirol，第553页。具体则请见“Registres des actes Capitulaires（1719—1742），”AN，AJ2：84，1719年11月5日，1720年4月25日，以及1720年8月25日的收容院方记录。所有这些记录都显示，费用安排当在6 000法郎左右。Colin Jones的Charity，在第58—59页中将该院的费用同蒙皮立（Montpellier）收容院的费用作了比较。

银行的汇票和换汇票据产生见1720年8月25日，1721年5月14日，以及1721年6月24日收容院方记录。

有关前法国国王的步兵参福瑞（Sainfray）家的安排，见AN，AJ2：84，1719年11月5日收容院方记录。让·巴提思特·参福瑞（Jean Batiste Sainfray）同意每年支付300法郎作为日常生活支出，还同意每年另付150法郎作为食物和衣物费用。费用全部用现金支付。

有关弗朗索瓦·罗比拉德（François Robillard），见AN，AJ2：84，1721年6月24日的收容院方记录。当然，除了诸如此类的例子之外，也

应看到进院不久就离开人世的。如 Guillaume Seguiry，他进院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有关 Guillaume Seguiry 的情况介绍见 AN. AJ2：84,25，1720 年 4 月 25 日,1720 年 8 月 25 日,以及 1721 年 4 月 6 日的收容院方记录。在这个案例中,兄弟会员们还给 Guillaume Seguiry 太太一些钱。额外的费用可见 1719 年 11 月 5 日,1720 年 4 月 25 日,以及 1720 年 8 月 25 日的收容院方记录。

有关年利率以及交费与饮食的关系,见 AN，AJ2：84，1724 年 12 月 23 日的收容院方记录。

有关巴荣·赖维涅(Baron Leveneur)的刺绣外套,见 AN AJ2：84，1725 年 8 月 26 日的收容院方记录。说那件外套是刺绣外套,是本书作者的猜测。那也许与赖维涅的地位相配,那些衣物应该曾是整套宫廷衣物的部分而已。

有关收容院院长、白尼斯(Baynes),以及曼呢尔(Manners) 一家,见 RF526—527。傅圣泽把曼呢尔拼成"Mannours",把他的兄长说成伯爵(count)。事实上,拉特兰公爵(Duke of Rutland) 开始是伯爵(earl),后才是公爵。傅圣泽提及的曼呢尔应当是查尔斯·曼呢尔(Charles Mannours)或约翰·曼呢尔(John Mannours)。原称鲁斯领主(Lord Roos),后为伯爵,再往后成为首代拉特兰公爵。根据议会法案在 1666—1670 年期间有关公开展示的离婚和通奸条款,他与他的第一任太太安妮·皮瑞旁特(Anne Pierrepont),宣布这位查尔斯、或是约翰·曼呢尔为私生子。这件扭曲的案子应作大量研究还真相于世。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内,法国国内的具体部分,是在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James Ⅱ),以及威廉三世(William Ⅲ) 执政期间。此外 The Main Papers of the House of Lords 内也有相关资料可发掘。另外,安陶尼阿·福来瑟(Antonia Fraser)在其所著的 The Weaker Vessel (第 298—310 页)里,对事件的全貌作了一个极好的概括总结。根据傅圣泽提示的有关沙椰东收容院的线索,安陶尼阿还在她那本书的总结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自 1699 年以后,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从历史的纸张中失踪了"(第 308 页)。这个使人跌破眼镜的离奇故事由一件事情的发生,更显得扑朔迷离。那件

事是：在 1684 年 1 月 23 日，拉特兰伯爵正式地将一个“疯子”、他的一个来往密切的朋友、约翰·福特斯库爵士的孤儿，拘管起来。

有关白尼斯与那 40 法郎 quatre pistoles)，见 RF 527。傅圣泽有关国务大臣杜布瓦（Dubois）的记录，见 RF 550。巴黎警察局中尉海若特(Herault) 有关未付给收容院钱的事，见 RF 547。卡第那力关于胡若望为了“sans nous rien rechercher”而被照顾一事，见 RF 532。契约社工〔是赖康恩特(Lecomte) 的后任?〕在 1725 年下半年曾告诉戈维理相同的话，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70 页。

关于傅圣泽、卡第那力，以及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给予后者的命令之说明，见 RF 529—533；关于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对红衣主教们决议用语的引用，见 531 页；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星期四访沙榔东收容院之日期，为 1723 年 10 月 21 日，见 RF 532。

当傅圣泽后来查到白尼斯声称其将钱用在去沙榔东的路上，而不是用在胡若望身上，相当愤恨。见 RF 534。

这些兄弟会会友们犯的小过错被记载在 AN, AJ2：84，1722 年 2 月 2 日收容院方记录中的第 10 和 11 项；此外，还有 1724 年 12 月 23 日记录的第 7 和第 8 项，1726 年 7 月 7 日在分类标题为“各处”（passim）下的记录有：有关衣物、表、鼻烟盒，以及乡间漫步。

1724 年 12 月 3 日兄弟会会友们投票决定辞退赖康恩特(Lecomte)，理由是他“缺少自信”(见该日收容院方记录，AN, AJ2：84)，不过当时并没有马上找到后继人。

“蒙受耻辱和痛苦”是戈维理的话(humiliation and suffering)，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70 页，出现在 1725 年 10 月 30 日写的信中。小小的奢侈：诊所，见 1722 年 2 月 2 日收容院方记录；有关鞋的记载，见 1724 年 12 月 23 日收容院方记录；有关洗澡房，见 Esquirol，第 546 页。

有关傅圣泽听到胡若望没有受到“linge”而感到震惊，见 RF 534。有关胡若望所有衣物的精确报告来自卡第那力，见 RF 571。所谓精确，应不太会有出入。因为卡第那力可能将胡若望的东西打包以后才出发的。有关白尼斯要帮助胡若望，见 RF 527，1723 年 5 月 10 日的信。

关于收容院院长和圣餐，见 BAV，Borg Cin，467，第 165 页，出自戈维理于 1725 年 10 月 15 日写的信中。这位收容院院长的名字应该是 Théophile Turpin，他是在 1723 年 5 月 21 日被挑选到任的。见该日的收容院方记录，AN，AJ2：84。

1723 年 10 月 22 日—1725 年 8 月 9 日

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稽查员若塔牧师(Abbé Rota)有段时间认为胡若望“神志已恢复清醒”的原法文为“revenu de toutes ses extravagances”，见 RF 531。卡第那力发现胡若望“更多或更少动怒”的原法文为“quasi enragé”，见 RF 533。有关白尼斯把所有傅圣泽给他的钱都耗尽在去沙榔东的路上，见 RF 534。

有关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谨慎，可从其本人在 1723 年 10 月 11 日和 1723 年 12 月 13 日所写的信证明，详见 RF 530—531，533。胡若望后来向戈维理证实他与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相互间根本没能彼此沟通，两人谁都不知对方说的是什么。原文记载为：“sans pouvoir se faire entendre l'un à l'autre”，见 BAV，Borg Cin，467，第 170 页，1725 年 10 月 30 日信。

达介森下令除非从他办公室得到特别许可，任何人都禁止到沙榔东探望胡若望。而那只不过是“封印公文”(lettre de cachet)案件的例行做法而已。此说被卡第那力在他的 1723 年 7 月 19 日的信中提到而被证实并非为危言耸听。卡第那力的原文为“personne ne peut lui parler sans la permission de M. D'Argenson”，见 RF 528—528。

有关收容院方面寻找懂中文的人，见 RF 533。神父阿曼德·纳爱尔(Armand Nyel)当时有段时间在巴黎(见 Dehergne，Repertoire，no. 592，以及梵蒂冈罗马教皇图书馆收藏的 Ste. Geneviève，MS 1961，第 8 页，李涅热斯神父在 1722 年 10 月 10 日给傅圣泽的信)。但是纳爱尔神父在澳门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仅仅四年多，期间还受到牢狱之灾，所以他的中文也许还达不到能翻译的水平。

胡若望被关在单人小囚房的准确日子由 Esquirol(第 544—548 页)提供。Esquirol 根据他自身作为一个 19 世纪医院的医生，对旧建筑物进行的观察后所作的判断。当时为建新的、他梦寐以求的“模范医院”，旧建

筑即将被拆除。有关玻璃破碎了的小囚房，见 AN，AJ2：84，1722 年 2 月 2 日，第 6 项。有关对该时期其他收容院精神病患者的分析和描写，见 Grace Goldin，“Housing”。

岁月绵延，以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第二次探访，以奥地利传教士罗伯特·巴罗兹（Roberto Barrozzi）神父探访而结束。1724 年是个骤变的年头，因为那一年额外多了一天。

关于胡若望把毯子撕成碎片，见 RF 536；傅圣泽在 1725 年 11 月 15 日给戈维理的信中提到，是巴罗兹在同年告诉他这件事的，见 BAV，Borg Cin，467，第 181 页。

第十章　重见天日

1725 年 8 月 10 日

关于越北人翻译，巴罗兹神父和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见 RF 534—535。胡若望对那条毯子的回答，见 RF 536。傅圣泽记录那越北人皮肤黝黑（bazané），像胡若望的皮肤，且长相也难看。本书作者将该日的会晤定在 8 月 10 日，是因为大使给傅圣泽的信是 8 月 13 日，信中大使说他看胡若望也许正常（depuis peu）。基于目前的习惯说法，如果写信那天的日子在事情发生三天后或更多天之后，大使应该提到那天日子是哪一天，如果写信那天的日子在事情发生的两天或一天前，那应注明“昨天”或“前天”。但是信的具体日子在信中没有被标出。胡若望应该仍然无法与大使沟通，见 BAV，Borg Cin，467，第 170 页。

傅圣泽应该在同年晚些时候见到那位越北人翻译和巴罗兹神父。因为他俩后来也来到了罗马。与他们相比，傅圣泽感到与胡若望在一起很悲伤，因为那位越北人给巴罗兹神父带来很多欢乐。那位越北人后来被晋升为祭司，之后返国传教。说那位越北人的法语和汉语都不流利，那是傅圣泽的主观印象，尽管如此，傅圣泽认为他还是可以胜任简单的对话翻译。见 RF 535。

1725 年 9 月 24 日

在 RF 536 中保留着的傅圣泽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回信，其中日期写错，不是 9 月 12 日，而应该是 9 月 2 日，如 BL，Add MSS 26817，第

256 页所记。

关于傅圣泽的主教职位，被任命日是 1725 年 3 月 25 日，见 RF 535。另 Witek，第 277—281 页中有详细分析有关耶稣会内部律法、教士职位等。有关荣誉头衔(Eleutheropolis) 则并无具体说明，见同上，第 278 页，n. 79。

傅圣泽向红衣主教的请愿没有收录在 RF 里。但是用法语写的全文被收录在 BL, Add MSS 26817 中，是后来补进去的。1725 年 8 月 31 日的日期原文以意大利语书写，它作为第 I 项，出现在附加资料中，被收录在 BAV, Borg Cin, 467，第 123—124 页。文中，傅圣泽用的是“Giovanni Hu”。

傅圣泽似乎在一段时期内误解了大使认为他应该支付胡若望从广州归乡路费的言辞，而认为大使要他支付胡若望从沙榔东归乡，登陆上岸的路费“pour l'envoier au lieur de l'embarquement”, BL, loc. cit.，第 257 页)。根据傅圣泽自己在 RF 534 中翻译的、大使的原话是“pour le conduire du port chez lui”。

有关大使的调查，以及 1 月之前无船去中国，见 RF 538。意大利语原文见 BAV, Borg Cin, 467，第 125—126 页，增补 L。

有关该时期的社会基本情况，可见 Witek，“ passim”(各地情况)(戈维理与傅圣泽的通信在索引部分，第 486 页)。有关最近欧洲偶发杀人者事件，见 Morse, I, 174—175。此外，Rosso, Bontinck, Mungello, Pfister, 以及 Dehergne (见本书参考文献) 都提供了可用的资料信息。

在《广州府志》卷 87，第 2 页中，有一份以中文写的，有关雍正王朝时期关闭广州天主教教会的文件。

这一节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极吸引人的戈维理与傅圣泽两人之间的通信往来。这儿引用的信件均出自 BAV, Borg Cin, 467，第 129—182 页。具体如下：

129—131 页：1724 年 7 月 25 日戈维理写给傅圣泽的信，有关 Montaigu(原文如此)。

132—135 页：1724 年 9 月 29—30 日傅圣泽写给戈维理的信。

136—140 页：1724 年 11 月 5 日戈维理于巴黎写给傅圣泽的信。

140—142 页：1724 年 12 月 7 日傅圣泽于罗马写给戈维理的信。

142—149 页：1724 年 12 月 20 日傅圣泽于罗马写给戈维理的信。

150—153 页：1724 年 11 月 22 日戈维理于巴黎写给傅圣泽的信。

153—165 页，1725 年 1 月 2 日傅圣泽于罗马写给戈维理的信。

165—169 页：1725 年 10 月 15 日戈维理于巴黎写给傅圣泽的信。

170 页：1725 年 10 月 30 日戈维理于巴黎写给傅圣泽的信。信中还夹有胡若望给傅圣泽的信。

170—182 页：1725 年 11 月 15 日傅圣泽于罗马写给戈维理的信。信中，傅圣泽对戈维理 1725 年 10 月 15 日给他的信作了个长长的概要，其中不乏牵强附会和省略处。该信存于 RF 540—547 中。

1725 年 10 月 15—30 日

本书作者的翻译必须看作是试验性质的，因为 MS 中的原文就有断章取义的本质，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受损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像根本无意义的词句，如傅圣泽写下的胡若望个人对提到教皇时的说法为“lao ba-er”(或“lao palh”)，在 BAV，Borg cin，467，p. 176 内。本书作者还将“Gao Han-ren” 译成“高个子中国人”，虽然那当然也可译成“一个姓高的中国人”。MS 中的胡若望原文信，是用墨水写的，现已退成了红褐色，信是用一支质量不错的鹅毛笔，写在一张 54 厘米长、23 厘米宽的粗纸上的。此信被保存在梵蒂冈罗马教皇图书馆内一个松散的中文资料文件档案中，编号为：BAV，Borg Cin，511，no. 5。(本书作者得知此档案，皆得助于 Witek，第 264 页，n. 32 中资讯。)

虽然保存在 BAV，Borg Cin，467，第 170 页中，戈维理为胡若望的信所写的引言未注明日期，但傅圣泽代其注上了日期(见同上，第 171 页)。日期是 10 月 30 日。退一步讲，如果戈维理在 10 月 15 日之前手中有这封信，那么他就应当会将这封信放进他在 10 月 15 日寄给傅圣泽的信里，一起寄出。

1725 年 11 月 15 日

傅圣泽将他与戈维理的一组通信做了个小结，该小结放在附录之后，

后来在附录后又添加了"真实之叙述"（Récit Fidèle），见 BAV，Borg Cin，467，第 170—182 页。

他将胡若望的信称为"barbouillée de charactères chinois"，"le brouillon"（均在第 171 页），也为"grimoire"（第 176 页）。这封信是同戈维理在这组信件中的最后一次往来，没有戈维理（或胡若望）的回信被保留。

1725 年 12 月 5 日

有关警察局海若特（Herault）中尉的职务，见 Williams，Police of Paris，passim，以及书中第 299—300 页。1726 年，海若特中尉在释放关在巴士底狱的伏尔泰（Voltaire）一事上，起了部分重要的领导作用。见伏尔泰，《通信集》（Correspondance），Besterman 编，I，第 280—298 页。

有关海若特中尉掌管胡若望案件的详情，在查特来特警察档案（Châtelet police archives）中有可能会找到相关记录。本书作者没能找到它们的具体所在。本书作者之所以将海若特做这些事定为 12 月 5 日，是根据 RF 547 的记录作出的判断。记录显示，胡若望被释放的消息是在 12 月 14 日传到罗马（增补材料）的。

其他有关海若特中尉在释放胡若望案子上的详细情况来自 RF 547。对于傅圣泽而言，警察局中尉海若特采取的行动是戈维理到沙榔东收容院后引起的结果。傅圣泽是将海若特中尉采取行动与戈维理访问收容院这两件事联在一起看的（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或者巴罗兹神父当然也有可能散布过谣言），见 RF 549 和 570。

卡第那力明确指出，那 800 法郎来自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见 RF 570。傅圣泽提到那笔从海若特来的钱款仅是"une grosse aumône（一笔大的施舍）"（RF 549，565）。潘如神父则认为那笔钱直接由教皇交给从奥斯坦德到中国来的法国船长，用于胡若望的支出。见 BAV，Borg Cin，467，127 页。

1726 年 1 月 16 日

有关布鲁塞尔（Brussels）和斯宾理（Spinelli），见 RF 571。

有关海若特和胡若望的行为不当，见 RF 547 和 549。

卡第那力、耶稣会神父，以及胡若望出发离开欧洲，见 RF 570。

第十一章 返　乡

1726年11月上旬

船只全部都在10月下旬到达了广州。首先这可以从耶稣会教士嘎北尔、中文名为宋君荣(A. Gaubil, 1689—1759——译注)留下的信可证实。宋君荣当时正在北京焦急地等着他的天体动力学仪器和一些工艺书籍的托运到来(见Gaubil著,Simon编,第132页[本书作者注:其中有对1726年11月6日增补的注解,考虑到消息到他那里还需要两到四个星期]);此外,Gaubil著,Simon编,第133页中收录的1726年11月10日的信也可确认那些船只抵达广州的大约日期;同书第138页(1726年11月21日的信)还提到才收到Souciet在1725年12月11日写的信。除了以上这些资料之外,有关西方船只到达中国的日期还可从雍正宫年志中收集到,虽然雍正年代在这方面的记录不如康熙年代那样详细。

盖司帕在圣公会传教所所属教会中工作一事,是费奥拉瓦恩提(Fioravanti)在罗马遇到傅圣泽时告诉后者的。傅圣泽的记录为:"un fils déja grand qui se trouvait dans l'église du P. Perroni",见BAV, Borg Cin, 467,第155页。其他胡若望归国后的信息来自潘如神父于1727年1月10日从广州用意大利语写给傅圣泽的信,见BAV, Borg Cin, 467,第127—128页。其中的一部分被傅圣泽译成法语后放在RF 550—551中,并(准确地)将意大利语摘录放在RF 565。本节的最后几行以本书作者的想像而作。虽然潘如神父写道,胡若望"con quel denaro che riceve si pose in gala e in Novembre [lit. IX^{bre}] parti con sua famiglia per sua patria"。潘如神父还写道,胡若望:"in strada avanti la nostra porta radunava i cinesi che passarano, raccontando la sua gita all' Europa, i strapazzi ch'aveva ricevuto, ed il torto di non dargli il denaro concertato",见BAV, Borg Cin, 467,第128页。

参考书目

AAE. *Archiv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Foreign Policy Archives], Paris, Quai d'Orsay. MD (Mémoires et Documents), Chine 12, Affaires Religieuses 1724—1866, folio pp. 6—83v, former Saint-Simon collection's version of Foucquet's *Récit Fidèle*.

AN, AJ2: 84.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file AJ2: 84 (formerly listed as FF15: 84). "Registre des Actes Capitulaires de ce couvent et hôpital de Notre Dame de la Paix de la Charité de Charenton Saint Maurice, ordre de Saint Jean de Dieu, 1719—1742."

AN, Y9423.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Series Y, Salle Clisson, "Châtelet de Paris et prévôté d'Ile-de-France," XIV, Chambre de Police, "Estat des Personnes" Is X^bre 1722 and 26 Fevrier 1723.

Anon. *Histoire de la vie et du procès du fameux Louis-Dominique Cartouche*. Paris, 1833.

BAV, Borg Cin 467.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ollection "Borgia Cinese," number 467 Pp. 1—116, transcript of Foucquet's *Récit Fidèle*. Pp. 117—128, substantiating letters marked from A to N. Pp. 129—182,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oville and Foucquet. Pp. 182—185, miscellaneous letters concerning Foucquet's books, and a copy of Treville's warning letter.

BAV, Borg Cin 511. Miscellaneous materials in Chinese. Item 5 is a letter by Hu Ruowang to Foucquet, 1 sheet, 54 cm. × 23 cm.

BAV, Borg Lat 523. Collection "Borgia Latino," number 523. Folio pp. 84—85 contains Foucquet's "Breve Diario" of events in April-June 1723.

BAV, Borg Lat 565. Collection "Borgia Latino," number 565, materials by Foucquet. Pp. 96—394v constitute Foucquet's Journal and Letterbook for the period May 1721 (Canton) to September 1728 (Rome). The leaves also have page numbers in Chinese, from 3 to 550.

BAV, Borg Lat 566. 906 folio pp. of Foucquet's personal papers, writings, and secretarial copies.

Bib. Ste. Geneviève, MS 1961. *Bibliothèque Ste. Geneviève*, Paris, Manuscript 1961 (Supplement H. f. 4°), pp. 8—15. "Fouquet [sic], lettres sur la Chine. Ci-inclus des copies des lettres écrites par lui ou à lui adressées, qui vont jusqu'en 1726."

BL, Add Mss 20583A. British Library, London, Store Street Depository.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apportés de la Chine par le père Foucquet Jésuite en l'année 1722," 48 pp., folio pp. 1—25.

BL, Add Mss 26816. British Library, London, folio pp. 144—150, "Lettre du P. Foucquet au P. de Goville Supérieur des Jésuites François à Canton, le 4 Août 1721." Folio pp. 151—186, Foucquet to Hervieu, Canton, I June 1721. Folio pp. 189—206v, Foucquet reply to Goville and Goville's enclosure ref. Foucquet's hostility to Jesuits.

BL, Add Mss 26817. British Library, London, folio pp. 231—266, variant copy of Foucquet, *Récit Fidèle*.

Blond, Louis. *La maison professe des Jésuites de la Rue Saint-Antoine à Paris, 1580—1762*. Paris, 1956.

BN, MS Français 15195.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Lettres de Monsieur l'abbé Bignon," folio pp. 74—142.

BN, MS nouvelle Acq. Fr. 6556.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Lettres du P. Foucquet," folio pp. 103—115.

Bontinck, François. *La Lutte autour de la liturgie chinois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Louvain, 1962.

Brice, Germain. *Nouvelle description de la ville de Paris et de tout*

ce qu'elle contient, rev. ed. 4 vols. Paris, 1725.

Buffet, Henri-François. *Vie et société au Port-Louis, des origines à Napoléon III*. Rennes, 1972.

Campiglia, G. Oscar Oswaldo. *Igrejas do Brasil*. São Paulo, n. d.

Cassini Map. Frères Cassini, *Carte de la France*, 1789, sheet 6.

Chagniot, Jean. "Le Guet et la garde de Pari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X, 1973, 58—71.

Chavagnac, Emeric de. Letter of 30 December 1701, Chotcheou, to Père le Gobien.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Toulouse, 1810, vol. 17, pp. 63—73.

Constans, Martine. *L'Eglise Saint-Paul Saint-Louis de Paris*. Paris, 1977.

Cordier, Henri. "Documents inédi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 l'extrême-orient," 1, "Correspondance du Père Foucquet avec le cardinal Gualterio," *Revue de l'Extrême Orient*, 1(1882), 16—51.

Cordier, Henri. See RF.

Crow, Thomas E. *Painters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uriositez de Paris, Les, by "M.L.R.," rev. ed. 2 vols. Paris, 1742.

Darnton, Rober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1985.

Dehergne, Joseph. "Voyageurs chinois venus à Paris au temps de la marine à voile ..." *Monumenta Serica*, *23* (1964), 372—397.

Dehergne, Joseph.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1973.

Delattre, Pierre. *Les établissements des Jesuites en France depuis quatre siècles*. 5 vols. Enghien, 1940—1957.

Dermigny, Louis.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4 vols. Paris, 1964.

Elisseeff, Danielle. *Moi Arcade, Interprète chinois du roi-soleil.* Paris, 1985.

Elisseeff-Poisle, Danielle. *Nicolas Fréret (1688—1749): Re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e siècle sur la Chine.*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vol. XI. Paris, n. d.

Esquirol, E. "Mémoire historique et statistique sur la maison royale de Charenton," in *Des maladies mentales considérées sous les rapports médical, hygienique et médico-légal.* 2 vols. Paris, 1838.

Fan Shouyi. *Shen jian lu* [Record of my personal observations], 1721, transcribed in Fang Hao, *Zhongguo Xitong shi*, pp. 855—62.

Fang Hao. *Zhongguo Xitong shi* [History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2 vols. Taipei, 1983.

Favier, Jean.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état général des fonds*, vol. 1. Paris, 1978.

Fontaney, Jean de. Letter of 15 January 1704, London, to Père de la Chaise.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Toulouse, 1810, vol. 17, pp. 266—360.

Foss, Theodore. "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tsung (1683—1692)," in Marcel van Nieuwenborgh, ed., *Philippe Couplet (1623—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Louvain, forthcoming.

Foucault, Michel, tr. Richard Howard.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1973.

Foucquet, Jean-François. "Catalogus Omnium Missionariorum ..." transcribed by Henri Cordier in *Revue de l'Extrême Orient*, vol. 2, 1883, pp. 58—71, from BL, Add MSS 26818, folio pp. 159—176.

Foucquet, Jean-François. Letter of 26 November 1702, Nan-Tchang-Fou [Nanchang fu], to Duc de la Force,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Toulouse, 1810, vol. 17, pp. 73—128.

Foucquet , Jean-François. *Récit Fidèle de ce qui regarde le Chinois nommé Jean Hou ...* See AAE; BL, Add MSS, 26817; BAV, Borg Cin 467; RF. (The three MSS of Foucquet all use the eighteenth-century rendering "Récit Fidelle. ")

Foucquet, Jean-François. "Risposte date dal. P. Gio-Francesco Fouquet [sic]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Propaganda Fidei, Monday, 16 August 1723, BL, Add MSS 26817, folio pp. 179—189.

Fraser, Antonia. *The Weaker Vessel*. New York, 1984.

Frezier, M. *Relation du voyage de la mer du sud aux côtes du Chily et du Perou, fait pendant les années 1712, 1713, et 1714*. Paris, 1716.

Gaubil, Antoine. *Correspondance de Pékin, 1722—1759* , ed. Renée Simon. Geneva, 1970.

Gaubil, Antoine. Letter of 4 November 1722, Canton, to Monseigneur de Nemond, *Lettres édifianies et curieuses*. Toulouse, 1810, vol. 19, pp. 199—207.

Gauchet, Marcel, and Gladys Swain. *La pratique de l'esprit humain, l'institution et l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Paris, 1980.

Gernet, Jacques, tr. Janet Lloyd.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Goldin, Grace. "Housing the Insane: A History," *Medical and Health Annual,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3, pp. 36—59.

Gongzhongdang Yongzhengchao zouzhe [Yongzheng-reign paiace memorials from the Palace Museum], vols. 6 and 7, Taipei, covering years 1726—1728.

Grand Bureau des Pauvres de cette ville et Fauxbourgs de Paris [Registers of Paris poor-relief expenditures for 1721—1724]. Paris, 1725. (I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BN, R 7580).

Guangzhou fuzhi [Gazetteer of Canton prefecture]. Taipei, 1966 re-

print. Hu Ruowang (Jean Hou, John Hu, Giovanni Hu), letter by. See BAV, Borg Cin 511.

Hyde, Thomas, ed. Gregory Sharpe. *Syntagma Dissertationum*, 2 vols. Oxford, 1767.

Isherwood, Robert M. "Entertainment in the Parisian Fai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3* (March 1981), 24—48.

Jacques, Jean-Baptiste Charles. Letter of 1 November 1722, Canton, to l'Abbé Raphaelis,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Toulouse, 1810, vol. 19, pp. 166—199.

Jones, Colin. *Charity and* Bienfaisance: *The Treatment of the Poor in the Montpellier Region, 1740—18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Kangxi chao hanwen zhupi zouzhe [Palace Memorials in Chinese Language from Emperor Kangxi's reign], vol. 8, 1717—1722. Beijing, 1985.

Kreiser, B. Robert. *Miracles, Convulsions, and Ecclesiastic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Lely, Gilbert. *Vie du marquis de Sade*. Paris, 1982.

Lettres juives, ou correspondance philosophiqu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The Hague, 1764, vol. 5, letter 147.

Lundbaek, Knud. *T. S. 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o. 54. London and Malmö, 1986.

Mercier, L. S. *Tableau de Paris*. 12 vols. Amsterdam. 1783.

Mercure, Le [Mercure Galant, Mercure de France], monthly issues, 1722—1724.

Morse. Hosea Ballou.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4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Mungello, David E.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dia Leibnitiana Supplementa, XXV, Stuttgart, 1985.

Omont, Henri. *Missions archéologiques françaises en orient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t. 2. Paris, 1902.

Pfister, Louis,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1932,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 59.

Pinot, Virgile. *Documents inédits relatifs à la connaissance de la Chine en France de 1685 à 1740*. Paris, 1932.

Porter, Roy. *A Social History of Madness: Stories of the Insane*. London, 1987.

RF. *Récit Fidèle de ce qui regarde le Chinois nommé Jean Hou que le P. Foucquet Jésuite amena de la Chine en France dans l'année 1722 ...*, transcribed by Henri Cordier, from the MS copy in the Archiv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aris. *Revue de l'Extrême Orient*, vol. 1, 1882, pp. 381—422, 523—571.

Rosso, Antonio Sisto.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1948.

Russell-Wood, A. J. R. *Fidalgos and Philanthropists: The 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 of Bahia, 1550—1755*. London, 1968.

Santos, Paulo F. *O Barroco e o Jesuitico na Arquitetura do Brasil*. kio de Janeiro, 1951.

Schwartz, Robert M. *Policing the Poor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Sevestre, P. "Eloge de la maison de Charenton," *L'information Psy-chia-trique, 52: 3* (1976), 361—369.

Spence, Joseph, ed. James M. Osborn. *Observations, Anecdotes and Characters of Books and Men*. Oxford, 1966.

Thomas-Lacroix, P. *Le vieux Vannes*. Vannes, 1975.

Viani, Sostegno. *Istoria delle cose operate nella China da Monsignor Gio. Ambrogio Mezzabarba*. Milan. 1739.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Anecdote singulière sur le père Fouquet [sic], ci-devant jésuite," in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section "Ana, anecdotes," 1784 ed., pp. 304—306.

Voltaire. *The Complete Works*, vol. 85. *Correspondance*, I, 1704—1729. Ed. Theodore Besterman. Geneva, 1968.

Weiss, Peter, tr. Geoffrey Skelton. *The Persecution and Assassination of Jean-Paul Marat as performed by the inmates of the Asylum of Charent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arquis de Sade*. New York, 1965.

Wilhelm, Jacques. *La vie quotidienne au Marais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66.

Williams, Alan. *The Police of Paris, 1718—1789*.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Witek, John W.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Rome, 1982.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